



外国文学评论丛书

WANG GUO WEN XUE PING JIE CONG SHU



陀思妥耶夫斯基



辽宁人民出版社

23

出版说明

《外国文学评介丛书》是一套以学生、教师以及爱好文学的青年为主要对象的通俗读物。它用深入浅出、生动活泼的形式向读者系统地介绍从古至今世界各国著名的文学作家和他们的优秀作品。

这套丛书将引导青年朋友去漫游一番那绚丽多彩、浩瀚无边的文学世界——从古希腊的神话王国到中世纪的骑士、城堡；从铁马金戈的古战场到五光十色的繁华都市；从奔腾喧嚣的河流、海洋到恬静幽美的峡谷、森林、农舍、田庄……它将冲破多年来极左路线对文学领域的禁锢和封锁，丰富青年朋友的精神生活，为青年朋友打开一扇又一扇世界文学之窗，让读者花费不多的时间就能游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浏览各国人民今天、昨天、前天直至遥远的往昔的丰富多彩的生活图景，去体会他们的劳动、爱情、幸福、欢乐以及痛苦、忧伤、斗争、希望……它将帮助青年朋友增长知识，开阔眼界，陶冶高尚的情操，提高文学的素养。它是青年朋友阅读、欣赏外国文学作品的良好向导和游伴。

这套丛书由若干分册组成；每一分册基本上介绍一位作家和他的主要代表作品。每一分册既是一本独立、完整的著作，又是全套丛书中的一个单元；分则为册，合则成套。

这一分册介绍的是十九世纪的俄国伟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他的三部主要代表作品：《罪与罚》、《白痴》、《卡拉玛卓夫兄弟》。

作家的生平

贫民医院和贵族庄园

十九世纪前半叶，莫斯科近郊玛丽茵诺林附近，有一条肮脏不堪的街道，在低矮破烂的小木房中间耸立着慈善会济贫医院的高大建筑物，这条街道因此而得名为新慈善路。玛丽茵诺贫民医院主体建筑的两侧是医院管理人员和医务人员的家属住宅。一八二一年十一月十一日（俄历十月三十日），在右侧一楼临街的一个狭小的房间里诞生了一个男孩，这就是后来名闻全球的伟大的俄国作家费道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一来到人世所听到的就是那些颠沛无告的穷人由于疾病的折磨而发出的痛苦的呻吟，并且在这种气氛中长大。后来他本人也不断经受贫穷和疾病的折磨，几乎一直到死都未能摆脱。

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家是个典型的平民家庭。相传其远祖在十七世纪时曾是立陶宛的贵族，但作家的祖父则是乌克兰的波道亚地方的神甫。父亲米哈伊尔·安得烈耶维奇早年在故乡的神学校学习，但他觉得在宗教界服务很难出人头地，便于一八一九年从家出走，逃到莫斯科，入了皇家医学院。一八一二年俄法战争期间，他开始当军医，一八二一年退伍后来到玛丽茵诺贫民医院当住院医师。作家的母亲玛丽娅·费道罗芙娜出身于莫斯科的一个商人家庭。

平民是个复杂而又不稳定的社会阶层，不断发生分化。有些平民具有较强的民主主义思想情绪，他们中间产生了像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这样一些杰出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家。但是也有许多平民则比较保守落后，不满足自己那种卑贱的社会地位，一心想挤进上流社会。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父亲曾经遭受过艰难困苦，一直向往着贵族阶级的生活和特权。为实现这个奋斗目标，他过着严峻的生活，节衣缩食，一个铜板一个铜板地攒钱。一八二八年，他终于实现了梦寐以求的理想，获得了贵族称号，全家注册为莫斯科贵族，并且于一八三一年在距莫斯科一百五十俄里的图拉省卡舍尔县购置了庄园。这处庄园包括达罗沃耶和契列马什尼亚两个毗邻的小村，共有农奴百余人。这年夏天，全家来庄园避暑；这段生活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留下极深刻的印象，他到晚年仍然记忆犹新。

在庄园里，陀思妥耶夫斯基首次接触到农奴。他们那贫困生活的悲惨画面，使他铭记终生。在他家到来不久以前，村里发生一场火灾，焚后的灰烬和断墙残壁，令人怵目惊心。作家晚年回忆起那种凄惨的景象，仍然历历在目。他在《卡拉玛卓夫兄弟》中通过米佳的梦写道：“近处有一个村庄，农舍全都乌黑乌黑的，有一半农舍烧掉，凸现出烧焦了的木头。村口大路上，站着许多农妇，排成一行，全都瘦弱不堪，脸色灰青。尤其是最边上的那一个，瘦骨嶙峋，高高的个子，看样子有四十来岁，但也许只有二十岁，脸又长又瘦，怀里的婴儿在哭叫，大概她的乳房干瘪了，没有一滴奶汁淌出来。这婴儿不停地哭叫，伸着光光的小手，冻得完全变成青色，握着小拳头……”

九岁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还不能了解农奴苦难的社会根源，也没有去想这些。整个夏天，他都尽情地陶醉在大自然之中。庄园附近风景如画，地主的住宅座落在美丽的果树园里，与果园相接的是一片白桦树林。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常到树林和田野里去玩耍，深深地爱上了优美宁静、充满生命力的大自

然。作家后来在作品中很少描写乡村的自然景色。不过《卡拉玛卓夫兄弟》中的伊万说：“春天发粘的嫩树叶，蔚蓝色的天空，这就是我所喜爱的！这里有的不是智慧，不是逻辑，而是本能，你在这里爱的是那胚芽，是自己那最初的青春的力量……”这也许是作家本人童年时期在大自然中的体验吧，他在这里看到了朝气蓬勃的生机。

夏去秋来，全家就要返回莫斯科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后一次到白桦林里去，向他所喜爱的大自然告别。他流连忘返，越走越远。四周万籁俱静，空荡无人；惟有林边田地里有个农民在耕地，偶尔传来他吆喝牲口的声音。陀思妥耶夫斯基玩得兴致正浓，突然听到有人喊：“狼来啦！”他吓得魂不附体，情不自禁地叫喊着向那个耕地的农民跑去。这个农民五十来岁，生着一部大胡子，人称玛列伊，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家的农奴。陀思妥耶夫斯基虽然认识他，可是从来没有跟他说过话。这时，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到玛列伊跟前，拽住他的衣服，惊惶地说：“狼来啦！”玛列伊向四周环顾一阵，问道：“狼在哪里？”陀思妥耶夫斯基说：“刚才有人喊了。”玛列伊安慰他说：“没有狼！这是你的错觉。”陀思妥耶夫斯基仍然不放心，还是死死地抓着玛列伊不肯放手，抽动着嘴角。玛列伊用他那沾满泥土的手抚摸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脸，亲切地笑着对他说：“别害怕，没有狼！上帝保佑你！”他说着，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划了个十字。最后，陀思妥耶夫斯基终于确信没有狼，这才离开玛列伊向村里走去。他每走几步，总要回过头来望望玛列伊。玛列伊站在那里，不断地向他点着头。二十年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西伯利亚苦役营地看着身边那些酗酒打架、野蛮愚昧的囚徒，不由得回想起童年时期的这件小事。他竭力在农民那粗野的外表下面挖掘伟大的情爱之心。

回到莫斯科以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又过起那种死气沉沉、枯燥无味的生活。不过他家尽管市侩习气浓厚，但也不乏其文学兴趣。父母都很喜欢卡拉姆津的著作。漫长的冬夜，全家围炉而坐，朗读他的《俄国史》。一八三四年，父亲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他的哥哥米哈伊尔送到莫斯科契尔玛克寄宿学校读书。兄弟二人开始阅读浪漫主义诗人茹科夫斯基以及普希金的作品，甚至接触了英国浪漫主义小说家司各特的作品和德国诗人席勒的诗剧。尤其是著名的俄国演员莫恰洛夫演出的席勒的《强盗》一剧，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留下了强烈的印象。

虽然陀思妥耶夫斯基兄弟对文学发生了浓厚兴趣，但是父亲却准备给他们安排另一种生活道路，决定把他们送到彼得堡的军事工程学校去学习。一八三七年一月，正当陀思妥耶夫斯基兄弟积极准备参加入学考试的时候，沙俄反动势力以卑鄙的手段杀害了他们所热爱的诗人普希金。噩耗传来，兄弟二人都十分悲痛，他们决定到达彼得堡以后立即就去瞻仰普希金的故居。五月，陀思妥耶夫斯基兄弟告别了莫斯科，告别了童年生活，启程赴彼得堡，踏上了新的人生旅途。一路上，米哈伊尔诗兴大发，有时一天写两首诗。费道尔面对着即将开始的新生活，在头脑里编织着种种美好的图景，构思着一部关于威尼斯生活的小说……

米哈伊洛夫宫堡内外

彼得堡涅瓦河畔滨河街上，灯光摇曳；夏园里，北风呼啸，菩提树不停地摆动。在涅瓦河和夏园的中间，座落着豪华而阴森的米哈伊洛夫宫堡，这是沙皇保罗一世当年居住过的宫殿。高高的城墙和深深的护城河把这座皇宫围得严严实实，使之完全与外界隔绝。涅瓦河对面，有俄国最大的监狱之一——彼得保罗要塞隔河相望；要塞城墙上面，一排排大炮清晰可见。米哈伊洛夫宫堡大门前，距吊桥不远的地方，耸立着彼得一世的青铜塑像。这位在俄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沙皇，骑着高头大马，好不威武！铜像底座上镌刻着一行大字：“玄孙为曾祖而建”。原来这是保罗一世下令兴建的。他不仅企图以此来证明自己继承王位的合法性，而且妄想把自己与彼得一世相提并列，能够像他那样永垂青史。可是谁曾料想，保罗一世在位仅仅五年，就在一八一一年被朝臣们谋杀。如今这座豪华的宫堡已远非昔日，年久失修，城墙斑驳陆离，已经难以辨认出本来的玫瑰色。正面的大理石圆柱和其他装饰变成了灰褐色。就连宫堡的名称也变了：如今这里是军事工程学校的所在地，因此人们经常把它叫做工程堡。

军事工程学校是沙皇政府为军队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场所。一八三八——一八四三年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里熬过了痛苦的五年。门类繁多的课程，什么要塞建筑学啦，地球构造学啦，全都引不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兴趣。一八三八年升级考试不及格，他被留级一年。这极大地刺伤了他的自尊心。学校里严酷的兵营生活，森严的等级制度和没完没了的军事训练，使陀思妥耶夫斯基痛苦难忍。但最使他感到难堪的是他那贫困的生活处境。

在军事工程学校学习的多是出身于豪门富户的纨绔子弟。他们穿戴讲究，经常出入交际场，参加舞会和饮宴，挥金如土。陀思妥耶夫斯基由于贫穷不能与他们为伍，为了避免受人嘲弄，只好孤独地躲在一旁，把由贫穷造成的屈辱深深地埋藏在内心里。他当时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当你的儿子向你借钱的时候，你总该想到他要是没有必要，是决不会烦扰你的。我知道你很困难，所以我平时连茶也不喝。”这虽然不免有些言过其实，但却反映了他当时受屈辱的心理状态。他在给哥哥的信中还说：“哥哥，你抱怨你穷，是这样的。有什么法子呢！我也不富。你相信吗？我从营地回来的时候，分文不名，在路上又冷（整天下雨，我们都一无遮盖）又饿，我生病了，可是身上连喝口茶的钱都没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在《地下室手记》中描写了一个贫穷的青年与一群花花公子之间的心理冲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的亲身体会。

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俄国的农奴制度已充分暴露出它的腐朽性，日益走上崩溃；地主阶级加紧对农奴的残酷统治和压榨，阶级斗争异常尖锐，农奴骚动此起彼伏，焚烧庄园和杀死地主的事件接连发生。阶级斗争的风浪冲击着米哈伊洛夫宫堡的城墙，也波及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家庭；一八三九年八月，陀思妥耶夫斯基兄弟突然接到父亲死亡的消息，他是被自己领地的农奴打死的。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奴才爬到主子的地位，比本来就是主子的还要凶残，把他当奴才时所受的凌辱加倍地发泄到自己的奴才身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家购置了庄园以后，起初由母亲经营管理。她出身于商人家庭，善于算计，对待农奴特别刻薄。不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父亲辞职后也移居到乡下。他一生中从上司那里遭

受到无数的凌辱，如今则要把这一切都再转到农奴身上。他在经济上对农奴进行疯狂掠夺，在日常生活中处处施展淫威。他要求农奴对他毕恭毕敬，绝对服从，规定农奴凡是从他门前经过时必须脱帽敬礼。稍不如意，他就亲自把农奴吊在马棚里，鞭抽棒打。这个凶狠的地主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引起了农奴的无限愤恨。一八三七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母亲逝世。如果说她在世时对丈夫的残暴尚能有所控制，那么现在他就可以为所欲为了。这个年过半百的地主竟然强迫一个年轻的农奴姑娘跟自己同居。农奴们实在忍无可忍，决定采取报复行动。一八三九年六月，达罗沃耶村的一些农奴经过预谋，在荒野里把这个野蛮残暴的地主打死了。地方当局着手调查这起复仇凶杀案件。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母系方面的亲戚前来料理丧事，清楚地懂得，一经官府，农奴就要定罪而遭到流放。这样一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兄弟将会受到更大损失，不仅死了父亲，还要赔上农奴。于是他们决定息事宁人，买通了有关官员，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父亲之死说成是暴病，完全掩盖了农奴谋杀的真相。事情发生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兄弟都在彼得堡，等他们得到消息时，已经处理完毕。他们是否知道父亲死亡的真实原因，很难判断，因为他们后来对此一直缄口不言。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即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父亲的印象很坏，《卡拉玛卓夫兄弟》中的淫棍歹徒老卡拉玛卓夫的形象就有作家父亲的某些影子。

在军事工程学校学习期间，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文学的兴趣更加浓厚。他不仅阅读俄国作家普希金、果戈理等人的作品，而且广泛接触了莎士比亚、高乃依、拉辛、席勒、歌德、雨果、乔治·桑、巴尔扎克等西欧作家的著作。陀思妥耶夫斯基尤其推崇巴尔扎克，他在给哥哥的信中写道：“巴尔扎克真伟大！他的人物都是宇宙智慧的杰作！不是某一个时代的精神而是数千年经过奋斗才在人的灵魂中酝酿成这样的结果……”当然，对青年陀思妥耶夫斯基产生最直接影响的还是普希金，特别是果戈理。普希金的《驿站长》和果戈理的《外套》开启了俄国文学中“小人物”主题的先河，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处女作《穷人》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小说女主人公瓦莲卡送给男主人公杰渥式金两本书，一是普希金的《别尔金小说集》，另一本就是《外套》。杰渥式金读了《别尔金小说集》中的《驿站长》一篇之后，觉得自己所处的地位“跟那个可怜虫萨姆森·维林一模一样”。而《外套》则使他大为震惊，他甚至说“这是一本不怀好意的书”。

这个时期，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阅读了大量作品，而且自己也尝试着写作，于一八四一年写了两个剧本《玛丽娅·斯图亚特》和《鲍里斯·戈都诺夫》。这是两个历史人物，司各特和普希金早就分别写过。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开始创作竟敢同这两位大师比试高低，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但比试的结果，谁高谁低，已不得而知，因为这两个剧本都没有保存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部公开发表的作品，他的成名之作《穷人》，也是他在工程学校学习的最后几年构思并开始写作的。

军事工程学校里五年兵营式的生活是痛苦难熬的。越是接近结束，陀思妥耶夫斯基就越是感到不能忍受。他在给哥哥的信中说：“啊，哥哥！亲爱的哥哥！快点驶进码头吧，快点得到自由吧！自由和天职——这才是伟大的事情。”一八四三年八月，陀思妥耶夫斯基终于在军事工程学校毕业，被授予工程兵准尉军衔，入工程部制图局供职。

“穷人”的维护者

陀思妥耶夫斯基基本想获得“自由”，充分施展他的文学才能，可是现实生活很快就使他明白，他在人生的旅途上面临着重重困难，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经济上的窘困。他虽然有了薪俸，但很不善于安排收支，很快就有了亏空，债台高筑。因此他不得不另寻生财之道，利用公余时间从事翻译工作。一八四四年，他翻译的巴尔扎克的名著《欧也妮·葛朗台》在《观剧和阅读》杂志上连载。他感到枯燥的公务是种沉重的负担，公余时间又得为赚钱忙碌。一八四四年十月，他被晋升为少尉，就趁这个机会呈请退了职。

退职以后，时间多了，但钱却少了。他失去固定收入，生活越加困难。他写信告诉哥哥说：“我将要像在地狱里那样拚命地劳动。现在我自由了。可是现在，就在眼下，我可怎么办呢？这就是问题。哥哥，你想想，我欠了八百卢布的债，其中有五百二十五卢布是欠房东的房租。我想买件衣服，但一文不名……我完了。我要被拖到监狱里去了。”贫困，尤其是彼得堡贫民窟里穷人的贫困生活，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亲身体会了的，是他一生创作的重要主题之一。

四十年代的俄国，资本主义工业和贸易的增长以及沙皇国家机关的膨胀，引起城市里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城市生活中形成了贫与富、权贵与平民、上层与下层相差悬殊的社会两极。陀思妥耶夫斯基继承着果戈理维护“小人物”的人道主义传统，从创作一开始就把注意力集中在城市底层的穷人身上，揭示资本主义的罪恶，为那些被践踏、遭受凌辱的贫民诸命。他在第一部小说《穷人》中怀着对这些颠沛无告的人们的深切同情，展示了贫民窟里悲惨的生活，在这些为大人先生们所不屑一顾的人物身上发掘出人性的尊严，从灵魂的深处为他们发出绝叫。

《穷人》是以男主人公，年老的小公务员杰渥式金和女主人公，年轻的姑娘瓦莲卡的通信的形式写成的。但小说的男女主人公并不是孤立的，他们的命运遭遇与整个社会生活息息相关。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彼得堡生活的广阔画面，构成了他们活动的背景。这里有从“大人”、高利贷者、窝娼的老鸨到小官吏、穷苦的大学生、奴仆，其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像杰渥式金和瓦莲卡那样的穷人。但是这些被上流社会所不齿的、被人遗忘的“小人物”，在精神上却是最优秀的人，最富有人性的人。陀思妥耶夫斯基走进这些人物的内心，深入到他们的灵魂，发掘出来的是这些沉沦在底层的人们的真和美，把这些与他们的悲惨命运相对照，使人感到哀怜，感到压抑和窒息。

杰渥式金是个上了年纪的穷苦的小公务员，在一个局里，整天伏在案头抄写了三十年，衣衫褴褛，经常受到人们的嘲笑和戏弄。但是他有一颗温暖的心和善良的灵魂。他从窝娼老鸨手里把孤苦伶仃的瓦莲卡抢救出来，对她产生了爱情。不过他知道自己年龄上配不上这个姑娘，于是就抱定自我牺牲的精神，来充当她的保护人。他在心里感到无限温暖，觉得为她牺牲一切是自己莫大的幸福。他对瓦莲卡说：“亲爱的，我知道我应该多么感谢您！自从认识您之后，我开始清楚地知道我自己，开始爱您；在这以前，我的天使，我是一个孤苦伶仃的人，好像睡着了，没有活在世上。那些坏蛋们说，连我的外形都是不体面的，他们讨厌我，于是我也讨厌起自己来了；他们说我愚蠢，我也就认为我愚蠢；可是，当您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您照亮了我整个黑暗的生活，连我的心和灵魂也给照亮了，于是我得到了灵魂的平静，

知道我并不比别人差；就算我是这副样子，没有一点可以夸耀的地方，没有光彩，没有气派，但我毕竟是一个人，在心灵和思想上我是一个人。”在那些“大人”们看来“连一块擦脚的破布都不如”的杰渥式金，这时第一次感到自己被一个人所需要了，在一个人的生活命运中成为不可缺少的因素了。他开始意识到自己的人格尊严，他明白了：“随便欺侮孤儿的人……不是人，简直是一钱不值的废物；不过是算作人罢了。”他甚至开始想到社会的不平等。他对瓦莲卡说：“您为什么这样不幸？我的小天使！您有什么地方不如她们所有这些人（指阔气的伯爵夫人——引者）？在我看来，您善良、美丽、有学问；那么，您为什么遭受这样凶恶的命运？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好人孤独无靠，而另一些人却幸福不招自至呢？”

在弱肉强食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像《穷人》的主人公这样的人是无法生活下去的。他们的一点点良好的愿望都不可能实现。他们对自己的前途“连想也不敢想”，总是“好像生活在迷雾之中”。“穷人比一块破布还不如，不可能得到任何人的尊敬……他不应该有什么珍秘的感情，什么希望也不应该有！”杰渥式金是一个不能温饱的孤老头，穷得连颗钮扣都没钱买。瓦莲卡则被人称为“卖笑妇”，她被坏蛋所诱骗，靠着做点针线活勉强养活自己，她没有希望嫁人。摆在她面前的只有两条出路，供她选择：要么到街上去卖笑，要么就跟毁灭了她的青春的坏蛋结婚。为了“掩盖她的耻辱”，她只有嫁给这个坏蛋，然而这无异于走上自我毁灭的道路；等待着她的是坟墓，而不是生活。主人公们悲剧性的结局是不可避免的。在小说的结尾，杰渥式金向那冷酷无情的世界发出绝望的呼喊：“现在我的心那么堵得慌，充满了眼泪。……眼泪闭住了我的气，撕裂了我的心！”

像杰渥式金、瓦莲卡这样的穷人不是个别的，在资本主义大城市里整个底层的人都是如此。小说中的高尔希科夫蒙受不白之冤，吃了官司，长期失业，一家五口挤在斗室里，欠了房东大笔债务，受着随时都可能被赶出去的威胁。孩子们赤着脚，挨着饿，害着病。“他们的房间里总是静悄悄的，好像没有人住在里面一样。孩子们从来不欢蹦乱跳，不玩一玩。”一个孩子死了，那个六岁的小姑娘，“靠棺材站着，她是那么一个忧闷的、爱想心思的、可怜的小姑娘！……一个用破布做的洋娃娃躺在她身边的地板上，——她也不玩；她的一个小手指头放在嘴唇上；一个人站在那儿——一动也不动。女房东给她一块糖；她拿着，也不吃。真伤心。”

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人公虽然意识到自己的尊严，却不能积极地维护自己的地位。杰渥式金抄错了文件，站在“大人”面前，“嘴唇发抖，腿也直打哆嗦”，完全是个可怜虫。他只乞求怜悯和同情，企图从中得到一点安慰。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创作一开始就表现出来的消极面。

“自然派”

《穷人》经过反复修改，于一八四五年三月最后竣稿。但是年轻的作者对自己的处女作很不托底，不敢拿出去发表，惟恐受到文坛名流嘲笑。他犹疑不决，不知怎样处理这部作品。另一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又很重视自己的心血的成果，担心作品发表后不被人理解。当时俄国文坛上最有影响的杂志是《祖国纪事》，它的实际主编，革命民主主义批评家别林斯基在青年中享有权高的威望。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常希望能够在《祖国纪事》上发表自己的作品，获得别林斯基的好评。他写信给哥哥说：“我要是能在那里发表，那么我在文学方面的前程，生活——一切都将有了保障。”但是像他这样一个毫无名气的青年作者怎能在《祖国纪事》上发表作品呢！

恰好这个时候，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军事工程学校的同学格里戈罗维奇来了。他比陀思妥耶夫斯基略有些经验，多点门路，因为已经在涅克拉索夫主编的文集《彼得堡风貌》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彼得堡的手风琴手》的特写。于是他就陪同陀思妥耶夫斯基带着手稿去见涅克拉索夫。涅克拉索夫和格里戈罗维奇连夜读了起来。他们被小说主人公的命运激动着，不断地流着眼泪，一直到第二天早晨才读完。他俩顾不得睡觉，在清早四点钟连忙去敲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门，把他叫醒，向他热烈祝贺。他们相互拥抱，兴奋得流出眼泪。

当天，涅克拉索夫又把《穷人》的手稿转交给别林斯基。他一到别林斯基就兴奋地喊道：“新的果戈理出现了！”别林斯基不肯相信，不以为然地说：“您以为果戈理会像蘑菇一样长得那么快呀！”但是批评家读过小说以后，也十分激动，不仅承认作者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新的果戈理”，而且迫不及待地要求会见他。接着，陀思妥耶夫斯基被领到别林斯基家里。批评家极其热情地接待了这位年轻的作家，高度赞扬了《穷人》，对他说：“您是位艺术家，真理已对您展现和宣告，像天赋一般落在您的身上，您得珍视您的天赋，对它忠诚不渝，您就会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

陀思妥耶夫斯基告别了别林斯基，走出他的家门，长久地伫立街头，凝望着晴朗的天空和来往的行人。他陶醉了，整个心灵都感到这是他一生最庄严的时刻，是新生活的开端。作家晚年回忆起第一次会见别林斯基的情景，仍然激动不已。

一八四六年一月，涅克拉索夫主编的《彼得堡文集》出版，其中以显著的地位刊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穷人》。接着，别林斯基发表文章，专门评论了《彼得堡文集》，用大量篇幅分析了《穷人》，认为这部作品是进步俄国文学的重大成就。批评家突出地强调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现实主义和人道主义及其对果戈理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他写道：“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才能不是讽刺的、描叙的，而是高度创造性的……这种才能是不平凡的和独特的，藉其第一部作品，立刻就显出和在倾向与特色上，从而在才能的成就上多多少少有赖于果戈理的一大群作家的鲜明区别。”别林斯基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叫作果戈理在创作上的儿子，但是认为他的作品“没有一点模仿的痕迹：儿子有着自己的生活和自己的思想，可是无论如何，他的存在还是有赖于父亲的。”《穷人》中的杰渥式金与《外套》中的巴什玛奇金十分相近，但是他们中间却有着本质的差别。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物是他“自己从现实里面把他们摄取出来的”。如果说果戈理展示出“小人物”低下的社会地位及其在精神面貌和生活方面对他们的影响，从而对“小人物”进行

了维护，那么陀思妥耶夫斯基则不满足于这一点，进而表现出“小人物”善良和美好的灵魂。因此别林斯基写道：“许多人可能设想，作者想通过杰涅式金描写一个智力和才能被生活击溃、压扁的人。要是这样想，那就大错特错了。作者的想法要深刻得多，人道得多；他通过马卡尔·阿列克赛耶维奇这个人物告诉我们，在最浅薄的人类天性中蕴藏着多少美好的、高尚的和神圣的东西。”

别林斯基高度评价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因为他的创作与当时进步的俄国文学发展的步调完全一致。四十年代俄国文学中占统治地位的是“自然派”，又称果戈理派。别林斯基作为“自然派”的思想领袖，在总结果戈理的创作成就的基础上，为这个流派制定了完整的创作纲领。建立在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基础上的对农奴制的否定和对广大下层群众的同情，是这一派作家创作的基本思想。城乡底层人物，城市贫民、小官吏、平民知识分子和农民，是“自然派”作家描写的主要对象。对现实的深刻批判和强烈的否定精神，是这个流派的文学的灵魂。陀思妥耶夫斯基结识了别林斯基以后，很快就成了“自然派”的骨干成员，经常参加这个流派的文学集会，朗读自己的新作。这对于这位年轻的作家进一步成长起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在《穷人》取得巨大成功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经过长期的孤独和自卑之后，在一片赞扬声中却走向了另一极端。荣誉冲昏了他的头脑，他觉得自己是个超凡出众的天才，因此在“自然派”诸作家中间根本不把别人放在眼里，处处都要高出他们一头。可是别人并不买他的帐，处处奚落他，嘲弄他。于是有关他的各种流言蜚语就不胫而走。什么陀思妥耶夫斯基要抢占第一把交椅啦，什么陀思妥耶夫斯基要求涅克拉索夫发表《穷人》时每一页都给排在“框子”里啦……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弄得满城风雨。

一八四六年底，别林斯基退出《祖国纪事》杂志；涅克拉索夫取得了《现代人》杂志的出版权，想把它办成“自然派”的机关刊，因此要求陀思妥耶夫斯基停止为《祖国纪事》撰稿，全力支持《现代人》。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拒绝这一要求，并且同他发生了争吵。这也使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别林斯基的关系紧张起来。关系的紧张进而影响到观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第二部作品《二重人格》刚一发表时，别林斯基虽然也指出了艺术上的不成熟，但总的来说则持保护的态度。可是他在一八四七年一月发表的《一八四六年俄国文学一瞥》中，则对《二重人格》做了根本的否定。他写道：“《穷人》里一切初次习作可以原谅的缺点，在《二重人格》里就是骇人听闻的缺点了。”批评家认为这缺点就是作者的“幻想的色调”。“幻想这东西，在我们今天，只能在疯人院中，而不是在文学中占有地位，应该过问的是医生，而不是诗人。”别林斯基的做法并非完全感情用事，而反映了他的文学主张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中新的倾向的分歧。陀思妥耶夫斯基热衷于描写主人公那种近于疯狂的内心分裂，这与别林斯基的现实主义文学观点背道而驰，被他看成是已经过时的浪漫主义的表现。由于观点的分歧，陀思妥耶夫斯基从一八四七年初起停止了与别林斯基的交往，从而结束了在“自然派”中的活动。

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

一八四八年欧洲革命的暴风雨来临的前夕，专制农奴制已接近总崩溃的俄国，也开始骚动起来。彼得堡的一群先进知识分子立足于俄国现实的矛盾，把目光集中在革命的法国，积极地研究圣西门和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每逢星期五，他们就在彼得拉舍夫斯基的寓所集会，热烈地讨论各种理论和当前政治的问题。陀思妥耶夫斯基早在一八四六年春就通过诗人普列谢耶夫的介绍结识了彼得拉舍夫斯基，并且从一八四七年二三月起开始参加他家的星期五集会。他反对贫富悬殊的社会不平等，很自然地热衷于空想社会主义理想，因此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活动中比较积极。不久，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个革命团体内部又和一些人建立了一个更加秘密的小组，并且积极参加筹建地下印刷所的工作。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别林斯基决裂后，在政治思想上仍然是他的拥护者。一八四七年，果戈理出版了他的最反动的著作《与友人通讯荟萃》，背弃了自己的创作道路，鼓吹同专制农奴制现实妥协。别林斯基于七月十五日写了著名的致果戈理的信，批判了作家的反动观点，站在广大农民的立场上提出了俄国革命的三项最低纲领：“废除农奴制度，取消体刑，尽可能严格地执行现有的法律。”这封信以手抄本的形式在进步青年中广泛地秘密流传，成了革命思想界公认的政治纲领。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情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穷人，反对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迷恋于空想社会主义，因此把别林斯基致果戈理的信奉为至宝，弄到一份手抄本，拿到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集会上朗读。

一八四八年的欧洲革命浪潮低落以后，沙皇政府在国内对进步思想界开始疯狂迫害。特务机关加强了对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活动的侦察，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成一个最危险的革命者。一八四九年四月二十二日，沙皇御前第三厅的特务头子、侍从将军奥尔洛夫伯爵给彼得堡宪兵队邱吉诺夫少校下达了逮捕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秘密指令：“奉上传，兹命阁下于明晨四时逮捕退役少尉工程师和文学家费道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该犯居住在小海军街和沃兹涅斯克大街交叉路口席里楼第三层勃列麦尔公寓。应抄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切文件和书籍，将该犯以及查抄之物品一并解到御前第三厅归案。应仔细搜查，勿使任何东西有所遗漏。”

四月二十三日清晨四点，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格里高利耶夫家做客归来，刚刚躺下睡觉，一伙挎着腰刀的宪兵和警察突然闯进来，蛮横地把他叫起来。他们到处乱翻，一个宪兵从椅子上爬到俄国式的大炉子顶上，一不小心，跌了下来。一个警察在桌子上发现一枚旧铜币，以为是什么重要罪证，断定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伪币制造者。最后，他们把作家为数不多的藏书、手稿和来往信件捆成一捆，带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押上马车，女房东和仆人们感到震惊，一个个吓得目瞪口呆。

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时被捕的有彼得拉舍夫基本人及其小组成员三十多人，全都给关在彼得保罗要塞的监狱里。十多天以后，审讯官向陀思妥耶夫斯基提出了下列问题：第一，彼得拉舍夫斯基为人如何？第二，他家集会时谈话的内容都是什么？第三，这个团体的秘密使命是什么？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忏悔，没有出卖同志，在供词中谴责了书刊审查制度，认为它有碍文学的发展；称赞了傅立叶主义，认为它充满“人类之爱”。

军事法庭没有掌握充分的证据，迟迟不得开庭审判，事过半年多以后，于十一月十六日草草宣判。判决书写道：“查被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行如下：本年三月，该犯从贵族普列谢耶夫（被告）处得到文学家别林斯基的罪恶书信之抄本，在一些集会上朗读该信：先在被告杜罗夫的寓所，后又在彼得拉舍夫斯基的寓所，最后又把该信交给被告蒙别利誊写。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被告斯彼什涅夫的寓所听别人朗读格里高利耶夫少尉的有害著作《士兵的谈话》。陀思妥耶夫斯基扩散文学家别林斯基反宗教和反政府之信件，听格里高利耶夫少尉图谋不轨之著作而不告发，实属罪大恶极。军事法庭特宣判：褫夺该犯一切头衔和财产，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枪决。”

一八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晨七点，寒风凛冽，天色晦暗，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二十一名死囚被押到谢苗诺夫校场。刑场戒备森严，处刑台三面站满列队士兵。法官宣读死刑判决书以后，神甫给死囚们一一吻了十字架。接着，给他们穿上白色的尸衣，三人编为一组，准备分组依次处决。陀思妥耶夫斯基被编为第二组，眼看着第一组的彼得拉舍夫斯基等三人被蒙上了眼睛，分别被绑在三个刑柱上，等待着死亡的到来。对于他来说也只剩有一分钟好活了，这时他觉得“生活是一件礼物，生活是种幸福，每一分钟都可以成为一个幸福的时代”。在这“可怕的、无限恐怖的、等待着死神降临的时刻”里，他想到了自己的亲人，想到了亲爱的哥哥。他又跟身旁的杜罗夫和普列谢耶夫拥抱，跟他们诀别。

行刑的士兵举起枪来，向着彼得拉舍夫斯基等三人瞄准……突然，一个宫廷侍从武官来到刑场，制止了射击，传达了沙皇的圣旨……原来军法会议处将军在复审判决时觉得死刑过重，上报沙皇尼古拉一世呈请减刑。沙皇为了表现自己的“恩典”，决定“从宽处理”。但是为了在精神上摧残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下令演出这场假处决。侍从武官宣读了沙皇的特赦令：陀思妥耶夫斯基由死刑改为四年苦役，充军西伯利亚；其他人也都照例减刑。但是沙皇的残酷目的已经部分达到：第一组囚犯中有一个经不起恐怖的折磨而发了疯。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在《白痴》中描写了死囚在临刑前的恐怖心理，是世界文学中少有的描写死亡的恐怖的文字。

陀思妥耶夫斯基虽然活下来了，但严峻的苦役和充军在等待着他。在押往西伯利亚的前一天，监狱里进行了大搜查，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抄出他在狱中写的全部手稿：一部长篇小说和一个剧本的提纲以及短篇小说《童话》（后改名《小英雄》）。他从一八四四年开始写作，到一八四九年初，将近五年的时间里写了长、中、短篇小说十二种。突然被捕，迫使他中断了长篇小说《涅托奇卡·涅兹瓦诺娃》的写作，这部作品当时已经开始在刊物上连载。写作已经成了他的第一生活需要，在狱中也没有停止。可是如今他完全被剥夺了写作的权利，其痛苦不亚于肉体的死亡。他在给哥哥的信中说：“当真我永远不能够再执笔写作了吗？我想四年后也许有这种可能……要是不准我写作，我会死的。”只好把希望寄托于渺茫的未来。

“死屋”十年

一八五五年的元旦快要到了，彼得堡的达官贵人、豪门富户正在准备欢度佳节。但是对于那些被剥夺了一切权利的囚徒来说则根本没有任何节日，新的一年给他们带来的将是苦难。十二月二十四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其他难友一起被押往西伯利亚苦役地。白天，他告别了到狱中来探望他的哥哥和亲友，晚上，披枷戴镣，乘上雪橇，在风雪弥漫之中离开彼得堡，向着遥远的西伯利亚进发。这些苦役犯途中在交接站托波里斯克停留数天，陀思妥耶夫斯基被分派到鄂姆斯克要塞。

苦役监狱是人间地狱。意大利大诗人但丁的《神曲·地狱篇》中，地狱的入口写着“死屋”两个大字。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在他那本描写苦役生活的著作《死屋手记》中，就把它借用来称呼苦役监狱。他戴着镣铐，在“死屋”里度过了四年多的时间，一千五六百个白天和黑夜。这位全俄知名的作家被剥夺了一切称号和权利，跟那些杀人犯、强盗一起睡在一个通铺上，受着种种折磨和屈辱。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到达鄂姆斯克要塞以后，看到监狱里阴森恐怖的情景，神经受到严重刺激，就昏了过去；口吐白沫，四肢抽搐，牙关紧闭，患上了癫痫症。这种病症后来折磨了他一生，最后导致他过早逝世。

四年多的苦役生活难以想象多么可怕，令人不寒而栗。对于囚徒来说，自然谈不到什么政治权利和经济地位，他们连最起码的人格尊严都被剥夺，像牛马一样地做着苦工，随时都要受到连牛马也不会受到的酷刑。稍微得罪监狱看守人员，马上就要遭到“九条鞭”的毒打。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比这肉体上的痛苦更难以忍受的是精神上的摧残。要塞高大的城墙把这里的生活与广阔自由的天地完全隔绝；每天看到的仅仅是头顶上一小块灰色的天空和周围那些被剃掉了半边的头和愁苦的面孔，听到的只是哗唧哗唧的镣铐声和痛苦、绝望的呻吟声……

监狱的生活痛苦而单调，旷日持久，可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面前却展现出另一个世界。他惊奇地发现，在这“死屋”里住着的都是活人，在他们中间有许多聪明、有才智的人。他看到，即使是在这种环境里，那些出身于下层的囚徒，尤其是农民，处处都对贵族囚徒表现出敌意。这迫使陀思妥耶夫斯基重新评价自己，重新评价俄国知识界。人民群众对统治阶级的仇恨心理和敌对情绪，本来是阶级斗争的一种表现，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却认为是知识界脱离人民的结果。他看到那些说话粗鲁、行为野蛮的杀人犯有时也有一颗善良的心，于是他就情不自禁地想起了他童年时期在自己家的庄园里遇到的那个大胡子农民玛列伊。因此他认为俄国知识界的任务就是接近人民群众，放下自己的优越感，接受人民群众的观点，他们落后保守的思想意识，包括他们的宗教情绪。在监狱里，陀思妥耶夫斯基手头仅有一部《圣经》，他读了又读，几乎全部背得出来。对革命的一点点向往竟招来了如此残酷的惩罚；他觉得好像不能再有别的出路，惟有转向宗教。他那空想社会主义理想跟着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被粉碎而彻底破灭了。他不再相信知识分子会有什么作为，也不再相信人民群众会跟着知识分子去推翻沙皇的统治。于是，他尽管仍旧热爱人民，想为他们寻找出路，但是他却不再相信革命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服完苦役以后曾经说：“思想变了，但心还是那颗。”他的思想的确变了，变得非常彻底，他对革命完全失望，把社会主义信仰抛得一干二

净。但他的心还是那一颗，他依旧同情被压迫者的苦难，企图为他们寻找解脱苦难的途径。然而摈弃了革命的道路，他惟有向宗教呼吁。这种尖锐的思想矛盾，构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后半生最大的精神悲剧。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监狱里不能读书，不能写作，但是应该说，他的文学创作并没有完全停止。他不断地观察着周围的每一个人，了解他们的经历，研究他们的性格，洞悉他们心灵的奥秘，在自己的头脑里进行着艺术“练习”。他后来对别人说：“我无法向您表达我由于在狱中不能写作而遭受多少痛苦。但是在我的内心里工作却在沸腾。”“我从苦役地带出来多少人民的典型和性格！”陀思妥耶夫斯基熟悉各种类型的罪犯，了解各种各样的犯罪活动，掌握了各种犯罪的心理。可以说，在他以前没有任何一位作家像他这样了解和熟悉社会犯罪问题。四年的监狱生活，与各种各样的罪犯的接触，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提供了极其丰富的创作素材。他后来不仅写了反映苦役监狱生活的长篇报告文学《死屋手记》，而且几乎在每一部长篇小说中都涉及到犯罪问题，都描写了凶杀。

一八五四年三月二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鄂姆斯克苦役监狱服刑期满，获得释放。“自由，新的生活，死里逃生……这真是极美妙的时刻！”他离开监狱时头脑里装着丰富的创作素材和新作品的构思，但同时身上也带着可怕的病症——癫痫症，思想上还有那精神悲剧的种子。

出狱后的“自由”是极其有限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还要服兵役，而且是无期限的。他被发配到谢米帕拉廷斯克，在西伯利亚第七常备营里当列兵。严峻的兵营生活，没完没了的操练和站岗值勤，对长官绝对服从，这一切对于作家来说都沉重难熬；而且稍不留心，就要受到鞭挞，浑身被打得皮开肉绽，鲜血淋漓。总之，兵营并不比苦役监狱好多少，仍然是一座“死屋”。这样挨过了两年半的时间，一八五六年十月，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晋升为少尉。从此，他在兵营外面有了自己的住宅，可以和熟人、朋友进行交往。最使他欣慰的是有了写作的可能，这时他开始写《死屋手记》。

陀思妥耶夫斯基当列兵时就结识了省府秘书亚·伊·伊萨耶夫及其妻子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跟他们相处得很好，经常到他们家里去给他们的儿子帕沙授课。后来伊萨耶夫工作调动，移家库兹涅茨克，不久患病身亡。这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经当了军官。他在一八五七年二月赴库兹涅茨克看望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与她产生了爱情，结了婚。这个女人有着病态的性格，感情容易冲动，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时而爱得发狂，时而冷若冰霜。作家后来在《白痴》中塑造娜斯塔西娅·菲里波芙娜的形象，在《卡拉玛卓夫兄弟》中塑造格鲁申卡的形象，都以自己的第一个妻子为原型。

当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遥远的西伯利亚服苦役和充军的时候，俄国内地发生了重大变化，酝酿着一场政治上的暴风雨，专制农奴制已经进入总危机的时期。沙皇政府为了转移国内的政治视线，加紧对外侵略扩张，与英国、法国、土耳其争夺地中海势力范围的斗争越演越烈，终于在一八五三年爆发了克里木战争。沙皇俄国在这场战争中遭到失败，充分暴露了专制制度的腐朽。克里木战争的失败在俄国国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加剧了人民群众对专制农奴制的不满情绪，农民骚动此起彼伏，社会进步阶层要求改革的呼声日益强烈。最高统治者沙皇也感到不能再原封不动地统治下去，否则就会被人民群众所推翻。

在这种情况下，俄国文坛重新活跃起来，各种思潮流派围绕着如何进行

农奴制改革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争。远在谢米帕拉廷斯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密切地关注着国内的情况，急不可待地想重返文坛。一八五七年八月，他在《祖国纪事》杂志发表了他当年在彼得堡监狱中写的短篇小说《小英雄》，署名姆——伊。一八五八年初，陀思妥耶夫斯基申请因病退伍，要求定居莫斯科。他为此亲自上书沙皇和军政大臣，于一八五九年四月获准退伍，移居特维尔。这时，他完全恢复了写作生涯。一八五九年，他先后在《俄语》和《祖国纪事》两个刊物上发表了中篇小说《舅舅的梦》和《斯杰潘契科沃村》。这年的年底，他终于回到了阔别十年之久的彼得堡。

重返文坛

彼得堡热烈地欢迎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把他看成是当年别林斯基的战友，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成员和经历了十年苦役和充军的受难者。作家四十年代的作品被淹没了十年之后，再版问世，与新一代读者见面。人们对《穷人》的兴趣不减当年，阅读时仍然激动不已。当然，在广大读者中间引起最强烈反响的首先还是作家的新作。一八六〇年和一八六一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两部大型作品《死屋手记》和《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相继问世，立即引起读者和评论界的好评。

《死屋手记》是世界文学中揭露暗无天日的监狱生活的最优秀的作品之一。这是一部大型报告文学，但作者把它叫作长篇小说，因为书中事件的叙述者戈良契科夫是个虚构的人物，他是个苦役犯，出于嫉妒而杀死了妻子，因此被判处苦役。全书以戈良契科夫的手记的形式真实地再现了苦役监狱里令人恐怖战栗的生活。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狱中的一切既不加任何粉饰，也不故作夸张和渲染，而用朴素无华的笔调，完全如实地把它表现出来。但是这里的生活被表现得越是朴实，就越是令人感到恐怖。服苦役的囚徒绝不是什么杀人不眨眼的魔王，而都是普普通通的人；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都是无辜的，是为了反抗压迫和迫害才犯了罪的。有的为了“保卫妻女们、姊妹们的名誉不受荒淫暴君的玷污”而杀了人；有的“被无数密探包围着，保卫着自己的自由、生命，常常饿得要死”，在流浪中犯了罪；甚至还有人“故意犯罪，只求被抓去罚做苦役，以便逃避必须服更重的苦役的自由生活。他从前过着最大极限的屈辱的生活，从来没有吃饱过肚子，从早到晚给老板做工；而在苦役中，工作比外边轻松些，有面包吃”。苦役犯西罗特金本是个温良、诚实的人，被抓了壮丁，在新兵营里不管怎样规规矩矩，都随时随地遭受欺凌，只能一个人躲到角落里去哭。一次夜间站岗时，他决定自杀，把步枪对准胸膛，用脚趾扳动枪机。但不料连扳了两下，枪也没有响。不一会儿，队长前来查岗，无缘无故地对他破口大骂。西罗特金端起步枪，把刺刀插进他的身上。结果是他挨了四千军棍，被判处苦役……

在苦役犯中当然也有真正的恶人歹徒。加辛就是个“人那么高大的大蜘蛛”，他专以宰杀小孩为乐趣，往往把小孩引到便于下手的地方，先是吓他，折磨他，然后再慢慢地、津津有味地杀他。这种大蜘蛛的形象是资产阶级迫害者的化身，后来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经常出现。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死屋手记》中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表现了苦役犯们遭受的种种骇人听闻的屈辱，深刻揭露了沙皇专制制度的反动残暴。苦役监狱中的狱吏作为官僚制度的代表者享有无限的权力，都是些淫虐狂。要塞参谋某少校统治着二百多个囚徒，在他们身上无限制地行使自己的权力。他规定囚徒们睡觉时必须向右边侧卧。他往往在深夜突然闯进牢房，如果看见有的囚徒向左侧卧或朝天仰卧，第二天就要进行惩罚。舍列比亚特尼科夫中尉在行刑时像个美食家吃着精美的食品一样，不断变换花样，津津乐道地品尝着虐待人的“美味”。在这样一群完全丧失了人性的残暴之徒的统治之下，“很难想象把人的天性歪曲到了什么地步”。囚徒们也是人，他们也有人格的尊严。“不管烙印、脚镣、手铐都不能使他们忘记自己是个人……因此必须以对人的态度对待他们。”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作《死屋手记》的主旨，是他对沙皇反动的暴力统治提出的愤怒抗议。后来，托尔斯泰读过《死屋手

记》之后说：“我真不知道在全部新的文学作品中，连普希金也算在内，还有比这更好的一部书。”

长篇小说《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写的是“小人物”的遭遇。全书包括两个故事：一个是工厂主斯密特一家祖孙三代相继死亡的历史，另一个是穷贵族伊赫美涅夫倾家荡产，女儿娜塔莎遭受诱骗的历史。这两个家庭毁灭的祸根都是资产阶级冒险家瓦尔科夫斯基公爵。他诱拐了斯密特的女儿娜佳，骗去全部财产，然后把她遗弃。娜佳贫病交加，死在不见阳光的地下室里。她的女儿小尼丽怀着复仇的种子，显示了被虐待者的人性尊严，高傲而倔强，最后含恨而死。伊赫美涅夫忠心耿耿地为瓦尔科夫斯基管理庄园，但是却被他诬告而吃了官司，名声被玷污，财产被霸占，女儿娜塔莎又被瓦尔科夫斯基的儿子阿辽沙所诱骗。这两个悲惨的故事并行发展，由作家伊万·彼得罗维奇联系在一起，他既是故事的叙述者，又是事件的参与者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思想观点的表达者。

小说以斯密特之死作为开端。这个孤独的老人和他那条仿佛也有八十高龄的瘦狗相依为命，一出场就谜一样地死去。他的死把读者带到阴森凄惨的彼得堡的贫民窟。作家在贫与富相对照的背景下广泛描写了遭受欺凌和压迫的“小人物”的悲惨生活，表现了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惊心动魄的惨剧，尖锐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所引起的深刻社会矛盾。

瓦尔科夫斯基公爵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创造的一系列恶人歹徒形象，“以掠夺为生的典型”的开端，是作家笔下第一个吸人血的大蜘蛛的形象，第一个资产阶级掠夺者的形象。他只承认自己无休止的欲望，并且为满足这种欲望不惜采取任何手段。“为所欲为”。这就是他所奉行的人生哲学。他自己供认：“一切，整个世界都是为我而创造的……生活是一种商业勾当……我喜欢权势、官衔、漂亮的住宅；打牌押大赌注……可是，主要的一点，主要的一点是女人……我从来没有为什么事情受过良心责备。我一切都同意，只要对我有好处。”

《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写于作家流放归来之后。如果说他在苦役地发生的世界观的变化还没有明显地影响到《死屋手记》的写作，那么在这部小说中则已经开始表露出来，使它的思想倾向异常矛盾。瓦尔科夫斯基公爵与其牺牲者之间的激烈冲突，本来是资本主义社会里贫与富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的表现，但是却被作者那种超历史的道德说教给变成某种抽象的道德冲突。陀思妥耶夫斯基不能理解资本主义社会里悲剧产生的真正原因，在他看来，瓦尔科夫斯基公爵乃是“一般人类”所共有的恶的体现者；他那种兽性的利己主义似乎隐藏在每个人的灵魂深处，随时都在与人所固有的“善”进行斗争。因此，瓦尔科夫斯基公爵的形象就具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令人恐惧的“恶魔”的特点。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懂得道德心理矛盾是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反映，他总是企图把它解释成宗教道德原则和背离宗教而丧失道德原则之间的冲突，认为拯救人类的唯一出路就是宗教。小说中所有的“好人”都是可怜的、没有个性的、寒酸而驯良的。小尼丽骄傲，病态地自尊，以玩弄灵魂的创伤为乐趣，并且把这当作惟一可能做到的抗议和复仇的手段。小说充满了悲悯、受难的调子，悲怆凄惋的气氛。娜塔莎认为“幸福应该以受难来获得”，“受难可以使一切都得到净化”。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悲剧不在于社会阶级压迫，而在于人们在道德上的分散。“人们说，饱汉不知饿汉饥；我得补充一句……就是饿汉之间也不是经常都了解

的。”而能够使人彼此了解，达到道德上和谐一致的，似乎就是顺从和受难。

《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发表后，进步的评论界敏锐地注意到了它的这种思想矛盾。革命民主主义评论家杜勃罗留波夫在《逆来顺受的人们》一文中指出，“逆来顺受的人们”的软弱性就在于他们在强大的压迫者面前不知寻找出路。“这些不幸的、逆来顺受、受尽屈辱、受尽诬蔑的人们的处境，就应当是毫无出路的吗？他们可以做的，就惟有沉默、忍耐，还有变成一块肮脏的抹布，把自己默默的顺从的感情掩藏在最模糊的褶皱里吗？”小说中的作家伊万·彼得罗维奇是作者鼓吹的驯服的化身。他跟娜塔莎本来是一对青梅竹马的情侣，可是他知道了娜塔莎受到阿辽沙的诱惑以后，竟然决定自我牺牲，为他们而奔走。杜勃罗留波夫把这种自我牺牲精神叫作“破布似的心，母鸡似的感情”。革命民主主义者对《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这种批评，反映了他们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解决俄国社会发展一系列根本问题方面的原则分歧。

社会思想大论战

陀思妥耶夫斯基回到彼得堡以后，这里的政治气氛跟十年前他被捕的时候已大不一样。随着专制农奴制总崩溃的到来，以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代表的一批革命民主主义者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成了俄国解放运动的领导力量。在废除农奴制的准备和进行期间，在如何废除农奴制，农奴制废除以后俄国走什么道路的问题上，革命民主派与贵族自由派展开了激烈的论战。贵族自由派是资产阶级化了的地主的政治代表，希望“自上而下”地废除农奴制，也就是最大限度地保护地主阶级的利益，既不摧毁沙皇专制政体，也不摧毁地主的土地占有制，只是给农民以人身自由，以便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解放劳动力，从而把俄国逐渐地引上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而革命民主派则代表着广大农民群众的利益，主张连同土地解放农民，彻底消灭地主经济，发展“村社”经济，在俄国实现社会主义。这当然还是一种空想社会主义，最终不可能实现，但却反映了农民的土地要求。革命民主派清楚地看到了沙皇政府无力解放农民，因此大力开展革命宣传，准备发动农民革命，推翻沙皇政府，消灭地主阶级的政权。一八六一年二月，沙皇政府颁布了废除农奴制的法令。贵族自由派对此大加粉饰和歌颂，革命民主派则揭露这次“农民改革”的欺骗性和掠夺性，希望把俄国引向公开的阶级斗争的道路。

陀思妥耶夫斯基流放归来后，对俄国的社会政治问题已经形成自己的一套主张，既不同于革命民主派，又不同于贵族自由派。他觉得自己应该主宰俄国社会舆论，为此必须有自己的阵地。恰好他的哥哥几年来经商积累了一些资本，很支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想法，决定出资给他创办杂志。作家认为自己靠着从前的声望，也定能取得成功。一八六一年一月，他主编的月刊《时间》开始创刊。他在杂志的发刊辞里提出一个所谓“土壤”主义的理论，作为刊物奉行的纲领。这种理论认为俄国进步知识界脱离了人民这个“土壤”。“没有土壤，什么也不会生长，什么果实也不会有”。但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的“土壤”是指人民身上那些保守落后的东西。因此“土壤”主义实际上是一种反对进步、主张倒退的理论，它反对资本主义，但却企图固守过了时的宗法制度。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六十年代的政治思想斗争中和文学斗争中起初是以“中立者”、“调停者”的身份出现的。他既不同意反动文人卡特柯夫及其《俄罗斯导报》的自由主义观点，也不赞成《现代人》杂志的革命民主主义立场和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在文艺观点上，他一方面反对“为艺术而艺术”论者，另一方面又攻击杜勃罗留波夫的美学思想；他维护现实主义，但却把革命民主主义美学思想说成是功利主义。随着斗争的深入发展，这种“中立”的立场越来越成为一种幻想，他的锋芒所向最终还是革命民主派。他反对他们的空想社会主义理想，反对他们的唯物主义哲学，反对他们的暴力革命的思想。一八六二年，俄国出现了一批秘密革命团体。五月份，彼得堡发生火灾；沙皇政府为了给镇压革命制造借口，散布谣言，诬陷革命者是纵火者。一天早晨，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自己家门前拾到一张题为《致俄国青年一代》的革命传单，于是专程拜访了车尔尼雪夫斯基，要求他发挥对青年的影响，制止他们的革命行动。从这件小事也可以看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对革命所采取的立场。

这一年夏天，陀思妥耶夫斯基首次去国外旅行，到了英、法等比较发达

的资本主义国家。旅行归来后，他根据国外见闻写了《冬天记的夏天印象》一书，描写了西欧的资本主义现实，明确表达了自己对俄国农奴制废除以后日益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的态度。他亲眼看到了西欧资本主义文明的虚伪。

“什么是自由？什么样的自由？大家在法律范围内一律有权为所欲为的自由。什么时候可以为所欲为？当你有百万钱财的时候。自由是否能给每一个人百万钱财？不能。什么是没有百万钱财的人？没有百万钱财的人，不能为所欲为，却只能任人所为。”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只看到了资本主义剥削的残酷性，却没有看到这种社会制度与封建制度相比的进步性。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站在右的方面进行的，不了解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必然陷入极端的悲观主义。他把欧洲的未来想象成人类文化的毁灭。他不相信工人阶级能够把资本主义埋葬掉，建立起前所未有的美好社会，他甚至认为“工人在灵魂上也都是私有者”。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俄国不同于西欧，不存在阶级对立。只要上层阶级能与人民在道德上和谐一致，就可以达到和解，因此他竭力鼓吹和解，认为这是俄罗斯民族的天性。只要发扬这种天性，就可以消除资本主义的灾难。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出国期间，俄国反动势力开始向进步社会力量进行疯狂的反扑。一八六二年七月，沙皇政府逮捕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封闭了《现代人》杂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时间》尽管立场保守，但也没有逃脱掉反动势力的迫害。一八六三年五月，这家杂志由于发表文章涉及到沙皇政府残酷镇压波兰起义的问题而遭到查封。

一八六三年初，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监狱里写成的宣传空想社会主义的长篇小说《怎么办？》，公开发表，引起反动文人的疯狂围攻。陀思妥耶夫斯基于一八六四年发表了长篇小说《地下室手记》，这是他的最反动的作品之一，矛头所向也完全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及其小说《怎么办？》。他在这部作品中以一个虚构的作者第一人称的口吻，尽情地倾吐了绝望的颓废和疯狂的呓语，恶毒地攻击唯物主义哲学和空想社会主义，把理性说成是利己主义的根源。全书分上下两部，上部全是内心独白，下部则以忏悔录的形式叙述了两个可怕的故事：一个讲述可怜的作者怎样受到有钱有势者的蔑视和凌辱；第二个叙述作者怎样残酷地欺凌一个可怜无告的妓女。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十九世纪的人只能做一个滑头，如果要想成为一个有品格、有作为的人，必定受到多方面的压迫和限制。人类命定地向着目标努力前进，然而往往被送到不可知的命运中去，因此一个人最好是一点事情都不要做，只是沉入一种懒惰的冥思遐想就够了。在这个世界上，被侮辱者又去侮辱别人，幻想者痛感自己的无力，终于屈服失望，沉沦到不可救药的地步。高尔基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地下室手记》的主人公身上，“通过用特别鲜明完美的文字的描绘，写出了自我中心主义者的典型，堕落蜕化者的典型。陀思妥耶夫斯基怀着对个人的不幸和苦难，对青年时代的迷恋进行报复的贪得无厌的复仇者的胜利感，通过主人公的形态，显示了十九世纪脱离生活的年轻人中间的个人主义者会堕落到发出怎样卑劣的锐叫。”

一八六四年三月，陀思妥耶夫斯基得到沙皇政府批准，创办了一个新的杂志，定名为《时代》，与复刊后的《现代人》杂志继续论战。但是这一年七月，哥哥米哈伊尔突然逝世。杂志的编务完全落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个人身上，他的癫痫症发病频繁，杂志亏损严重，无力继续维持下去，不得不于一八六五年六月停刊。但是他跟革命派的论战并没有就此结束，不过是以文

艺作品的形式出现了。

一八六五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发表了长篇小说《罪与罚》。这是第一部给他带来世界声誉的作品，思想艺术成就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即使是这样一部艺术杰作也没有摆脱论战的性质。作家把主人公的犯罪与革命的暴力混为一谈，目的在于攻击革命民主派的唯物主义哲学。在他看来，理性一旦脱离基督的爱，就会产生“为所欲为”，就会引导人去犯罪。然而决定《罪与罚》的思想艺术价值的并不是这些论战的因素，它自有其伟大之处。

第二次结婚

《罪与罚》正在杂志上连载，还没有最后写完，就已成为轰动一时的名著。可是任何人也不会想到，正在执笔写作这部艺术杰作的作者，会是处境无比艰难。一八六四年四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第一个妻子患肺病而死，接着他的哥哥又离开人世，留下了一家老小；《时代》杂志亏损严重，被迫停刊。一连串的不幸接踵而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经济上异常困窘，负债累累，在精神上痛苦不堪。债主不断向他讨债，威胁他，要查抄他的财产，并逮捕他下狱，他急待偿清的债务共有三千卢布，他曾多方设法弄钱，但都无结果。想尽了方法要求债主再等些时间，都不许可，陀思妥耶夫斯基几乎完全陷入绝望的境地。这时出版商斯杰洛夫斯基跑来说，他愿意购买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有的著作版权，准备把这些著作印成三大册发行。为此他愿意出价三千卢布，但附有一个条件，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还要交出一部新小说给他印行，小说的篇幅要有七印张（相当于现在的全张报纸十张），限期半年交稿；如果到期不交，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前的全部著作将永远归出版商所有。陀思妥耶夫斯基正在一筹莫展之际，因此一切条件全部答应下来，只要自己不会因债务入狱就行。可是他这时正在全力以赴地赶写《罪与罚》，随写随在杂志上陆续发表；此外癫痫症还经常发作，使他受着难耐的痛苦，因此他根本不可能分出精力来另写一部小说。狡猾的出版商显然是乘人之危，提出苛刻的条件，企图占有陀思妥耶夫斯基著作的版权。合同是一八六六年四月订的，规定十一月一日以前小说交稿；可是到了十月初的时候，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一个字也没有写出来，甚至连小说的结构布局还都没有想好。朋友们都非常为他着急，有的建议找三四个人帮他一把，每人为他写一部分，然后由他自己捏合成一部作品。可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愿意把别人写的东西署上自己的名字，因此对朋友们的好意婉言谢绝。又有人建议他聘请一个速记员，由他口授，以便赶写这部作品。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口述作品的习惯，对这种写作方法半信半疑，但没有别的办法，也只好同意试试看。于是经人介绍，他聘请了速记学校的高材生安娜·格里高利耶芙娜·斯尼特金娜。这位年轻的女速记员很崇拜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常同情他的处境，对出版商的苛刻条件十分愤慨，因此她与作家合作异常热心。陀思妥耶夫斯基每天晚上打好腹稿，第二天向速记员口述四个小时；速记员把速记下来的文稿带回家去翻译整理，经常工作到深夜，次日把整理好的文稿带给作家。工作进展非常顺利，他们每天看到书稿又有所增加，心中都特别高兴。这样，从十月四日起到二十九日，共用了二十六天的时间，一部符合出版商的苛刻条件的新小说完成了，这就是《赌徒》。十月三十日，这天恰好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四十五岁生日，他怀着胜利的喜悦，交出了书稿，粉碎了出版商的阴谋。

陀思妥耶夫斯基自从第一个妻子死后，接二连三地遭到不幸的打击，在精神上感到异常孤单和苦闷。安娜是个聪明活泼的姑娘，心地善良，不仅崇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天才，而且十分同情他的不幸遭遇。二十几天的亲密合作，使他们之间滋生了爱情。小说完成以后，陀思妥耶夫斯基于十一月八日向安娜求婚，他们于第二年二月十五日举行了结婚典礼。这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四十六岁，安娜二十一岁。

婚后不久，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就出国旅行去了。生活是幸福的，他们真挚地相爱。安娜始终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狂热的崇拜者，她为自己的丈夫

感到无限骄傲。陀思妥耶夫斯基逝世以后，托尔斯泰曾经问过她：“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种什么样的人呢？”安娜回答说：“他是我所知道的一切人当中最仁慈的，最和善的，最聪明的，而且最豪侠的一个人。”她一直深情地照顾着年老病弱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既是他的妻子，又是他的速记员、誊写员、秘书、财务管理员，书籍发行人和销售员。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安娜结婚以后直到逝世的十四年，是他文学创作最多产的时期，他的全部著作中有一半以上是这个时期写成的，这肯定也有安娜的一份功劳。陀思妥耶夫斯基晚年几乎一时一刻也离不开安娜，每次到文学晚会去讲演或者朗读作品，差不多总是要安娜陪着，走上讲台以后还一定要用目光在台下的听众中间把安娜找到，然后才开始讲话。安娜为了使他尽快找到自己，常常在他站上讲台时用一块手帕在自己的脸上掠过，有时干脆就从座位上站起来。熟人们看出这种情形，不免开开玩笑，弄得安娜很是狼狈。有一次赴晚会时，她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说：“倘使这一次你还是一开始就寻找我，想在听众中找到我，那么我老实告诉你，我一定站起来，跑到远远的地方去。”可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却非常认真地回答说：“那么我一定要从讲台上跳下来，追你去，看你干什么，看你到哪儿去，我一定要这样的！”安娜知道，他真会这样做的。

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家庭生活中也曾有过苦恼，这主要是他对赌博的嗜好造成的。他在和安娜结婚前的几年，因为精神极端空虚，生活十分穷困，同时也是为了寻求刺激，就染上了这种不良嗜好。他梦想从轮盘赌上赢钱，还清债务，解脱经济上的困境，但实际上则往往在赌台上输得精光，甚至把他和安娜的结婚戒指都当掉，把安娜的衣服卖掉，常常是身上一文不名，连付房租和日常开销的钱也拿不出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任何问题上都喜欢走极端，赌起钱来也毫无节制。他在长篇小说《赌徒》里把这种心理描写得很逼真。这部小说是他和安娜的媒人，也是他们婚后生活的一种预言。安娜的日记和回忆录中都记叙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沉迷于赌博的情形，特别是一八六七年在国外的時候，安娜的全部日记几乎只记着一件事，那就是赌博。日记中详细记载着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天几次去赌场，怎样输光荡尽。他甚至常常跪在安娜面前，哀求她把最后一文钱拿给他去赌。可怜的安娜正在怀着身孕，总是柔顺地让丈夫把一切都弄去赌掉，自己躺在床上伤心地哭泣。有时候，陀思妥耶夫斯基输得精光回来，流着眼泪请求安娜原谅，安娜却跪着安慰他，说输掉一点钱没有什么要紧，使她最难过的不是输钱，而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简直不能写作，生活空虚得令人痛心。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也承认，如果在外国继续住下去，他的才能就会“毁灭尽净”。一八七一年，他大输了一场，从此终于下决心戒了赌。他在给安娜的信里诉说着自己如何被债务所逼，梦想赢钱，这种龌龊的想法使他痛苦了十年之久，现在已完全消灭。他说：“赌博是一条铁链，过去束缚着我；可是现在我要想到我的工作，我不再像以前那样只是胡思乱想着赢钱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旅居国外四年多，于一八七一年七月回到彼得堡。在这个期间，他们生了一个女儿，作家完成了长篇小说《白痴》和中篇小说《永久的丈夫》。他们在回国前夕赶上了轰轰烈烈的巴黎公社起义。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不理解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他当时在给友人的信中，以及后来在长篇小说《少年》中，提到巴黎公社时都持反对的态度。

最后的十年

陀思妥耶夫斯基从一八七一年携家归国以后一直到逝世的最初十年中，没有发生什么重大变故，常年住在彼得堡，有时也到斯塔罗鲁萨去住些时候。他戒绝了赌博，过着比较安静的家庭生活，全力以赴地从事写作。这个十年是他的创作最丰产的时期。

早在一八六八年旅居国外期间，陀思妥耶夫斯基就产生了一个宏伟的创作构思。他当时写信给玛伊科夫说：“在这里，我现在头脑里正在酝酿一部大型长篇小说，它的名称是《无神论》……”事过一年以后，他再次写信给玛伊科夫说，这部长篇小说将叫作《一个大罪人传》，其规模相当于《战争与和平》。这将是他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可能包括五部各自独立的中篇。“贯穿各部的重大问题，就是那个我为之自觉或不自觉地痛苦了一生的问题，亦即神的存在的问题。”这部小说的主人公，开始是个“虚无主义者”，他经历了无神论、寻求信仰、堕落和犯罪等几个阶段，最后出家，获得了宗教信仰，找到了生活的归宿。书中将以化名涉及到许多历史人物，诸如普希金、别林斯基等人。

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个创作构思并没能实现，因为他的经济状况不佳，为糊口而写作，没有时间从容不迫地去完成这样一部宏篇巨著，而必须为了稿费经常不断地交出稿件。这就把他的创作计划打乱，使他不得不应付眼前的急需。但是他的这个创作构思以及为此而准备的材料并没有白费，后来在写作《魔鬼》、《少年》和《卡拉玛卓夫兄弟》等三部长篇小说时都分别用上了。

《魔鬼》是一部论战性极强的作品，充分地表现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反动思想倾向，对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俄国解放运动、革命思想和社会主义进行了恶毒的攻击和诽谤。诚然，《罪与罚》、《白痴》等作品也都具有鲜明的论战色彩，但是其深刻的反对资本主义的主题则体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巨大艺术力量。可是《魔鬼》则抛弃了这一主题，是一部纯粹的反“虚无主义”小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亲自看到了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腐朽，但对革命思想又抱着敌对态度，因而竟然把二者混为一谈，认为这都是罪恶的渊藪。他否认俄国解放运动的现实社会基础，认为它完全是西方的舶来品。在他看来，无神论、社会主义思想不符合俄国人民固有的传统和民族精神；俄国人民是“神的体现者”，他的宗教信仰——东正教，才是拯救世界，消除资本主义灾难的精神力量。这就是作家在《魔鬼》中所企图表现的思想。此外，这部小说的写作还有一个具体的历史背景，即所谓涅恰耶夫案件。

涅恰耶夫原是彼得堡大学的旁听生，是学生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一八六九年春逃亡国外，在日内瓦结识了无政府主义头子巴枯宁，接受了他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和策略。第二年九月，他带着巴枯宁签署的“世界革命联盟俄国分部”的委任状返回俄国，秘密组建地下组织，在莫斯科建立了几个小组，名为“人民复仇”社，其成员主要是彼得罗夫农学院的学生。涅恰耶夫推行的是阴谋冒险政策，对其成员进行欺骗和恫吓。成员中有个姓伊万诺夫的大学生，不服从他的指挥，想要退出秘密小组。涅恰耶夫说他定要出卖组织，向政府告密，就强迫“人民复仇”社的其他一些成员于十一月二十一日将他杀死。沙俄警察当局在农学院校园里的池塘旁发现了伊万诺夫的尸体，很快就破了案，逮捕了凶手。于是“人民复仇”社彻底瓦解，涅恰耶夫潜逃国外。

这个事件当时轰动了俄国和西欧，各国报纸纷纷报道审讯情况。

涅恰耶夫案件是巴枯宁无政府主义的产物，是俄国解放运动中一股小小的逆流，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却以偏概全，拿来作为《魔鬼》的情节基础，用以攻击整个俄国革命。同时，《魔鬼》的构思并没有局限于涅恰耶夫案件，小说中许多形象都有所影射，甚至连屠格涅夫这样的自由派作家也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攻击、丑化的对象。作者企图证明：不信伸，就不可避免地导致道德沦丧，完全丧失一切善恶标准。

《魔鬼》的写作是一八七一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国外开始的，他回国以后于一八七二年完成。小说发表以后，作者得到反动势力的赏识。一八七二年，反动分子麦谢尔斯基公爵结识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并且把他介绍给沙皇政府的宗教会议议长波别道诺斯采夫。他们竭力拉拢作家，企图利用他的威望，使之为巩固沙皇专制制度卖力。麦谢尔斯基聘请陀思妥耶夫斯基主编他的杂志《公民》，给他薪金三千卢布，稿费另发，陀思妥耶夫斯基回国以后经济情况仍然十分困难，欠债达两万五千卢布，因此他接受了聘请。一八七三年一月，陀思妥耶夫斯基接手主编的《公民》周刊第一期出版，没有《作家日记》专栏，每期都由陀思妥耶夫基本人执笔，以政论的形式评论当前重大事件，有时也刊登一些短篇小说、特写和回忆录。一八七四年五月，陀思妥耶夫斯基辞去《公民》主编。一八七六年，他单独发行《作家日记》；一八七八年，由于忙于写作《卡拉玛卓夫兄弟》而将其停刊。后来，一八八一年和一八八二年，又各出了一期，最后一期和读者见面时，作家已离开了人世。

陀思妥耶夫斯基晚年虽然与沙皇政府的一些上层人物有所交往，但是反动势力对他并没有放松警惕，他一直处在警察的秘密监视之下，到一八八一年才解除。作家也确实有许多举动使沙皇政府对他不放心。他一直到逝世都跟俄国进步思想界保持联系。一八七四年，他跟青年时期的好友涅克拉索夫恢复了关系，并且把自己的长篇小说《少年》拿给涅克拉索夫在他主编的《祖国纪事》上发表。一八七七年，涅克拉索夫逝世，陀思妥耶夫斯基出席了安葬仪式，并且在墓前致了悼词。

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基本立场和观点并没有改变。一八八一年五月，他去莫斯科参加普希金纪念碑落成典礼，在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发出了绝望的狂叫：“顺从吧，骄傲的人！”

一八八一年初，由于安娜的多年努力，陀思妥耶夫斯基终于偿清了久压在身上的债务，纠缠了他一辈子的贫困略有减轻，可是他的健康情况却恶化了，肺部血管非常脆弱。一天夜里，他写稿时笔掉到书箱下面，他去搬动书箱，用力过猛，肺部血管破裂，血从喉咙流出。当时他没有在意，可是后来流血不止，终于医治无效，过了三天就与世长辞了。他死的那天是二月九日（俄历一月二十八日）。陀思妥耶夫斯基病重的消息很快就传遍整个彼得堡，许多不相识的人也来打听病情，日夜不断，慰问信件和电报纷纷而来。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后，遗体在家停放两天，吊唁的人群像潮涌一般，有的为死者朗诵赞美诗，有的为他守灵。举行安葬仪式时，数万群众跟在灵车后面，各学校、社会团体送的花圈排成长长的行列，学生们还组成歌唱队，唱着送葬曲。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遗体安葬在吉赫文斯克公墓，与他童年时所喜爱的诗人茹科夫斯基并排在一起。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生是苦难的一生，他遍尝了人间的各种苦难：贫穷、

疾病、坐牢、苦役、充军，乃至死刑处决前的恐怖。但他的伟大之处却在于他一生始终不渝地深切地同情穷苦的人们，为他们的悲惨命运而痛心疾首，深刻地揭发着、控诉着侮辱和损害他们的资本主义制度，并且为解脱他们的厄运而艰苦地寻求出路。当然，他摈弃了革命的道路，皈依上帝，号召顺从，但这也无济于事，他对上帝的乞求则变成绝望的狂叫。

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一个艺术家是伟大的。虽然他的作品中的宗教倾向对他那黑暗、不幸的祖国曾经有过不好的影响，但他却以其罕见的天才震撼了全世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文学史上与托尔斯泰并驾齐驱；他的创作是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发展的又一高峰，不仅体现了批判现实主义的基本特点，而且开启了二十世纪现代派文学的先河，其影响至今不衰。

主要作品介绍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位多产作家。他一生活了不到六十岁；从一八四五年开始文学创作，到一八八一年初逝世为止，中间去掉将近十年的坐牢、苦役和充军，有效的创作时间总共不过二十五六年。但是他却写出了长篇小说十几种，其中四五十万字，乃至百余万字的宏篇巨著就有五种，此外还写了几十种中、短篇小说；至于政论、评论、特写、回忆录等等，数量之多，更是惊人；他出版的几十期《作家日记》全是他一人执笔。这样的写作效率在俄国文学史上是空前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的创作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四十年代基本是他的摸索时期，他一方面继承着果戈理的传统，另一方面也在寻求着自己的道路。他流放归来以后的五六年间是个过渡时期，他继续着四十年代的探索，越来越多地表现出自己的艺术特点。从六十年代中期起，独特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风格最后形成，他的创作进入了完全成熟的时期。

农奴制废除以后，俄国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俄国的资本主义化采取了极其野蛮和腐朽的掠夺形式；资产阶级掠夺者冷酷残忍，卑鄙无耻，给广大劳动群众造成巨大灾难。破产的农民流落到城市，扩充着城市贫民的队伍；小市民、小手工业者、小商贩、小公务员穷困潦倒，走投无路；贫与富的社会两极尖锐对立，凶杀、卖淫、酗酒等社会犯罪和道德堕落的现象遍地皆是，令人怵目惊心。陀思妥耶夫斯基敏锐地观察着社会生活中这些新的变化，震惊于弱肉强食的资本主义法则。但却苦于找不到出路而发出绝望的喊叫。他的作品思想艺术价值不一，其中有的表现出浓厚的宗教情绪和反“虚无主义”，即反对革命民主主义的思想倾向。但是他在《罪与罚》、《白痴》、《卡拉玛卓夫兄弟》等优秀的长篇小说里则以卓越的艺术才华表现了资本主义兴起时代的典型特征以及贫与富的尖锐对立、金钱的罪恶、家庭关系的毁坏、犯罪现象的增多等病态的社会现象，满怀同情地描写了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苦难，对资本主义现实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这种描写和批判具有极大的艺术力量，使人读他的作品感到不寒而栗，在精神上经受着痛苦的折磨。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历来被称作“残酷的天才”。一九二六年，当他的第一部小说《穷人》中译本问世时，鲁迅为之作序，写道，陀思妥耶夫斯基“将自己作品中的人物们，有时也委实置之万难忍受的，没有活路的，不堪设想的境地，使他们什么事都做不出来。用了精神的苦刑，送他们到那犯罪，痴呆，酗酒，发狂，自杀的路上去。有时候，竟至于似乎并无目的，只为了手造的牺牲者的苦，而使他受苦，在骇人的卑污的状态上，表示出人们的心来。这确凿是一个‘残酷的天才’，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

《罪与罚》

《罪与罚》完成于一八六六年，是俄国文学中第一部反映资本主义取得胜利的时代的中篇小说，也是第一部全面体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风格的作品。小说的故事发生在十九世纪中期沙俄京城彼得堡的贫民窟。

一起凶杀案

一个中等身材、体格匀称的青年，从他那五层楼上棺材般的斗室里走出来，紧锁眉头，经过女房东的门口，慌忙走下楼梯。他已数月没付房租，每次外出从女房东门前经过时，总是提心吊胆，害怕她逼债讨租。

他穿过几条马路，走进一幢大楼，来到四层楼上，在一家门前停下，拉了门铃。一个目光尖利而又凶狠的小老太婆把门开了一道缝。青年挤了进去，自我介绍说：“大学生拉斯柯里尼科夫。一个月以前来过。”接着，他掏出一块怀表，要求抵押。老太婆只肯给一个半卢布。拉斯柯里尼科夫犹疑片刻，同意了。老太婆走进屋里去取钱，拉斯柯里尼科夫注意观察她取钥匙开钱柜的情景。临走时他说，过几天还要拿一个银烟盒来抵押。

第二天，拉斯柯里尼科夫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走着，突然看见那个放高利贷的老太婆的异母妹妹丽扎维塔正在跟一个小商贩谈生意，她答应明晚六点钟来这里，拉斯柯里尼科夫知道，放高利贷的老太婆家中只有她和丽扎维塔二人。明晚七点钟，丽扎维塔不在家，就是说家中只有老太婆一个人。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一个半月以前，拉斯柯里尼科夫把妹妹杜妮娅给他留作纪念的宝石戒指送到放高利贷的老太婆那里抵押了两个卢布。然后他坐在一家小酒店里，一边喝茶，一边想心事。旁边坐着的一个大学生和一个军官恰好正在谈论那个放高利贷的老太婆。大学生说，这个老太婆心肠狠毒，爱财如命，活在世上不仅毫无意义，而且为害别人。如果把她杀死，拿她的钱造福大众，就可以使几十个家庭免于穷困和死亡。杀死一人可救活百条性命，一桩轻微的罪行可以办成几千件好事。拉斯柯里尼科夫听到这里，不禁暗自惊奇，原来这正好与他不谋而合。近几天来，谋杀老太婆的想法，在他的头脑里已完全酝酿成熟。

次日，拉斯柯里尼科夫整天关在家里，头痛，食欲不振，一直躺在破沙发榻上，昏昏沉沉。天快黑的时候，一阵钟声把他惊醒。他霍地站了起来。楼梯上寂静无声，他的心剧烈地跳动。他急忙在外套里面缝了个圈套，找出用木头和铁皮伪造的“银烟盒”，然后悄悄溜下楼梯。他本想到厨房去拿斧头，可是不料厨娘正在厨房里面。他踌躇不决地在大门口站住，忽然一怔，只见看门人的小屋里空无一人，一把斧头在板凳底下闪闪发亮。他有气无力地叫了一声看门人，里面毫无动静。他走进小屋，直奔板凳，拿起斧头，挂在外套里面的圈套上，两手插进衣袋里，若无其事地走出来。

他一路上装出从容不迫的样子，慢腾腾地走着。运气很好，他溜进老太婆住的楼里时没被任何人发觉，在楼梯上也未遇见人。惟有二楼一套空房间的门开着，有两个油漆匠在里面干活，但一眼也没有看他。他到了四楼，心猛烈地跳着。他略停片刻，然后轻轻地拉了三次门铃。和上次一样，门开了一道缝，两条尖利、充满疑惧的目光射向拉斯柯里尼科夫。他走进屋里，老

太婆怀疑地打量着这个不速之客。拉斯柯里尼科夫掏出抵押品，递给老太婆。“好像不是银制的，”老太婆说着，向窗户转过身去，仔细察看这个抵押品。拉斯柯里尼科夫急忙从外套里面拿出斧头，双手高高举起，向老太婆的头部砍了下去。老太婆惨叫一声，倒在地上。

拉斯柯里尼科夫放下斧头，从老太婆右边的衣袋里掏出钥匙，跑进里面的卧室。他刚要去开五斗橱，只听钥匙哗啦一声，他浑身一阵痉挛。他觉得老太婆好像还活着，便向外屋奔去，操起斧头，向老太婆举起，但见她的脑壳已经碎裂，便没有再砍下去。他突然发现尸体的脖子上挂着一条带子，便伸手去拽，原来是个装得满满的钱袋。他急忙把钱袋塞进自己的衣袋里，然后拿起斧头，跑回卧室。他又去开五斗橱，但没有打开，便撇开它，爬进床下。那里有个箱子，他打开箱盖，在旧衣服里翻腾起来。串珠、表链、耳环、胸针等等，他忙不迭地往衣袋里塞。

突然，外间传来一阵脚步声。拉斯柯里尼科夫操起斧头跑出去。只见丽扎维塔站在屋子中央，木然地望着被杀的姐姐。拉斯柯里尼科夫蹿上前去，一斧头把她劈倒。完全意外地杀了第二个人，他越加惊恐起来，急忙在厨房里洗掉手上和斧头上的血迹，然后走出屋去。忽听楼梯上响起脚步声，拉斯柯里尼科夫转身退回屋里，掩上门，扣上门钩，屏息呼吸，侧耳倾听门外的动静。

门铃响了起来，门被拉得不停地抖动，越来越厉害，眼看门钩就要滑脱。这当儿，外面又来了一个人。两个来客拉了一阵门，见屋里毫无反响，转身要走。突然，其中一人说道：“门外没有上锁，在里面扣着，显然屋里有人，只是恐怕出了什么事。”二人商量一阵，决定一个留下，另一人下楼去找看门人。拉斯柯里尼科夫紧握斧头，准备相拚，但听到这里，略松一口气。留下的这个人等了一会儿，也下楼去了。拉斯柯里尼科夫急忙开门，走了出去。

他走到三楼，听到下面响起吵嚷声。已无处躲藏，只好听天由命，他硬着头皮迎了上去。可是突然，二楼那套空房间出现在他的面前，门开着，油漆匠已经走掉。拉斯柯里尼科夫一闪身，躲了进去。这时，下面的一伙人已经走上来，高声吵嚷着，向四楼奔去。拉斯柯里尼科夫急忙从屋里出来，一溜烟似地跑出大门，折进一条胡同，消失在人群里。他回到住处，看门人还是不在屋里。他把斧头悄悄放回原处，匆忙走进自己的斗室，一头倒在破沙发榻上。

走投无路的人们

拉斯柯里尼科夫的父亲是个外省的小官吏，早已过世。母亲把全家的希望寄托在惟一的儿子身上。她本来只靠微薄的抚恤金勉强度日，可是其中大部分又得寄给儿子。但即使如此，拉斯柯里尼科夫仍然被贫穷压得喘不过气来，无力缴付学费，不得不放弃学业。他处于一筹莫展的境地，而且他的亲人，母亲和妹妹正面临着严重的威胁。作案前一天早晨，他收到母亲来信，得知妹妹杜妮娅为了帮助家庭，给一个有钱的地主当家庭教师。主人斯维德里加伊洛夫虽已年过半百，但对年轻的女教师却抱着非分之想。一次吃晚饭时，他竟然在饭桌上调戏杜妮娅。他的妻子醋劲大发，立刻把杜妮娅撵出家门。外面下着倾盆大雨，杜妮娅连行李也来不及整理，雇一辆农家大车，走了十七里路，回到家中。社会上谣言四起，杜妮娅遭到诽谤，蒙受侮辱，无

法活下去。幸亏有她一封回绝斯维德里加伊洛夫的信件作证，她才得以洗清自己。恰好有个性卢仁的人，一心想娶个出身贫寒的姑娘，认为惟有这样的妻子才能对他服服帖帖，感恩戴德。于是他就看中了杜妮娅，在认识她以后第二天就向她写信求婚。为了哥哥的前途，杜妮娅答应嫁给卢仁，条件是他在彼得堡开办律师事务所时，将给拉斯柯里尼科夫安排点差事，让他把大学读完。母亲在信中把这个“喜讯”告诉拉斯柯里尼科夫，说她不久就要跟杜妮娅一起到彼得堡来，并且最近将寄给他二十五卢布，甚至可能三十卢布。

母亲的来信使拉斯柯里尼科夫痛苦万分，他很清楚，妹妹嫁给卢仁无异于卖身给他。为了哥哥，杜妮娅准备牺牲自己。可是拉斯柯里尼科夫不能接受她的牺牲。那么他该怎么办？“不让这件事发生？禁止吗？你又有什么权利呢？”拉斯柯里尼科夫完全陷入绝境，不禁想起昨天马尔美拉道夫向他提出的问题：“你明白不明白，明白不明白，仁慈的先生，走投无路是一种什么样的境遇？得让每个人有条路可走啊。”可是拉斯柯里尼科夫却无路可走。

无路可走的何止他一人！他抵押怀表那天，从放高利贷的老太婆家出来，觉得头痛，进了一家小酒店，在一个阴暗肮脏的角落里坐下。喝酒的人寥寥无几，一个五十开外的退职公务员喝得醉醺醺的，自称九等文官马尔美拉道夫，主动跟拉斯柯里尼科夫搭起话来。

马尔美拉道夫是个酒鬼，连老婆的袜子都卖掉喝酒了。他由于酗酒而丢掉了差事，全家六口，无以为生。前妻的女儿索尼娅纵然双手不停地干活，但一天也挣不到十五戈比。几个孩子常常一连几天见不到一块面包皮。索尼娅被逼无奈，一天早晨五点钟起床，扎上头巾，从家里走出。她八点钟回来，径直走到继母跟前，默默地站在她面前，把三十卢布摆到桌子上。这是她用肉体换来的钱……

当父亲的对一个陌生人讲述自己的亲生女儿如何被生活所逼沦落为娼。世上能有什么比这更凄惨的呢！马尔美拉道夫的每一句话都刺痛拉斯柯里尼科夫的心。他把马尔美拉道夫送回家。骨瘦如柴的卡杰琳娜·伊凡诺芙娜患肺结核，见丈夫大醉而归，气得不停地咳嗽，破口大骂。睡在地板上的孩子被惊醒，哇哇地哭叫起来。一个大一点的女孩吓得躲在屋角，浑身瑟瑟发抖……

作案后过了几天，拉斯柯里尼科夫偶然来到一条街上。街心停着一辆豪华的四轮马车，周围集聚着一大群人。他挤进人群，只见地上躺着一个人，穿得破破烂烂，刚刚被马车压伤，满身鲜血，已经不省人事。他借着街灯暗淡的光亮仔细看去，认出这是马尔美拉道夫。拉斯柯里尼科夫要求警察把他送回家去。卡杰琳娜·伊凡诺芙娜见到丈夫血肉模糊地被抬回家来，绝望地叫喊着向他猛扑过去。孩子们惊叫着，浑身打着哆嗦。马尔美拉道夫苏醒过来，艰难地喘着气，嘴角淌着血。从人群中悄悄地胆怯地挤进来一个少女，一副街头妓女的打扮，穿一件廉价的花缎衣服，下摆长得令人可笑，头戴一顶圆草帽，上面插着一根色泽鲜艳的火红色羽毛。在这贫困、破烂的环境中，在这死亡和绝望的气氛下，她这套衣着使人感到说不出的痛苦。这就是索尼娅，她脸孔瘦削而又苍白，神色惊惶，张着嘴，两眼痴呆地凝视着垂死的父亲。马尔美拉道夫死死地盯着女儿，仿佛不认识她似的。突然，他认出了这个遭人歧视、悲痛万分、装束入时，但内心羞惭的女儿，惊叫道：“索尼娅，我的女儿！请你原谅！”索尼娅大叫一声，跑过去抱住了父亲。马尔美拉道夫躺在女儿的怀里，咽下最后一口气。

卡杰琳娜·伊凡诺芙娜看着丈夫的尸体，喊道：“他达到目的了！噫，现在我可怎么办哪！我拿什么来安葬他！明儿我拿什么给他们，给他们吃啊？”拉斯柯里尼科夫走到她面前，掏出母亲刚刚寄来的二十五卢布，对她说：“请收下吧，这是我对亡友应尽的一点绵薄的力量……聊表心意。”但是卡杰琳娜·伊凡诺芙娜的苦难并没有因此而减轻。她安葬了丈夫不久就发了疯。一天，她穿着破旧的衣服，给三个幼小的孩子化了妆，带着他们到大街上去唱歌跳舞，向行人乞讨。一个官吏前来干涉，说她有碍社会秩序。孩子们被母亲的疯癫给吓坏了，又怕被警察抓去，就不约而同地跑开。卡杰琳娜·伊凡诺芙娜嚎叫着，奔去追孩子，不料一跤摔倒，鲜血从她嘴里涌出，染红了马路。她被抬到索尼娅的住处，已经奄奄一息。

对于这些穷人来说，用得上一句俗语：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惟有一死，才能结束那永无止境的苦难。可是活着的还得继续受苦。

吸人血的“蜘蛛”

在这个世界上，除了这些颠沛无告的穷人之外，还有一些吸人血的“蜘蛛”，结成一面面巨网，穷人休想逃脱。

拉斯柯里尼科夫作案后不久，一个陌生人来访。此人已经不很年轻，衣冠楚楚，道貌岸然，声称他就是卢仁。拉斯柯里尼科夫一听卢仁的名字就很不高兴，再看他那副傲慢的样子，就更加感到厌恶，对他很不客气，冷嘲热讽，最后干脆把他赶了出去。但是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

马尔美拉道夫惨死车轮下那天，拉斯柯里尼科夫回到家里大吃一惊，原来母亲和妹妹来了，在家已经等了他一个半小时。她们告诉他说，火车晚点，卢仁没有到车站去迎接。拉斯柯里尼科夫明白，卢仁把杜妮娅母女骗到彼得堡来，使她们完全依附于他，就可以随意摆布她们。因此，拉斯柯里尼科夫要求杜妮娅明天立即写信给卢仁，宣布解除婚约。

第二天早晨，杜妮娅母女接到卢仁的一个便条。他首先为昨天没能去车站迎接她们母女表示歉意。接着又说他将于今晚八时前来看望她们，但不希望有拉斯柯里尼科夫在场，因为他昨天竟然把母亲寄给他的钱全都送给一个醉鬼的下流女儿。原来卢仁是个极端的利己主义者，奉行着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人生哲学。他在拜访拉斯柯里尼科夫时曾经公开宣称：“你爱人，首先得只爱自己，因为世上一切都以个人的利益为基础。”他来到彼得堡以后，亲自去找拉斯柯里尼科夫，本指望被当作大恩人，尊为上宾，受到顶礼膜拜，可是没料到拉斯柯里尼科夫对他却十分鄙视，并且把他骂了出去。卢仁知道，拉斯柯里尼科夫定将成为他占有杜妮娅的障碍。于是他就来个恶人先告状，写了这个便条，捏造事实，挑拨他们母子和兄妹关系。

拉斯柯里尼科夫看了便条，向母亲和妹妹说明了事情的真相，介绍了马尔美拉道夫惨遭横祸的情形以及他家的悲惨处境。母女二人企图调解拉斯柯里尼科夫和卢仁之间的关系，主张晚上卢仁来访时拉斯柯里尼科夫必须在场。不料拉斯柯里尼科夫当众揭穿了卢仁的谎言。卢仁恼羞成怒，大发雷霆，指责杜妮娅母女不该把他的便条拿给拉斯柯里尼科夫看，并且威胁杜妮娅，要求她在哥哥和未婚夫之间选择一个。杜妮娅看清了卢仁的真面貌，把他赶了出去。卢仁没料到这个穷家姑娘竟敢如此无礼，认为祸根全在拉斯柯里尼科夫身上。他不甘心失败，决计报复。

卢仁到彼得堡以后，一直住在从前受过他监护的列别佳德尼科夫那里，恰好与马尔美拉道夫一家同住一楼。卡杰琳娜·伊凡诺芙娜安葬丈夫之后请人吃回丧饭那天早晨，卢仁把一些公债券兑换成现钞，坐在桌旁清点。他让列别佳德尼科夫把索尼娅叫来。对她一家的处境深表同情，答应以后要竭力帮助无依无靠的卡杰琳娜·伊凡诺芙娜。他当场拿出一张十卢布的钞票送给索尼娅，并且把她送到门口。

全楼的房客几乎都集聚在卡杰琳娜·伊凡诺芙娜家吃回丧饭。拉斯柯里尼科夫也应约前来。大家缅怀已故的马尔美拉道夫。突然，卢仁出现在门口，说他怀着一片好心赠给索尼娅十卢布，可是送走她之后，竟然发现少了一百卢布。卡杰琳娜·伊凡诺芙娜十分气愤，责备索尼娅不该接受卢仁的恩惠，向她要出那十卢布，把钞票揉成一团，照卢仁的脸丢了过去。卢仁一口咬定索尼娅偷了他一百卢布，要求卡杰琳娜·伊凡诺芙娜搜她的身。卡杰琳娜·伊凡诺芙娜把索尼娅的一个衣袋翻过来，里面空空，只有一条手帕。可是当她翻另一个衣袋时，却有一个纸团从里面掉出来，落到卢仁脚下。卢仁拣起来，把它舒展开，让大家看，果然是一张一百卢布面额的钞票。在场的人无不惊讶。索尼娅站在原地一动不动，脸涨得通红，惊叫道：“我没有偷！我不知道！”这时，列别佳德尼科夫揭穿了卢仁的栽赃陷害。原来这一百卢布是卢仁送索尼娅走到门口时偷偷塞进她的衣袋里的。当时列别佳德尼科夫看得一清二楚，以为卢仁完全是出于好意。卢仁矢口否认，说他跟索尼娅一无冤二无仇，绝不会陷害她。一直沉默的拉斯柯里尼科夫站了起来，揭穿了卢仁的卑鄙目的。索尼娅是个地位最卑贱的人，谁都可以任意侮辱她，伤害她。卢仁利用她的这种处境，诬陷她为小偷，企图以此证实拉斯柯里尼科夫送钱给这个下流女人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从而破坏她的声誉，造成他与家庭的不和。这样，卢仁即可重新占有杜妮娅。

如果说卢仁是俄国农奴制废除以后新出现的资产阶级掠夺者的典型，那么斯维德里加伊洛夫则是个旧式的农奴主。他在经济上已经破产，负债累累。玛尔法·彼得罗芙娜用三万银卢布把他从债务拘留所里“赎买出来”，跟他结了婚。从此，他成为巨富，过着极其荒淫而又残暴的生活。他残酷迫害农奴，致使农奴菲里普自缢身死。他曾奸污一个又聋又哑的少女，逼她吊死在顶楼上。他跟妻子订了个口头协定，按规定可以“跟女仆勾勾搭搭”，因此跟“黑眼睛的帕拉莎”“纠缠”而闹出“一场大乱子”。最后，他竟毒死妻子，刚刚把她埋葬就跑到彼得堡来寻花问柳。他在这里骗上了某家的少女，同时还想把杜妮娅弄到手。一天傍晚，斯维德里加伊洛夫突然出现在拉斯柯里尼科夫的斗室。他声称，杜妮娅跟卢仁结婚将会不幸。他希望拉斯柯里尼科夫设法让他与杜妮娅会一面，或者把他的意思转告杜妮娅：他准备赠给杜妮娅一万卢布，以解决她跟卢仁决裂后可能遇到的困难。斯维德里加伊洛夫还告诉拉斯柯里尼科夫，他的妻子已死，在遗嘱中给杜妮娅留下三千卢布，不日即可转交给她。拉斯柯里尼科夫知道他存心不良，当即一一拒绝。企图用金钱收买没能得逞，斯维德里加伊洛夫另生一计。他偷听了拉斯柯里尼科夫跟索尼娅的两次谈话，掌握了他犯罪的秘密，便以此要挟杜妮娅，逼迫她就范。他把杜妮娅骗到一个屋子里，锁上门，对她进行威胁。一切阴谋手段都破产之后，他就原形毕露，企图强奸杜妮娅。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说中对这个披着人皮的禽兽进行了惩罚。这个淫棍对杜妮娅的追求完全失败，兽欲得不到满足，就失去了生活的兴趣。他最后

在绝望中把手枪抵在太阳穴上，开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死前做了一夜恶梦，仿佛是对一生的罪恶做了个总结。他梦见一具棺材里躺着一个少女，“遭受凌辱而投河自尽，她只有十四岁，可是她的心却已碎了，这颗心因受尽凌辱而毁灭了，这样的凌辱吓坏了那还未成熟的、幼稚的灵魂，使她那天使般纯洁的心灵充满了不应受的耻辱，逼迫她迸出最后一声绝望的叫喊”。描写斯维德里加伊洛夫死前那一夜的篇章，属于小说中最精彩的文字。彼得堡阴暗凄凉的天空、狂风暴雨、严寒浓雾、肮脏的小旅店、到处乱窜的老鼠等等，仿佛是斯维德里加伊洛夫的恶梦在现实中的投影，是他那肮脏而空虚的灵魂、罪恶的一生的象征。他想要摆脱这一切，惟有一死。

犯罪“理论”的破产

小说的主人公拉斯柯里尼科夫杀人抢劫，但却不是一个普通的罪犯。他观察、思索着现实生活，形成一种“理论”，并且在杂志上发表了题为《论犯罪》的文章，阐述了这种“理论”。他把所有的人分成“平凡的”和“不平凡的”两类，认为“平凡的”人活在世上必须俯首帖耳，惟命是从，任人割宰；而“不平凡的”人则可以为所欲为，有权做各种犯法的事，为实现自己的目的，甚至可以踏过尸体和血泊，随意屠杀别人。索尼娅遭受卢仁诬陷那天晚上，拉斯柯里尼科夫对她讲了自己的犯罪动机。他说：假如卢仁的陷害阴谋得逞，那么索尼娅就会被当作小偷给投进监狱，卡杰琳娜·伊凡诺芙娜和孩子们也就活不下去。接着，他问索尼娅：是让卢仁活着为非做歹，让卡杰琳娜·伊凡诺芙娜和孩子们死去，还是让他们活着，让卢仁死去？以此类推，放高利贷的老太婆是只吸人血的“蜘蛛”，是让她活着残害成千上万的穷人，还是杀死她，拿她的钱为穷人造福？拉斯柯里尼科夫根据自己的“理论”选择了后者。他说：“我需要的主要不是金钱……我要知道，要快些知道，我同大家一样是只虱子呢，还是一个人？我能够越轨还是不能越轨……我是个发抖的畜牲呢，还是我有权利”为所欲为。他“想成为拿破仑，所以才杀了人”。

《罪与罚》是一部社会哲理小说，不仅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胜利所引起的尖锐社会矛盾，而且也反映了这个时代激烈的思想冲突。作家把这些矛盾和冲突提到哲学的高度加以解释和进行艺术描写，使作品具有极大的思想容量和深度。小说中高度概括的社会哲学问题，首先表现在拉斯柯里尼科夫的“理论”之中，而他的“理论”又与他的整个形象浑然一体。也就是说，他的行为既出自于他的生活境遇和性格气质，又符合他的理论主张。

拉斯柯里尼科夫观察着他周围的人所遭受的贫困和凌辱、苦难和不幸，也看到了少数人的专横跋扈和鱼肉弱小。他苦苦思索，企图从这种社会不平等中洞悉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他清楚地看到，在这个社会里，人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做统治者，要么做奴隶；要么做刽子手，要么做刀下鬼；吃人，或者被吃。前程、财富、地位等等，这一切诱人的东西，通过老老实实的劳动是得不到的。拉斯柯里尼科夫看透了资产阶级的法则，但他并不寻求消灭这种法则的途径，根本不想超脱它，而企图顺从它，并且为此而创造了他的“理论”。他杀人的主要目的是想实验一下自己的“理论”，解答如下问题：他自己是个什么人？是否是“不平凡的”人？为了取得统治权，能否随意犯罪而不受到良心的谴责？总之，他是否适合充当资本主义世界的主人，随意

折磨千百万人。可是实验之后，拉斯柯里尼科夫手染鲜血，灵魂颤抖了，陷入内心斗争的无边痛苦之中，感到自己与人类完全脱节。小说通篇表明，拉斯柯里尼科夫这种“理论”——“超人”哲学必然破产。作家一步步引导读者确信，主人公选择的道路是错误的，最终必定导致精神的崩溃和道德的毁灭。

拉斯柯里尼科夫犯罪以后，不管销赃灭迹如何彻底，都无法摆脱恐怖感，因而疑神疑鬼，处处露出马脚；不管如何为自己开脱和辩解，都无法消除犯罪感，因而处处与人格格不入，无限孤独。作案后第二天早晨，一阵猛烈的敲门声把他惊醒。看门人送来一张传票，要求他九点钟到警察局去。他惊恐万状，到了警察局以后，心里才一块石头落了地：原来是女房东向他追索欠款。他在保证书上签了字，刚准备离去，忽然听到警察们在议论昨晚发生的凶杀案。他还没有走到门口，就觉得眼前一片昏黑，晕了过去。他清醒过来后，发现自己坐在椅子上。身边站着警官，向他问话。他支支吾吾地回答了一阵。他回到家，觉得警方对他起了疑心，担心他们来搜查，就把藏在墙角里的赃物和钱款取出来，拿到离家很远的一个偏僻的地方，埋在一块大石头底下。

接着，拉斯柯里尼科夫就病倒了，三天三夜完全不省人事，不断说着呓语。他的同学拉祖米兴前来护理他，为他请来医生。第四天，拉斯柯里尼科夫苏醒过来，听到拉祖米兴和医生在谈论那起凶杀案。出事后第二天，有个油漆匠到一个小店主那里抵押耳环。小店主询问他耳环的来历，见他前言不搭后语，就怀疑他是杀害老太婆的凶手，因此到警察局告发了。油漆匠被捕后，先说耳环是在人行道上拾到的，后来又说是在他干活的那套空房间门后拣的。他至今还在关押之中。拉斯柯里尼科夫听了，更加心神不安。

他抵押给老太婆的怀表是父亲的遗物，戒指是妹妹送给他的纪念品。母亲和妹妹来到彼得堡以后，拉斯柯里尼科夫担心她们问起这两件东西。恰好拉祖米兴的远房亲戚波尔菲里·彼得罗维奇在警察局当侦缉科长，负责侦破那起凶杀案，因此就带着拉斯柯里尼科夫去请他帮忙。波尔菲里·彼得罗维奇满口答应，保证物品不会丢失，让拉斯柯里尼科夫写个声明书交来。拉斯柯里尼科夫临走时，波尔菲里·彼得罗维奇突然对他说：“在谋杀老太婆的案件中，那个油漆匠显然是无辜的，但是苦于没有证人，无法为他辩护。请问您上楼的时候可是七点钟吧？可曾看见二楼开着门的那套空房间里有人在刷油漆吗？”拉斯柯里尼科夫立即明白了问话的真实用意，仿佛是在回忆似地说：“没有看见，只记得四楼有人在搬家……”拉祖米兴在一旁若有所思地责备波尔菲里·彼得罗维奇：“您错了。油漆匠刷油漆是在案件发生的那天，拉斯柯里尼科夫到老太婆那里抵押怀表是三天前的事。”波尔菲里·彼得罗维奇连忙道歉，声称自己完全搞糊涂了。拉斯柯里尼科夫走到街上，咬紧牙关，握紧拳头，暗自发誓说，定要把波尔菲里·彼得罗维奇像拧柠檬一样拧干。然而事实上恰好相反。拉斯柯里尼科夫回到家，躺在床上迷迷糊糊地做了一个梦，梦见他走在街上，有个陌生人向他招手。他跟着那人走进一幢楼，里面空无一人。忽然间，他看见那个放高利贷的老太婆坐在一个角落里，向他狂笑。拉斯柯里尼科夫拿起斧头砍去，可是他越砍，老太婆就笑得越厉害。他惊恐万状，慌忙逃命。可是突然间，全楼里到处都是人，他已无处可逃。

拉斯柯里尼科夫精神完全崩溃了，他觉得杀死的不是老太婆，而是他“自

己”。他的灵魂颤抖了，他跑去问索尼娅：“怎么办？”

绝望中的幻想

拉斯柯里尼科夫是个悲剧人物，他的灵魂的崩溃和“理论”的破产，既是周围客观现实的悲剧，又是他主观思想彷徨歧途的悲剧。他的姓——“拉斯柯里尼科夫”就是“分裂”的意思。他的反叛是个人主义的和无政府主义的，充满无法解决的矛盾，因此必然失败。这种反叛及其“理论”依据则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里弱肉强食的生活法则和极端利己主义的人生哲学。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表现了主人公“反叛”的失败及其“理论”的破产，实际上就是批判了资产阶级的极端利己主义和“超人”哲学。这就是拉斯柯里尼科夫形象的客观意义。

但是另一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摒弃了革命的道路，否定任何社会反抗，因此他在《罪与罚》中又企图把拉斯柯里尼科夫的形象及其“理论”与革命民主派的“虚无主义”联系起来，把他的犯罪与革命暴力混为一谈。在他看来，理性，一旦脱离基督的爱，就会引导人为所欲为，就会使人走上可怕的犯罪道路。拉斯柯里尼科夫的悲剧不在于他实际上犯了罪，而在于他主张的“理论”会把人引向歧途，造成暴力和流血。他在道德上的毁灭，应该证明人的理性的无能，它必定破坏心灵的和谐。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人不应该靠理性而生，而应该靠心灵和宗教信仰而生；不应该反叛，而应该忍耐和顺从。

《罪与罚》中宣扬的社会哲理问题，作为作品的基础，不仅与情节溶为一体，决定了情节的发展线索，而且也渗透在人物形象之中，决定了人物形象体系的安排。小说中与拉斯柯里尼科夫形象及其“理论”相对立的是索尼娅的形象及其道德面貌和行动准则。拉斯柯里尼科夫问索尼娅：“怎么办？”按照作家的安排，答案就在索尼娅身上。

拉斯柯里尼科夫第一次来到索尼娅的住处，只见她的房间像个棚子，形状极不规整，墙壁糊的纸已经发黄，肮脏不堪，扯得破破烂烂，屋里几乎没有家具。站在他面前的这个十八岁的女孩子，每天从早六点到晚八点都得到街上去出卖自己的肉体。她不仅白白地毁了自己的青春，而且连投河自尽的权利也没有；她必须活下去，否则卡杰琳娜·伊凡诺芙娜的孩子们就得饿死。拉斯柯里尼科夫想到这里，情不自禁地跪到索尼娅的脚下，对她说：“我不是向你膜拜，我是向人类的一切苦难膜拜。”索尼娅是人类苦难的象征。她自觉地为人类而受苦，对人类怀着基督的爱。她的五斗橱上放着一部《新约全书》。这是她的已故好友丽扎维塔送的，她俩都是虔诚的基督徒。在拉斯柯里尼科夫的请求下，索尼娅念《新约全书》给他听，念的是关于拉撒路复活的那一章。歪斜的蜡台上残烛已快燃尽，在黑暗中照耀着两个罪人：一个杀人犯和一个卖淫妇。索尼娅念道：“耶稣对马太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必永远不死。’”拉斯柯里尼科夫彻悟了，原来他跟索尼娅走的是一条路，他决心去受苦，希望索尼娅跟他一同去。第二天，拉斯柯里尼科夫向索尼娅忏悔了自己犯罪的过程和动机，问她：“怎么办？”索尼娅答道：“去受苦赎罪”。并且答应他说：“我跟着你走，跟随你到天涯海角。”随后，索尼娅把丽扎维塔送她的十字架拿出来，对拉斯柯里尼科夫说：“咱们一块去受苦，一同背十字架。”

拉斯柯里尼科夫刚要去接十字架，立刻又把手缩回来，说道：“现在不要给我。还是以后再给吧。”

第二天，波尔菲里·彼得罗维奇来到拉斯柯里尼科夫的斗室，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他根据严密的逻辑推理，找出了凶手，明确地对拉斯柯里尼科夫说：“那个老太婆是你杀的！”拉斯柯里尼科夫无言以对，只是问道：“既然断定我是凶手，为什么不把我抓起来呢？”波尔菲里，彼得罗维奇回答说：“希望你去投案自首。”

就在斯维德里加伊洛夫自杀的那天晚上，拉斯柯里尼科夫跟母亲和妹妹告别之后，索妮娅给他挂上十字架，随后他来到警察局，从容不迫地对一个警官说：“是我当时用斧头砍死了那个年老的官太太和她的妹妹丽扎维塔。”警官惊讶得目瞪口呆。拉斯柯里尼科夫把自己的口供又重复了一遍。

小说的故事至此结束。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尾声中交待了主人公以后的命运。一年半过去了，拉斯柯里尼科夫在西伯利亚苦役地已经度过了九个月。

由于主动投案自首，拉斯柯里尼科夫只被判处八年苦役。宣判不久，索妮娅就跟随他来到西伯利亚。拉斯柯里尼科夫在苦役地生了一场重病；痊愈时，他想起了自己在神志昏迷之中做过的一个梦。他梦见全世界遭到可怕的瘟疫，城市和乡村，人人被传染，都发了疯。他们惶恐不安，互不了解，互相仇恨，互相残杀，不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谁有罪，谁无辜。于是农事荒废，发生了火灾和饥荒。所有的人和一切东西全都毁灭。全世界只有几个人获救，他们是纯洁的人，负有创造新生活的使命，将使大地更新和净化。

拉斯柯里尼科夫病愈出院后，一天清晨，一个人坐在河岸上，眺望那宽阔的、两岸荒凉的河流。索妮娅突然出现在他身边，她面容消瘦而苍白，亲切地向他微笑着。他俩一句话也没说，但索妮娅明白而且毫不怀疑，他爱她，无限真挚地爱她。这个时刻终于到来，这两张苍白的脸上已经闪烁着更新的未来和完全新生的曙光。他们还得等待七年，他们决心等待，决心忍耐。

拉斯柯里尼科夫的灵魂“再生”了，是索妮娅用基督的爱拯救了他。索妮娅的形象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关于宽恕和解、忍耐顺从的理想的体现者，她是靠着心灵，靠着对人的爱而生的。作家通过这个形象所表达的不过是一种绝望中的幻想。但是《罪与罚》中所描绘出来的实际生活，则比这种宗教情绪更有艺术感染力和逻辑说服力，构成了作品的主要思想价值。陀思妥耶夫斯基以惊人的艺术力量描绘了遭受凌辱和损害的穷人走投无路的处境和悲惨命运，对他们表现出切肤之痛；他极其深刻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和罪恶，批判了资产阶级的极端利己主义，塑造了一系列阴险可怕的资产阶级掠夺者的形象。所有这一切构成了小说鲜明的反资本主义的主题。因此《罪与罚》自问世以来一直被广大读者竞相阅读，直到今天仍保留着巨大的思想价值。

《白痴》

长篇小说《白痴》写于一八六七年十二月至一八六九年一月。跟《罪与罚》一样，这部作品的情节也是发生在十九世纪中期的彼得堡，但背景却不再是贫民窟，而是上层社会。因此这里很少涉及到底层群众的贫苦生活；但是《白痴》自有其独特的社会意义。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写作这部小说时给自己提出的是另一种任务。

被亵渎了的美

一八六七年十一月末的一天上午九点，从华沙开往彼得堡的火车向着终点急驰。三等车厢里，靠着车窗坐着两个年轻的旅客，彼此攀谈起来。一个是梅什金公爵，他父母双亡，自幼患上癫痫症，被送到瑞士治疗。两年前，他的保护人帕甫里谢夫突然去世。梅什金公爵失去了接济，因此不得不回国，准备投奔彼得堡的叶潘钦将军。他跟将军夫人是梅什金家族仅存的两个末裔。另外那个旅客是富商罗果仁之子，他曾经爱上彼得堡的绝色美人娜斯塔西娅·菲里波芙娜，花了一万多卢布买了一副钻石耳环送给她，因此触怒了父亲，从家里出逃。他在普斯科夫得悉父亲病故，留下二百五十万卢布的财产，他正急着赶回家去接受这一大笔遗产。《白痴》的故事情节就是围绕着梅什金和罗果仁跟娜斯塔西娅·菲里波芙娜的关系而展开的。

梅什金下了火车，来到叶潘钦将军的宅邸。将军早年当中尉的时候就跟他现在的夫人结了婚，以她那五十个农奴的陪嫁为基础，经过二十多年的奋斗，已经成了屈指可数的大富翁。如今他不仅官运亨通，地位显赫，而且财源茂盛。他是个工厂主、大地主，同时还是几家大公司的股东。将军事务繁忙，但仍然接见了梅什金公爵，对他的窘境深表同情，愿意给他以帮助。梅什金公爵一无财产，二无专长，而且疾病缠身，几乎是个白痴。幸亏他能写一笔好字，因此将军准备给他找个文书的工作。这时，将军的秘书甘尼亚·伊沃尔根从文件夹里取出一张照片递给将军看。这是娜斯塔西娅·菲里波芙娜刚刚送给甘尼亚的。梅什金也凑过来，只见照片上的娜斯塔西娅·菲里波芙娜穿着一身淡雅宜人的黑绸衫，看来像是深亚麻色的头发梳成简单的家常式样，黝黑而深邃的眼睛，沉思的前额，脸部表情热烈，仿佛非常高傲。梅什金端详着照片，心中暗自想道：“一张不可思议的脸！……我相信她一定有一段不平凡的经历。脸是快乐的，但她不是遭受过很大的痛苦吗，啊？”

接着，梅什金拜见了将军夫人和她的三个女儿。他称赞三小姐阿格拉娅美丽，说她跟娜斯塔西娅·菲里波芙娜一样美。于是他无意中泄露了甘尼亚手中有娜斯塔西娅·菲里波芙娜的照片。将军夫人和女儿们听说后定要看看照片。二小姐阿德拉伊达瞧着照片说：“这样的美是一种力量……有这样的美的人可以扭转乾坤。”阿德拉伊达是学美术的，懂得美的价值。美，是造物主恩赐给人类的珍宝，是美化人类生活的，使其灿烂辉煌而美好。可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女性美却成了男人发泄性欲的对象，可以用金钱买进卖出。娜斯塔西娅·菲里波芙娜的美非但不能扭转乾坤，反而被丑恶的现实所亵渎。她的美是一种苦难的美，必遭毁灭。她的命运就是她的美遭到毁灭的悲剧。

娜斯塔西娅·菲里波芙娜的父亲巴拉什科夫是个背运的退職官吏，负了一身债务，忧郁而死。邻近庄园的主人托茨基把七岁的娜斯塔西娅收养过来。

这个托茨基是个欧化的自由主义贵族，自认为是个站在当代欧洲文明顶峰的有教养的绅士，具有高雅的趣味和鉴赏女性美的能力。过了五年，他再次回到自己的庄园，见到十二岁的娜斯塔西娅，一下子就发现她是个美人坯子，相信她日后定会出落得十分美丽。于是托茨基就决定对这个女孩子进行一番“加工”，以便日后“享用”她的时候能满足自己的高雅趣味。他为此不惜金钱，给这个小姑娘延请了家庭教师，精心进行培养，并且给她单独建造了一幢精致的房子，备有乐器，幽静的图书室，油画，版画，铅笔，颜料，极其漂亮的小狗等等。娜斯塔西娅·菲里波芙娜十六岁那年，托茨基来到这里，奸污了她。于是这里成了他享乐的天堂；从此以后，在四年的过程中，他不断来这里寻欢作乐，把娜斯塔西娅·菲里波芙娜当成自己享乐的对象和典雅的鉴赏品。可是被他损害了的年轻姑娘对他却是“心里毫无所感，仅有那深深的轻蔑，初次被诱后立刻就感到的那种催人欲呕的轻蔑”。后来，娜斯塔西娅·菲里波芙娜听说托茨基在彼得堡要跟一个有钱的、门当户对的女人结婚。她就来到彼得堡，不让托茨基明媒正娶地结婚，以此向他报复。托茨基知道，这个女人无所顾忌，纵使发配到西伯利亚去服苦役也在所不惜，定要破釜沉舟地对她所深恶痛绝的人进行报复。这使托茨基深感不安，不能不认真地考虑自己的处境。

再说叶潘钦的三个女儿都已到了待字之年，而且美貌出众。将军本人原是靠有利的婚姻起家的，现在自然在盘算如何把三个女儿都嫁给富豪显贵，以便彻底巩固自己在上层社会里的地位。托茨基虽已年过半百，但跟叶潘钦交情甚厚，而且与他一起参加了某家企业的投资，因此就被选定为大小姐亚历山大拉未来的佳婿。可是托茨基和叶潘钦都担心娜斯塔西娅·菲里波芙娜会从中作梗，掀起一场耸人听闻的丑剧。因此他们必须想出一个万全之策，设法使她“安静下来”。他们决定用金钱来收买她，答应给她七万五千卢布作陪嫁，把她嫁给叶潘钦的秘书甘尼亚·伊沃尔根。对于托茨基来说，这笔交易并不亏本，他尽管要付出七万五千卢布，可是娶了叶潘钦的女儿，所能得到的要比这多得多。对于叶潘钦来说，这桩买卖也有利可图，他打算一箭双雕，既给女儿找个殷实可靠的夫婿，同时他自己又能得到漂亮而且阔气的娜斯塔西娅·菲里波芙娜当情妇。甘尼亚是他的下属，一向受惠于他，即使知道自己的老婆当了将军的情妇，也绝不会哼出半个不字，甚至还会受宠若惊。叶潘钦对此深信不疑，已经送给娜斯塔西娅·菲里波芙娜一串珍珠作为她过生日的礼物，算是将来拿她当情妇而给她的彩礼。现在全部问题都取决于娜斯塔西娅·菲里波芙娜是否同意嫁给甘尼亚。这一天恰好是她的生日，晚上她要举行晚会，当着全体来宾的面宣布最后的决定。

甘尼亚对这门婚事也是求之不得，正在焦急地等待娜斯塔西娅·菲里波芙娜的答复。但是他也有的一件事放心不下，在心里还惦记着将军的小女儿阿格拉娅。因此他求梅什金带给阿格拉娅一个便条，询问能否对她抱有指望。阿格拉娅拒绝答复他，让梅什金把那个便条原封不动地退回。甘尼亚虽然非常惋惜，甚至有些恼火，但是娶娜斯塔西娅·菲里波芙娜的决心却也因此而坚定下来。

经叶潘钦推荐，梅什金将要寄宿在甘尼亚家里；他家为了增加收入，腾出三个房间对外出租。因此梅什金拜会过将军夫人及其女儿之后，就跟着甘尼亚来到他家。伊沃尔根一家是那种所谓“偶然凑合在一起的家庭”，这种家庭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后的作品中将经常出现。在这种家庭里，血缘关系

已经解体，成员之间不存在任何物质上的和精神上的联系，彼此嫉妒怨恨，勾心斗角。甘尼亚的父亲是位退伍将军，从前也很有身份，但早已失去从前的地位。他对自己的没落感到绝望和哀伤，因此沾染上了酒瘾，借酒浇愁，并且不断撒谎，藉以自慰，用种种杜撰出来的故事来美化自己从前“高贵的”身世。可是谁都不相信他的谎言，有时竟当面把他揭穿，因此他十分苦恼。他年老体衰，嗜酒如命，丧失了任何活动能力，在生活中感到孤立无援，但又天真固执，因此经常陷入可笑而又可悲的境地。他的女儿瓦里娅天性庸俗卑微，没有任何真情实感，一心盘算着如何发财致富，因此准备嫁给放高利贷的普基岑。此人在十七岁的时候还经常在马路上过夜，从贩卖削鹅毛笔的刀子起家，一个戈比一个戈比地把钱积攒起来，现在已经拥有六万卢布的资本。甘尼亚是这家的长子，留着一部拿破仑式的胡须。他以自己的贫穷为耻，幻想着借助于有利可图的婚姻和长期的苦心经营爬到有钱有势的地位。他也有一定的自尊心，但这自尊心不断受到损伤。他心里认为娜斯塔西娅·菲里波芙娜是个“下流的不知廉耻的女人”，但却同意把她领进自己那个“体面的”家庭，因为看中了她的金钱，并且准备借助于她大发其财。尽管家里的人全都反对这门婚事，但是甘尼亚却毫不理会。

这天下午，娜斯塔西娅·菲里波芙娜来到伊沃尔根家，说是来邀请瓦里娅参加她的生日晚会，但是却当着众人之面大肆奚落甘尼亚，嘲笑他的家里太寒伧。不过这并没有动摇甘尼亚娶她的决心。瓦里娅破口谩骂娜斯塔西娅·菲里波芙娜“不知廉耻”；甘尼亚当场伸手去打自己的妹妹，以此向娜斯塔西娅·菲里波芙娜表白自己对她的“忠诚”。

与此同时，罗果仁也在觊觎着娜斯塔西娅·菲里波芙娜。他听说甘尼亚要娶她，就决定用重金抢购。他清楚地知道，金钱可以买到一切，即使是甘尼亚已经跟娜斯塔西娅·菲里波芙娜订婚，也没有关系；只要他罗果仁拿出一千或两千卢布给他，他就可以在结婚前一天把新娘让给他罗果仁。因此，当娜斯塔西娅·菲里波芙娜来到伊沃尔根家的时候，罗果仁就跟踪而至。他当着甘尼亚及其母亲和妹妹等众人的面，像在拍卖场上一样，跟他竞争，不断加大价码，从一万八千卢布一直出到十万，用这个高价压倒了托茨基的七万五千卢布。

娜斯塔西娅·菲里波芙娜处在金钱的铜臭的包围之中，孤零零地站在向她露出牙齿，想要吞食她的美的狼群之中。这一群狼一样的淫棍想要占有她，用金钱收买她；这一群利欲熏心的魔鬼想要出卖她，靠着她的美色大发横财。娜斯塔西娅·菲里波芙娜成了被买进卖出的对象，她的美遭到了亵渎。她将怎样保卫自己？有谁能拯救她呢？

“正面的美好的人物”

俄国在废除农奴制以后应该走上什么样的发展道路？这是当时社会各个阶层所普遍关心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也是当时社会政治思想斗争的焦点。文学中的各派力量也都力图通过塑造自己所理想的正面人物来回答这个问题。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罪与罚》中通过索尼娅的形象歌颂了基督教的忍耐和顺从，但是这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妓女还不足以充分地体现出作家的正面理想。长篇小说《白痴》则是他的第一部通过塑造正面人物形象全面表现自己的社会理想的作品。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写作《白痴》的时候写信给他的外

甥女索·亚·伊凡诺娃（《白痴》就是献给她的）说：“小说的思想是我很久以前产生的，我非常喜欢这个思想，但实现它却很困难，我长期没有动手，现在所以动手写作，完全是因为我几乎陷入绝境。小说的主要思想就是描写一个正面的美好的人物。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这更困难的事了，尤其是现在。所有的作家，不仅仅是我国的作家，就连所有的欧洲作家都包括在内，只要动手描写正面的美好的人物，没有不自认失败的。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个任务过于重大。美好的人物是一种理想，可是不论在我国还是在文明的欧洲，都还远远没有形成这种理想。”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白痴》中塑造主人公梅什金的形象时，不仅赋予他作为“正面的美好的人物”所应具备的一切美好素质，而且企图通过这个形象来回答作品中提出来的有关时代发展方向的根本性问题。

俄国废除农奴制以后，资本主义急剧发展起来。在这个过渡时期，现实生活中“一切都翻了个身”，一切都“混乱”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清醒地看到了俄国社会生活中的这种“混乱”，但是他不是到政治经济方面去寻找原因，而是认为其根源在道德方面。因此他认为俄国惟一的出路是使人在道德上新生，消除社会灾难惟一有效的力量是宗教。《白痴》中一个次要人物，小公务员列别杰夫，把资本主义时代叫作“铁路和罪恶的时代”。在这个时代，“财富是多了，但是力量减少了；联结的思想没有了；一切都松懈了，一切东西都显得没有力量，一切人都显得没有力量”。“科学家、工业家、公司老板”都无力“拯救世界”，为此必须另寻“正当的途径”，以便使人类获得“普遍的安宁”和“普遍的幸福”。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这种途径就是建立在宗教基础上的道德，就是“那种使人们团结、指导他们的心灵，以及充实生命源泉的思想”。《白痴》的主人公梅什金就是这种思想的体现者。

梅什金早年丧亲，身患不治之症，长期居住在瑞士，远离人寰，在同大自然以及天真无邪的儿童们的交往中成长起来。他没有受过高深的教育，智力不很发达，在社交场中不明事理，不善于应酬，因此被人看成“白痴”。但是他却胸怀磊落，大公无私，没有任何个人的欲念，尤其是没有金钱的欲念。他根据自己遭受疾病折磨的体验，对别人的痛苦异常敏感，热爱别人，同情一切孤苦伶仃的人，甚至把全人类的苦难都放在自己的心里。他反对社会的分崩离析和人人敌对，鼓吹一切敌对的人们要忘却旧恶，相互联合。他以情感、心灵为生活的指南，摈弃物质享受，抑制肉欲，号召宽恕、顺从和忍耐，断言受苦受难才是人生的最高德行。

正当人们处在《启示录》所预言的锱铢必较、称斤论斗的时代，互相为敌，邪欲横流，金钱主宰一切，美被褻渎并遭到毁灭的时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人公却罩着圣洁的光环，从隐居多年的瑞士的深山僻壤，来到乌烟瘴气的彼得堡，有如基督降临人间，前来搭救受苦受难的人们。他以广博无际的爱来洗涤人们的灵魂，抑制邪恶的情欲，使人们消除敌意，达到普遍的幸福。梅什金搭救娜斯塔西娅·菲里波芙娜的过程及其后果，就构成了小说情节发展的基础。他在拜会叶潘钦将军夫人及其女儿们时，给她们讲了自己在瑞士的一段经历。孤女玛丽娅被人诱骗后遭到遗弃，贫病交加，被人轻视，受着难以想象的痛苦和折磨。梅什金灌输给儿童们以博爱精神，使他们不再欺负玛丽娅，而跟他一道去爱她。这个不幸的姑娘最后在临死前精神上得到了安慰。这件事可以看成是梅什金搭救娜斯塔西娅·菲里波芙娜的前奏。

梅什金首次见到娜斯塔西娅·菲里波芙娜的照片时，就在她那美丽的外

貌下面发现了那颗受苦的灵魂，同时也感到她病态的骄傲，觉得在她身上苦难和骄傲“奇异而令人不能忍受”地结合在一起，对她产生了同情和怜悯。接着，梅什金清清楚楚地看到，甘尼亚并不爱娜斯塔西娅·菲里波芙娜，而是爱她的金钱。于是这位救世主就急于找个机会把这个情况告诉她，他虽然没有接到邀请，但也前来参加她的生日晚会。其实娜斯塔西娅·菲里波芙娜完全明白甘尼亚及其后台叶潘钦和托茨基在她身上打的主意。当晚会兴致正浓的时候，她突然宣布不嫁给甘尼亚。这时，甘尼亚脸色煞白，咧着嘴，急得说不出话来。娜斯塔西娅·菲里波芙娜对他说：“你的意思就是那七万五吧？你不是想说这个吗？不要否认，你实际上想说的就是这个。”她又对托茨基说：“拿回你那七万五吧，我保证无代价地使你自由。”然后她对叶潘钦说：“你也把珍珠拿回去，送给你的太太吧。”恰在这时，罗果仁带着一伙喽啰出现在晚会上。他手里拿着一个很大的纸包，有三俄寸高，四俄寸长，用报纸结实实地包着，用麻绳从四面紧紧地捆着，交叉地捆了两道。这是十万卢布，是罗果仁购买娜斯塔西娅·菲里波芙娜的现金。梅什金认为“美是洁净的，美不能买，也不能卖”，因此他见到娜斯塔西娅·菲里波芙娜正面临着毁灭的威胁，就在大庭广众面前向她提出求婚，说他要照顾她。娜斯塔西娅·菲里波芙娜着实被感动了，从来还没有人对她讲过这样的话，人们总是想方设法购买她的美色，可是还从来没有一个人想到要和她结婚。梅什金确实是她有生以来遇到的惟一的好人，他纯洁得完全像个孩子。但是娜斯塔西娅觉得她不应该像托茨基当年毁掉她那样毁掉梅什金，因此她拒绝了梅什金的求婚，对他表示感激，说声“再见！”，就跟着罗果仁一起坐上雪橇，走了。梅什金撵到门外，登上一辆马车，跟踪而去。

过了两天，梅什金匆匆地到莫斯科去了。他的姨妈死后给他留下一笔遗产，他前去办理继承手续，但更主要的是因为娜斯塔西娅·菲里波芙娜跟着罗果仁到莫斯科去了。她在莫斯科两次失踪；被找回来以后，快要跟罗果仁结婚的时候，她又跑到外省去了，同时梅什金也不见了。

六个月以后，梅什金突然回到彼得堡。他首先从列别杰夫那里打听到娜斯塔西娅·菲里波芙娜的行踪；然后，他找到了罗果仁，向他解释，他梅什金并不是罗果仁的情敌。他爱娜斯塔西娅·菲里波芙娜，但这不是男女之间的那种爱情，而是对她的怜悯。

梅什金已经有三个多月没有看见娜斯塔西娅·菲里波芙娜。他回到彼得堡以后一直想去看她，但有一种神秘的预感阻止了他。他觉得跟她见面一定很痛苦。六个来月，每逢回忆起第一次见到她的照片时的印象，他都感到痛苦。在这个女人的脸上，永远有一种使他痛苦的东西。他对这个女人的同情，乃至为她而痛苦的感觉，始终没有离开他的心，现在也没有离开，现在甚至还要更加强烈。他现在有这样一种感觉，仿佛你爱一个女人甚过世间的一切，可是忽然发现她被锁在铁窗后面，在看守的棍棒下呻吟——梅什金现在所体验到的就是这样一种感觉。

陀思妥耶夫斯基本来打算把梅什金写成一个禁欲主义者，说他只有怜悯和无私的兄弟般的感情，只有基督的爱。但是这种构思往往被对生活的真实描绘所破坏。梅什金在实际生活中并不完全是个“神”，有时也是个“人”。他与叶潘钦的小女儿阿格拉娅首次相逢时就对她一见钟情。他离开彼得堡期间曾托人转交给她一封信，说：“我需要您，非常需要您。”

阿格拉娅虽然是个娇生惯养的小姐，但头脑聪敏，勇敢而刚毅。她感到

自己周围的生活令人窒息，竭力想挣脱这种环境。她不同于两个姐姐，不想接受家庭给她安排的未来的命运，而向往着另一种生活，准备为建立功勋而做出自我牺牲。她宁肯跟着某个穷大学生饿死在阁楼里，也不愿意嫁给那些游手好闲的纨绔子弟。也正是因为如此，阿格拉娅起初才爱上了甘尼亚，不以他的家贫为耻辱，认为人应该过自食其力的生活。后来她发现甘尼亚灵魂丑恶而对他失望。梅什金是阿格拉娅在生活中遇到的惟一的好人，因此她热烈地爱上了他。

梅什金回到彼得堡不久癫痫症发作。病后第三天，他移居巴甫洛夫斯克，住进列别杰夫的别墅。恰好叶潘钦一家也正在这里消夏。梅什金再次出现，在叶潘钦家中引起一片混乱。阿格拉娅在家中明确表露了自己对梅什金的感情，但却遭到父母和姐姐们的反对。一天晚上，阿格拉娅在凉台上偷偷地塞给梅什金一个便条，约他明晨七时在公园里绿色长椅上会面。

第二天早晨三点多钟，梅什金就来到公园，不知不觉地竟然躺在绿色长椅上睡着了。他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女人向他走来。只见她脸色苍白，满面泪水，充满忏悔的表情，显然她刚刚犯下可怕的罪行。这个女人叫他跟着她走。梅什金站起来，刚想要走，突然听到一阵爽朗清脆的笑声。他惊醒了，只见阿格拉娅站在他面前，放声大笑。

阿格拉娅对梅什金说，她在家庭中被禁锢了二十来年，她愿意做点有益的事情，因此想要从家里逃走。她认为梅什金是个最诚实、最可靠的人，所以终于选择了她，希望得到他的帮助。但是阿格拉娅知道他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娜斯塔西娅身上。梅什金对此毫不隐瞒，对阿格拉娅说，他不相信娜斯塔西娅·菲里波芙娜跟罗果仁在一起会幸福，他重返彼得堡就是想要帮助她。他浑身哆嗦着对阿格拉娅说：“我爱你。但是娜斯塔西娅·菲里波芙娜是个不幸的女人，她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堕落、最有罪的人；千万不要羞辱她，不要对她落井下石。她没有错，她是淫棍和恶徒的牺牲品……您以为她果真想嫁给罗果仁吗？……只要我们俩一结婚，她第二天就会自杀！”阿格拉娅完全明白了，原来梅什金准备为了娜斯塔西娅·菲里波芙娜而牺牲自己，他要使她复活，得到新生。于是她对梅什金说：“我要嫁给甘尼亚，……您这就满意了吧？”说罢，她就跑回家去。

但是阿格拉娅仍然强烈地爱着梅什金。一天，全家人都在场，她质问梅什金：“你是不是向我求婚？”梅什金说：“我过去没有向您求婚，不过……您自己也知道，我是怎样爱您。现在也是如此……我现在就求婚。”阿格拉娅接受了，但总是不放心他对娜斯塔西娅·菲里波芙娜的态度。

被受害者的骄傲和美的毁灭

娜斯塔西娅·菲里波芙娜是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妇女，她极其憎恨周围的丑恶现实，自己则渴望新生。然而她所受的损害是如此深重，她不能相信周围任何人，不能排除自卑感，她认为自己已被彻底摧毁，只能永远做个堕落者。她对人对己都怀着仇恨心理，时时表现出一种受受害者的骄傲来，有时骄傲到病态的程度。她甘心自暴自弃，自作自践，把这当作惟一可行的复仇和抗议的办法。托茨基把她当作用金钱买进卖出的对象，但却打着“文明”的合法旗号。罗果仁要公开收买她的美色，把她变成自己的所有物。这未免有些露骨而且野蛮，但比起那些以她的“恩人”自居的人用上流社会的婚姻

来掩盖对她的买卖关系，要光明正大一些。因此娜斯塔西娅·菲里波芙娜宁肯接受这种公开的买卖，也不要那种包藏祸心的假仁假义，于是她决定卖身给罗果仁。这一决定包含着对伪善的轻蔑，是对托茨基之流的示威，是一种报复心理的独特表现。她在生日晚会上挖苦甘尼亚说：“你要是知道差不多就在你结婚的前夜，他（指叶潘钦将军——引者）送我这样一串珍珠，我也收下了，难道你还能要我吗？至于罗果仁呢？他在你家当你母亲和妹妹的面拍卖我，可是你到底还是跑来向我求婚，还差点要带妹妹一起来？罗果仁说你为了三个卢布肯一直爬到瓦西里耶夫岛，难道这是实话吗？”接着，娜斯塔西娅·菲里波芙娜把罗果仁给她的卖身钱——十万卢布的纸包扔进壁炉里熊熊的火焰中，当众宣布说：如果甘尼亚肯把这捆钞票从火中取出，那么十万卢布就全归他所有，但有一个条件，不允许戴手套，只准挽起袖子，光着手去取。甘尼亚“距娜斯塔西娅·菲里波芙娜有三步远，跟她面面相觑。她站在壁炉旁，等待着，目不转睛地望着他。甘尼亚身穿燕尾服，手里拿着礼帽和手套，默默地站在她面前，顺从地交叉着双手，看着火焰。一丝憨笑掠过他那苍白得像张纸似的面孔。当然，他两眼死死盯着那个就要变成灰烬的纸包，但他仿佛已经后悔经受这场考验。他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几秒钟之后，大家都明白了，他不会去取那个纸包，不想去取。”最后，甘尼亚转身向门口走去，可是没有迈出两步，全身一晃，咕咚一声倒在地板上，晕了过去。娜斯塔西娅·菲里波芙娜用火钳子把钱包夹出来，放到甘尼亚身旁，宣布这钱归他所有。这是《白痴》中最精彩的场面之一。

但是娜斯塔西娅·菲里波芙娜的骄傲却又离不开自卑，她“以自己整个的良心相信她是有罪的”。正因为如此，她才拒绝了梅什金的求婚。梅什金是她一生中遇到的惟一的信任她的人，对她怀着兄弟般的纯洁感情，看到了她的美的价值，也看到了她那深重的苦难，对她的遭遇怀着真挚的同情。娜斯塔西娅·菲里波芙娜如果接受了梅什金的求婚，就意味着她相信自己的周围除了坏人之外也还有好人，就意味着她相信自己是纯洁的，能够配得上梅什金，值得他爱。可是她却做不到这一点，她一直认为自己是个卖淫妇，会玷污纯洁的梅什金，会毁坏他的幸福。但是另一方面，娜斯塔西娅·菲里波芙娜拒绝梅什金的求婚，也是出自于她的骄傲。她知道，梅什金向她求婚乃是一种无意义的自我牺牲，单纯是对她的怜悯和同情；她不能接受。因此娜斯塔西娅·菲里波芙娜的骄傲是被损害者最可宝贵的品格，她的骄傲既表现在对托茨基之流的憎恨上，表现在对侮辱她的那个世界的不妥协精神上，同时也表现在她不愿意接受别人的恩赐和施舍，怜悯和同情，认为这是毫无意义的。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却认为女主人公的不幸就在于这种骄傲，似乎正是这种骄傲妨碍她抛弃从前那种不道德的生活，使她避开了真正的自新的道路。

娜斯塔西娅·菲里波芙娜真诚地希望梅什金幸福，知道他跟阿格拉娅相爱，就千方百计地玉成他们的婚事。她曾三次写信阿格拉娅，说明梅什金如何爱着她阿格拉娅，而她自己则准备嫁给罗果仁。她知道有个花花公子正在追求阿格拉娅，就两次在大庭广众之下揭了他的老底，提醒阿格拉娅不要上当受骗。她的一切努力终于收到了效果，阿格拉娅已经接受了梅什金的求婚。然而就是娜斯塔西娅·菲里波芙娜的这种骄傲，竟使她前功尽弃。

阿格拉娅就要跟梅什金订婚，但不放心他对待娜斯塔西娅·菲里波芙娜的态度，所以要求梅什金陪她去看望娜斯塔西娅·菲里波芙娜，以便进行一

番考验。这两个女人一见面就隐藏不住各自的仇恨心情。阿格拉娅对娜斯塔西娅·菲里波芙娜说：“您并不爱公爵，把他折磨够了以后，就甩开了。您不能爱他，因为您太骄傲……您的自尊心强到了疯狂的地步，您不能爱像他这样纯朴的人……”娜斯塔西娅·菲里波芙娜更是不甘示弱，回答道：“我明白了您光临此地的目的，就是想当面证明公爵爱我是不是比他爱您更强烈……也许我不值得他爱，但是只要我对他一下命令，他立刻就会甩开您，永远留在我的身边，娶我……假使他现在不走到我身边来，不娶我，不抛弃您，您就把他拿去，我让给您，我不需要他！”

这两个女人都像疯子似的，站在那里等待着梅什金说话。他也无法忍受下去，一面指着娜斯塔西娅·菲里波芙娜，一面带着哀怜和责备的口吻对阿格拉娅说：“她是……她是个那样不幸的人啊！”阿格拉娅用手捂住脸，喊道：“哎呀，我的天哪！”然后就跑了出去。梅什金随着追去，但在门坎上被娜斯塔西娅·菲里波芙娜抱住。她失去了知觉，倒在梅什金的怀里。娜斯塔西娅·菲里波芙娜苏醒过来之后，歇斯底里地大笑起来，指着梅什金对站在身边的罗果仁说：“他是我的！你走开吧！”罗果仁没有说话，拿起帽子，走了出去。

七月初，梅什金和娜斯塔西娅·菲里波芙娜举行婚礼。教堂门前，站着一群人围观，罗果仁挤在人群里面。娜斯塔西娅·菲里波芙娜走下马车，一眼就看见了罗果仁，她呼喊一声，奔到他的面前，两手抓住他，说道：“救救我吧！带我走！”罗果仁把她抱到马车里，吩咐车夫拚命向火车站赶去。梅什金在教堂里面听到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低声地说：“我担心这样，但我到底没想到会是这样。”沉默一会，他又补充说：“处在她的这种情况下，这完全是必然的。”

拒绝跟梅什金结婚，不是娜斯塔西娅·菲里波芙娜的错误，而是她不得不然的。她的错误在于她的骄傲。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她竟然拆散了梅什金和阿格拉娅的婚姻，而且最后也使自己遭到毁灭。

第二天早九点，梅什金乘火车赶到彼得堡，首先来到罗果仁的家。但是仆人说罗果仁不在家，娜斯塔西娅·菲里波芙娜也没有来过这里。梅什金又到娜斯塔西娅·菲里波芙娜的住处去找，但也找不到。他转了一天，一点消息也没有打听到。黄昏的时候，在一个交叉路口，突然有人碰了一下他的胳膊，原来不是罗果仁。梅什金见了很高兴，就跟他来到他的家。罗果仁把梅什金领进书房，梅什金急切地问道：“娜斯塔西娅·菲里波芙娜在哪里？”罗果仁指着用帷幔隔开的卧室说：“在那边！咱们进去吧！”

这两个人站在床边，始终没有说出一句话来。梅什金的心跳着，屋内死一般的沉寂。他看到：有一个人在床上睡着，一动也不动；听不见一点声响和一丝呼吸。睡着的这个人用白被单连头蒙住，四肢的线条依稀可见。周围十分零乱，在床头，在椅子上，甚至在地板上，乱放着脱下来的衣服，一件阔绰的白绸衣裳，还有鲜花和缎带。摘下来的钻石，零乱地在床头小几上闪着光。从被单下面露出一只光着的白脚尖，好像是用大理石雕成的，死板得十分可怕。梅什金望着，感到越看下去，屋内就越显得死气沉沉，十分寂静。一只睡醒的苍蝇嗡嗡地飞起，飞过床去。梅什金哆嗦了一下，问道：“那是你么？”“是……我……”罗果仁小声说，垂下了眼皮。“……用刀子吗？就是那把吗？”“就是那把……”

娜斯塔西娅·菲里波芙娜被杀害了，美遭到了毁灭。直接杀害她的凶手

是罗果仁。他本来对娜斯塔西娅·菲里波芙娜的情欲近于疯狂的程度，为了她曾经毫不吝惜金钱，可是最后却把她杀死。其实这并不奇怪。罗果仁是个富商之子，他的父亲在一所阴暗肮脏的，像个箱子似的房子里度过一生，“一个人也不信任，而且也完全不需要这样做，只是默默地、阴郁地积攒着金钱”。罗果仁本人假如不是遇到娜斯塔西娅·菲里波芙娜，就会在青年时期放荡一阵子，然后改邪归正，“开始像父亲那样关在这所房子里攒钱……最后攒到的数目不是两百万，恐怕要是一千万，可是他却会躺在钱袋上饿死”。但是，与娜斯塔西娅·菲里波芙娜的相逢，破坏了他的正常生活。他父亲那种增殖金钱的热情，被他用在女人身上。对娜斯塔西娅·菲里波芙娜的情欲占据了她的全副精力和整个生活，使他发狂。这种情欲是私有者以金钱为基础的占有欲，发散着浓烈的铜臭味。罗果仁花费重金把娜斯塔西娅·菲里波芙娜抢购到手，视她为自己的所有物，要求她对自己服服帖帖，任他摆弄。可是娜斯塔西娅·菲里波芙娜是骄傲的，对罗果仁随时都表现出轻蔑。这使他无限痛苦，不能忍受。他把娜斯塔西娅·菲里波芙娜看成是自己痛苦的根源，因此把她杀死。他的犯罪是私有者心理变态的结果。

从广义来看，杀害娜斯塔西娅·菲里波芙娜的不只是罗果仁一个人，而是所有的托茨基之流，整个的社会制度。梅什金想拯救她，但这仅仅是一种主观的良好愿望而已。他对待被损害者仅仅给他们以同情和怜悯，而不想帮助他们树立自信心，重新获得人格尊严；号召他们抛弃骄傲，奉行忍耐和顺从。这在客观上起了助纣为虐的作用；对于娜斯塔西娅·菲里波芙娜的被害，他也有无法逃脱的责任。他的道德理想在实际冲突中根本经不起考验。为了消除罗果仁对他的敌意，他曾主动去解释他跟娜斯塔西娅·菲里波芙娜的关系。可是罗果仁却仍然视他为不共戴天之敌，曾经躲在旅馆的楼梯下，举刀要把他杀死；幸亏他的癫痫症发作，把罗果仁吓跑，他才得以活命。可是过后他又写信给罗果仁，说他已经忘却那个动刀想杀他的罗果仁，仅仅记得一个结拜兄弟的罗果仁。梅什金在与罗果仁的冲突中，在道德上早已失败，他的理想根本无力对抗罗果仁的私有观念。娜斯塔西娅·菲里波芙娜之死说明梅什金的道德理想完全破产。他不仅无力保卫这个被损害者，甚至也无力自卫，他最后发了疯。他再次被送到瑞士去治疗，但是医生越来越皱眉，越来越摇头。梅什金的脑子已经完全受伤，他已经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白痴。

陀思妥耶夫斯基本来企图在《白痴》中塑造一个“正面的美好的人物”。用以回答时代所提出的问题，但是他失败了，而且失败得很惨。不过这也正是他的伟大之处；艺术实践中忠于生活的态度使思想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承认了自己的道德理想的无能为力和完全破产。在这里却显示出了作家的艺术威力。

《卡拉玛卓夫兄弟》

《卡拉玛卓夫兄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他一生创作总结性的作品。这部鸿篇巨著卷帙浩繁，洋洋百余万言，作家执笔写作仅仅用了两年零四个月的时间（从一八七八年七月到一八八〇年十月），但是在头脑中孕育却达三十年之久。《卡拉玛卓夫兄弟》的情节以一起弑父案件为基础，在现实生活中是有所本的。五十年代初，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鄂姆斯克监狱中服苦役时，结识了一个姓伊里仁斯基的难友。一八六〇年九月，作家在《俄罗斯世界报》上发表长篇报告文学《死屋手记》第一章，提到这个伊里仁斯基，说他家住在托波里斯克，贵族出身，挥金如土，觅债累累，被控为弑父犯而判刑，但始终拒不认罪。《死屋手记》第一章发表后不久，陀思妥耶夫斯基接到一封西伯利亚来信，得知伊里仁斯基所遭受的确实是冤狱，现已昭雪。原来真正的弑父凶手是他的弟弟，伪造罪证，嫁祸于兄，十二年以后终于良心发现，到法院自首。陀思妥耶夫斯基获得这个消息之后，于一八六二年五月，在《时间》杂志上连载的《死屋手记》第二部第七章中做了更正。他写道：“这件事的悲剧之深自不待言，这一可怕的控告完全毁了一个年轻的生命。”这件冤案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留下极深的印象，他一直企图从中挖掘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一八七四年，他决定以这个冤案为素材写一部作品，甚至草拟了写作提纲，但没有动手写作。他后来在逝世的前一年把这部作品写完。他还打算写作续篇，但没有来得及实现。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孕育《卡拉玛卓夫兄弟》将近三十年的过程中，俄国社会生活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经历了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和七十年代末的两次革命高潮。作家不理解革命，甚至对革命采取了敌视的态度，但是他也对俄国革命所要解决的一系列根本问题进行了紧张而痛苦的探索，从政治、哲学、宗教、伦理等方面进行了严肃认真的思考。《卡拉玛卓夫兄弟》就是这些思考的成果，具有鲜明的社会哲理性。这部作品在思想内容方面高度的概括性，是作家以前的任何一部作品也未曾达到的。这里提出的是有关人、俄国、全人类的命运的问题。当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部具有艺术遗嘱性质的作品中解决这些问题时，也更加突出地暴露了他的世界观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但是他在这里也显示出一个忠于生活、探索真理的艺术家的良心。

“偶然凑合在一起的家庭”

《卡拉玛卓夫兄弟》不同于《罪与罚》和《白痴》，故事情节从彼得堡移到外省，发生在一个叫做斯科普里高恩耶夫斯克的小县城及其郊区的一所修道院。小说的中心是卡拉玛卓夫家族，这一家父子和兄弟之间的矛盾冲突构成了情节发展的基础。

卡拉玛卓夫一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经常出现的那种所谓“偶然凑合在一起的家庭”。家长老卡拉玛卓夫·费道尔·帕甫洛维奇青年时期是个寄食于豪门富户的丑角，靠着打诨逗趣博得主人哈哈一笑而苟延残喘。后来，他用种种卑鄙无耻的手段发家致富，小说开始时他已拥有十万家私。费道尔·巴甫洛维奇先后娶过两房妻子，但都被他折磨致死。三个儿子德米特里、伊凡和阿辽沙幼年丧母，都被父亲遗弃，先是由老仆人格利高里抚养，后来分别寄居在几个远房亲戚家里。小说开始时，他们都已长大成人，陆续

回到故乡，同父亲发生了尖锐的冲突。

老卡拉玛卓夫是个无耻的好色之徒和吝啬鬼。他在行将就木之年仍然淫欲不减，生活糜烂透顶，跟风骚女人格鲁申卡勾勾搭搭。他霸占着妻子的财产，一点儿也不给儿子。德米特里回乡后由于争夺母亲的遗产，跟父亲发生争执；又由于爱上了格鲁申卡而跟父亲争风吃醋。父子之间的关系极度紧张，已发展到白热化的程度，德米特里一再扬言要杀死老头子。

伊凡也很憎恨父亲，心里盼望老头子早点死掉，以便继承遗产。他也同样憎恨哥哥。原来，德米特里当年在军队服务时曾以四千五百卢布为代价侮辱了某中校的次女卡杰琳娜·伊凡诺芙娜，玷污了她的声誉，使她不得不跟他订婚。但是德米特里回到故乡后遇到格鲁申卡，喜新忘旧，爱上了她，因此冷淡了卡杰琳娜·伊凡诺芙娜。可是伊凡却爱上了卡杰琳娜·伊凡诺芙娜，而格鲁申卡又恰恰是老卡拉玛卓夫梦寐以求的“安琪儿”。于是父子三人搅进了这种“多角关系”之中。伊凡虽然没有参与哥哥和父亲的角逐，但任其相互厮杀，希望“一个混蛋把另一个恶棍吃掉”。只要父亲死掉，他伊凡不仅能分到一份遗产，而且由于德米特里娶了格鲁申卡，他就可以稳得卡杰琳娜·伊凡诺芙娜。

阿辽沙是弟兄中间最小的一个，地位比较特殊。他自小笃信基督，小说开始时正在修道院里跟随卓西玛长老学习教义，并没有参与家庭纠纷。但他不断奔波于所有人物之间，在情节发展中起着串联的作用。

再说卡杰琳娜·伊凡诺芙娜委托德米特里往莫斯科汇寄三千卢布，然而他没有把钱汇出，反而带着格鲁申卡到莫克罗耶去胡闹，把钱花掉。他急于把这笔钱归还给卡杰琳娜·伊凡诺芙娜，请求阿辽沙去向父亲要三千卢布，但是却遭到父亲的拒绝。恰在这时，德米特里听说老头子为了等待格鲁申卡到他家来跟他寻欢作乐，特意用纸包好三千卢布，准备赠送给她。这就使德米特里同父亲的关系恶化到了极限。

老头子费道尔·帕甫洛维奇为了跟格鲁申卡幽会不受到打扰，特意把伊凡打发出去，让他到契列马什尼亚村去出卖森林。伊凡临行时，仆人斯麦尔佳科夫向他暗示，在他离开家的期间，老头子可能要出事。原来这个斯麦尔佳科夫是老卡拉玛卓夫跟疯女丽扎维塔·斯麦尔佳霞娅的私生子，如今在府上充当厨师。他了解老卡拉玛卓夫的一切秘密，就把他藏着三千卢布在枕头下的事以及格鲁申卡来时敲门的暗号告诉了德米特里。

那天晚上，德米特里去找格鲁申卡，发现她没有在家，断定她跟老头子幽会去了，于是妒火燃烧起来，就径直往老卡拉玛卓夫家奔去。他从格鲁申卡家临走时，随手拿起一把铜锤，揣进怀里。来到老卡拉玛卓夫的家，他用暗号骗开了窗户，但是却没有看到格鲁申卡在老头子的卧室里。他望着他所厌恶的老头子的侧影，忽然从衣袋里抓起铜锤……

却说斯麦尔佳科夫癫痫症发作，躺在床上狂叫不止。老仆人格里高利听到主人屋里有响动声，就从床上起来。他刚走出屋，只见德米特里往后院逃去。他随后追赶，德米特里掏出铜锤，朝着他的头部击去，将他打倒在地。格里高利头部流出鲜血，德米特里拿出手绢将他头上的血擦去，随后将沾满血的手绢装进衣袋里，扔掉铜锤，越墙而逃。

德米特里又折回格鲁申卡的家。女仆见他身上沾有鲜血，大惊失色，告诉他说，格鲁申卡到莫克罗耶去了。德米特里又来到一个押主家里，要求赎回手枪。这只手枪是他下午刚刚抵押的，可是现在连一夜都没过去，他又来

赎回。押主见他的衣服和手上沾有鲜血，衣袋里露出一叠一百卢布面额的钞票，因此心中十分怀疑。德米特里声称这三千卢布是他刚从霍赫拉科娃太太那里借来的，但是对于身上的鲜血却支支吾吾，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他匆匆写了一张纸条，看样子想要自杀，然后就乘车到莫克罗耶去了。押主对他的这些行迹感到非常可疑，就到警察局去告发了。

再说老卡拉玛卓夫家的女仆睡到半夜，突然醒来，发现丈夫格里高利不在床上，又见主人的房门大开，主人死在地上。她大为惊骇，不久又在园中找到丈夫。格里高利苏醒过来，认定是德米特里杀死了父亲，抢走三千卢布，随手把包钱的纸封扔在地上。于是他在邻居的协助下，报告了警察局。警官们前来检查了行凶的现场，然后就到莫克罗耶去捕捉凶手德米特里归案。

德米特里到达莫克罗耶，找到格鲁申卡，就在那里和她一起寻欢作乐。不久，几个警官来到，把德米特里逮捕，当场对他进行审讯。德米特里对一切细节皆供认不讳，但却否认两点：第一，老卡拉玛卓夫不是他杀死的；第二，他没有抢走那三千卢布，他现在所花的钱是他当初受卡杰琳娜·伊凡诺芙娜委托汇寄的那三千卢布余下的，共有一千五，他一直缝在脖颈下面的衣服里，刚刚取出来。

不久，伊凡从契列马什尼亚归来，不相信父亲是德米特里所杀，而怀疑斯麦尔佳科夫。这时，斯麦尔佳科夫的病情已经好转，伊凡一连三次找他谈话。他起初矢口否认，最后终于承认了自己的罪行。那天夜里，他本来是故意装病，在德米特里走后，就溜进老卡拉玛卓夫的屋里，把他杀死，从圣像后面把那三千卢布拿出来（在此之前他建议老卡拉玛卓夫不要把钱放在枕下，最好放在圣像后面），制造了假现场，企图嫁祸于德米特里。他把经过的情形向伊凡说了，原来他的犯罪活动曾经得到伊凡的默许乃至鼓励。现在，斯麦尔佳科夫忏悔了自己的罪行，把三千卢布的赃款交给伊凡，把他送走之后就上吊自杀了。

凶杀案发生两个月以后，法庭对德米特里进行公开审判。几乎所有出庭的证人的供词，都对德米特里十分不利。尤其是卡杰琳娜·伊凡诺芙娜，出于报复心理，提交了德米特里前不久写给她的一封信；他在信中说，为了偿还她的债务，他准备谋杀他的父亲。在法庭上为德米特里申辩的有两个人：一个是阿辽沙，他断定德米特里不是凶手，但是拿不出任何确凿的证据；另一个是伊凡，他说老卡拉玛卓夫是斯麦尔佳科夫所杀，并且交出三千卢布赃款作为证据。但是他的供词被法官们否决，理由是：第一，伊凡经医生诊断，患了寒热病，神经错乱，因此证词无效；第二，斯麦尔佳科夫已死，说他是凶手，查无实据；第三，这三千卢布的钞票，无法证明是赃款。因此法庭断定德米特里是弑父凶手，既有犯罪事实，又有犯罪动机，判处他二十年苦役。德米特里一直否认自己是弑父凶手，但在良心上承认自己有罪。

“卡拉玛卓夫气质”

《卡拉玛卓夫兄弟》中所描写的这场家庭惨剧是惊心动魄的，是私有制的家庭关系的一种极端的表現。父子之间，兄弟之间相互憎恨，分崩离析，矛盾尖锐到了你死我活的程度。但是他们却被一种共同的精神气质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斯麦尔佳科夫杀死了老卡拉玛卓夫，抢去了他的三千卢布，而且嫁祸于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虽然没有成为弑父凶手，但从他平时的行为和道

德来说，他完全可能成为弑父凶手。伊凡表面上似乎与弑父无关，但实际上他对此负有推卸不掉的责任。他是斯麦尔佳科夫的直接煽动者，他在斯麦尔佳科夫的头脑中播下了犯罪的种子，唆使他去犯罪。

卡拉玛卓夫家族，父子、兄弟所共同具有的这种精神气质就是极端的卑鄙无耻。阿辽沙询问伊凡：他既然没有任何社会理想，不相信人的社会价值和道德价值，那么他究竟靠着什么样的精神力量而生活呢？伊凡答道：靠着卡拉玛卓夫式的卑鄙。的确，卡拉玛卓夫气质就是卑鄙无耻的最集中的体现，这就是俄国农奴主阶级和新兴的资产阶级的种种丑恶、污秽不堪的精神气质的总和：自私自利和专横暴虐，腐化堕落和残酷野蛮，愚昧落后和恣意放纵等等。老卡拉玛卓夫贪欲横流，为了满足个人的欲望，可以任意践踏别人的尊严。伊凡有一整套“切皆可任意妄为”的“理论”。德米特里像野兽一样奉行着这样一个生活信条：“哪怕天塌下来，也得等我完了之后再说！”他们父子用金钱去购买女人的美色，折磨儿童，破坏别人的家庭，而彼此之间则父不父，子不子……最后酿成惨剧。

费道尔·帕甫洛维奇的形象是俄国农奴制崩溃、资本主义兴起时期社会关系最概括的表现，既体现着贵族阶级的解体、庄园生活的没落，又反映了资产阶级暴发户的典型特点。他集地痞无赖和专制独夫、小丑和恶棍、寄人篱下的食客和贪婪成性的高利贷地主的特点于一身，既是个腐朽没落的贵族，又是个暴发户。青年时期养成的丑角的性格与卑鄙无耻、道德沦丧结合在一起，把这个人变成一个畸形的、令人不寒而栗的恶魔式的人物。他从奴才的地位一步登天，但一刻也没忘记自己从前的经历。他心肠狠毒得咬牙切齿，全身发抖，临到丧命之前还竭力把自己从前所受的侮辱加倍地转嫁给别人。高尔基在批判这种卡拉玛卓夫气质时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懂得最透彻的主要人物费道尔·卡拉玛卓夫……无疑是俄罗斯的灵魂，无定形的、光怪陆离的、既懦弱又大胆的、但主要是——病态而又恶毒的灵魂：这便是伊凡雷帝，萨尔特契哈，拿小孩喂狗吃的地主，打死怀孕的妻子的粗野汉子，强奸自己的未婚妻，当场又叫一群流氓轮奸她的市侩。”这里所说的伊凡雷帝是俄国历史上的头号暴君，萨尔特契哈是个因残酷剥削和虐待农奴而臭名昭著的俄国女地主。

老卡拉玛卓夫的儿子们，除了阿辽沙之外，全都具有这种气质。

德米特里为人情欲炽烈，全然不能自制而任凭感情处世，生活上毫无节制。他跟父亲争夺母亲的遗产，打得不可开交；又跟这个老色鬼争夺风骚女人，寸步不让，父子的关系紧张到这种程度，最后惟有用凶杀来解决彼此间的矛盾。德米特里最终没有成为弑父凶手，仅仅由于偶然间的“一转念”，实际上他从灵魂到行动都已成为一个罪犯。他给其他一些人所造成的痛苦更是数不胜数。德米特里是个一心追求私欲的禽兽，乘人之危来达到个人的卑鄙目的。他曾利用卡杰琳娜·伊凡诺夫娜的困境，以替她父亲垫付一笔亏空的公款为条件，侮辱了这个年轻的姑娘。陀思妥耶夫斯基塑造德米特里的形象，具有三个方面的用意。第一，这个形象反映出丑恶的现实对人的灵魂歪曲和毁坏到何种程度；第二，法庭对德米特里的审判，暴露了沙俄司法制度的伪善，揭露了沙俄七十年代进行的法制改革的欺骗性；第三，作者企图通过德米特里精神的转变来宣扬顺从与苦难会使人在道德方面净化的思想。小说结尾，德米特里无辜被判刑，他却真心实意地进行了忏悔，决心改恶从善，洗心革面，主动地去受苦。

斯麦尔佳科夫是老卡拉玛卓夫奸污一个疯女所生的私生子。他不仅就其社会地位来说是个奴才，而且在灵魂上也是个地地道道的奴才。他为人怯懦而又贪婪，卑鄙而又狠毒。这是卡拉玛卓夫气质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无怪乎伊凡的“一切皆可任意妄为”的犬儒主义哲学在他身上得到了生长的土壤。斯麦尔佳科夫幻想着到巴黎去开个饭馆，为了取得开业的资本而行凶杀死老卡拉玛卓夫，在行动上实践了伊凡的“理论”。伊凡作为斯麦尔佳科夫犯罪的唆使者，最后在他身上看到了自己的罪过，并且因此而神经错乱，发了疯。

卡拉玛卓夫气质是私有制的病态的精神产物，以极端的形式反映了私有制对人的灵魂的损害。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善于具体地、历史地分析社会问题，而把卡拉玛卓夫家族看成是整个人类世界的复杂关系的缩影，认为人的本质是丑恶的，因此在对人类的看法上陷入了悲观主义。

人类苦难的极端

《卡拉玛卓夫兄弟》是一部反映生活面异常广阔的作品。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通过卡拉玛卓夫的家庭悲剧及其成员之间的思想冲突，深刻入微地表现了人物的心理状态，他们的灵魂和情欲，而且广泛地描写了各个方面的社会生活。小说以卡拉玛卓夫父子、兄弟间的矛盾冲突为中心线索，但是与它进行发展的还有许多其他方面的线索，涉及到许许多多的次要人物。卡杰琳娜·伊凡诺芙娜、格鲁申卡、霍赫拉科娃母女、斯涅基列夫一家、神学校学生拉基金、“孩子们”——这些为数众多的次要人物都起着双重作用：一方面衬托卡拉玛卓夫兄弟的某一个特征，同时又各自有着自己的故事，有着或是喜剧的或是悲剧的独立性格。这些出身经历、智力发展和道德面貌各不相同的人物，体现着俄国社会中各个不同阶层的人的生活和遭遇。其中最令人触目惊心的是妇女的不幸和儿童的痛苦。

《卡拉玛卓夫兄弟》是一部社会哲理小说。冷眼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部作品中描写人所受的侮辱与损害，仅仅是旧调重弹。其实则不然。人类的苦难的基调虽然从《穷人》起就贯穿他的全部创作，但是却越来越强烈，在《卡拉玛卓夫兄弟》中达到了最高潮。这部作品选择了人类苦难的极端——无辜的、不受保护的儿童所遭受的折磨和摧残为题材，描写了一幅幅令人触目惊心的悲惨画面，这些画面往往具有概括性的象征意义，揭示了人类的普遍苦难是多么深重。伊凡对阿辽沙讲了一件骇人听闻的事：一个有钱有势的地主出身的将军，仅仅因为一个八岁的孩子扔石头把他的狗打伤，就当着孩子母亲的面驱使几条恶狗窜上去，把这个孩子撕成碎块。德米特里在预审后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遭受火灾的农村，农舍被烧毁一半，村口站着一个瘦骨嶙峋的农妇，怀里抱着一个婴儿。这个婴儿吮吸着母亲干瘪的乳房，没有吸到一滴乳汁，伸着小手，不停地哭叫。德米特里思索着：“为什么那些受了火灾的母亲站在这里？为什么人们这样贫困？为什么婴儿没吃没穿？为什么田野光秃秃的？为什么他们不拥抱接吻？为什么不唱快乐的歌儿？为什么他们遭受重灾而变得浑身发黑？为什么他们不给婴儿食物吃？”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整个人类深重灾难的痛苦的思虑。

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人类苦难的社会根源就是卡拉玛卓夫气质。在卡拉玛卓夫气质的统治下，产生了数不胜数的牺牲品。如果说卡拉玛卓夫气质是私有制的病态的精神产物，那么它的牺牲者所受的侮辱和损害则表现为更加

难堪的形式。

疯女丽扎维塔·斯麦尔佳霞娅外貌丑陋不堪，两俄尺来高，一脸白痴相，眼神呆板，不分冬夏都打着赤脚，头发上总是沾满泥土、草棍和木屑之类的垃圾。她的母亲早已过世，父亲是个醉鬼，总是打她。这个可怜的女孩无处安身，只能靠着别人的施舍，以黑面包和水来填肚子，在教堂的门廊上，牛棚里，菜园中过夜，就是这样一个女人也被老卡拉玛卓夫奸污；她怀了孕，把孩子生在卡拉玛卓夫家的菜园里。分娩后，她当即就死了，孩子被格利高里抱去抚养，卡拉玛卓夫家又增加了一个仆人。

格鲁申卡和卡杰琳娜·伊凡诺芙娜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常见的那种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妇女。她们的性格非常矛盾，既高傲又谦卑，这种复杂的性格是她们那种严峻的生活条件的产物。她们遭受屈辱，受人践踏，意识到自己是买进卖出的对象，对侮辱她们的人怀着愤恨，想要报复，但又别无出路，惟有与现实妥协。这种复杂的生活处境使她们外表上十分高傲，但内心却隐藏着无限的苦楚，既愤恨一切，嫉恶如仇，又同情一切。

退伍上尉斯涅基列夫是个不受保护的小人物，已经丧失了做人的自信心和对自己人格的尊严感，而变成一个近乎小丑的人物。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却竭力在这个被生活“压扁了”的小人物身上挖掘出心灵深处蕴藏着的丰富的人性尊严来。斯涅基列夫遭到德米特里的捉弄和侮辱，卡杰琳娜·伊凡诺芙娜对他深表同情，委托阿辽沙给他送去二百卢布。他的境况十分困窘，急需一笔钱，他乍一见到这笔对他来说数目相当可观的钱时，欣喜若狂。可是不一会儿，他就立刻变了脸色，把这两张钞票揉成一团，用脚踩进泥里。他的儿子伊留舍奇卡是个病孩，受着疾病的折磨，但他也意识到了社会的不平等，在幼小的心灵里萌动着反抗的胚芽。他知道父亲受了卡拉玛卓夫家的人的侮辱，因此见到阿辽沙，就上去把他的手指咬破。这个孩子也勇于把刀子刺进取笑他的柯里亚·科拉萨特金的腿。然而可怜的伊留舍奇卡最终却背负着屈辱和痛苦默默地死去。

“赞成”和“反对”

《卡拉玛卓夫兄弟》的意义不仅仅表现在对社会现实生活的具体描绘上，而且在于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社会哲学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对于农奴制废除以后资本主义急剧发展的俄国，而且对于全人类来说都具有普遍的意义，尽管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这些问题的解答是极其矛盾的，甚至是荒谬的。

小说中一系列社会哲学问题主要是通过阿辽沙和伊凡这两个形象提出来的，尤其是伊凡的形象在这方面具有突出的意义。尽管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认为书中最重要的是阿辽沙的“传记”，说他是“最出色的”人物，可是从艺术表现上来看，最有说服力的，堪称为小说中心人物的并不是阿辽沙，而是伊凡。书中所有的思想线索皆源于伊凡，同时他又是全书高潮的第五部的中心人物。伊凡滔滔不绝地发表哲学议论，阿辽沙只是敲敲边鼓，起着“捧哏”的作用。作者的本意是企图在阿辽沙身上发掘积极的仁爱精神，但实际上却适得其反，真正体现作品的人道主义思想的是伊凡。

伊凡本来是个犬儒主义者，鼓吹摒弃一切道德原则，没有善恶观念，宣扬“一切皆可任意妄为”的信条，是个教唆犯。但同时他又是个人道主义者；人道主义和反人道主义在他身上奇妙地结合在一起，反映了作者本人世界观

的矛盾。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方面为人类的苦难而痛心疾首，另一方面又崇尚苦难，鼓吹神秘主义和宗教顺从。

《卡拉玛卓夫兄弟》作为一部社会哲理小说，主题思想集中地体现在第五卷中，这一卷的标题是拉丁文《pro 和 Contra》，意思是：《赞成积反对》。其中的《反叛》和《太宗教法官稗史》两章通过阿辽沙和伊凡的对话以及伊凡的议论和讲述，集中反映了作者的思想矛盾：反叛和顺从，暴露苦难和崇尚苦难，向往和谐与幸福和反对革命，无神论和宗教信仰。这两章提出的问题是全书思想的基础，是小说后七卷故事情节发展和人物命运转折的思想依据。

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一再强调第五卷是全书的高潮，其思想是读神论和对读神论的批驳。那么什么是他所理解的读神论，他是如何“批驳”的呢？阿辽沙幻想着人类的幸福，消除人类的苦难，在互爱的基础上实现人类的和谐一致。在这个根本目的上，读神论者伊万和宗教信徒阿辽沙并没有原则分歧。他不能接受阿辽沙的宗教顺从思想，但对他的幻想仍然感到亲切，并且向往着博爱精神。但是伊凡“热爱生活甚过于爱它的意义”，“先于逻辑地去爱”，正如阿辽沙所说的，这仅仅是“事情的一半”，而且与他性格的“另一半”发生抵触。他是个唯理主义者，头脑清醒，善于进行抽象的思考和冷静的分析。他一方面本能地热爱生活，另一方面又企图寻求合乎理性和逻辑的安排生活的途径。如果说阿辽沙主张信仰上帝，鼓吹驯服和解以及人人相爱的永恒观念，那么伊凡则是个无神论者和唯物论者，反对宗教和抽象的道德，只承认人世间的现实生活。他俩提出的问题表面上似乎十分抽象，但实际上对于当时的俄国乃至全人类的发展都有着迫切的现实意义。伊凡说：“我们讨论些什么事情呢？讨论的都是一些世界性的问题，而非别的，即有没有上帝？灵魂是否不死？那些不信神的人，便谈论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谈论如何依照新的计划改造全人类的问题，但其实都一样，都是同一些问题，只不过是另一个方面提出来的罢了。”

所谓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是关系到改造人类社会的根本途径的政治问题。而有没有上帝，灵魂是否不死的问题，则是唯物主义和宗教唯心主义的根本哲学分歧。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一个思想家类型的艺术家之伟大在于他看到了这两类问题的内在有机联系及其重大的实践意义。但是他对这些问题的解决却是矛盾的，甚至是反动的。《赞成和反对》最鲜明地反映了这种矛盾。作家千方百计地试图证明，道德离开宗教就要堕落，否定上帝必定导致犯罪。但另一方面他对自己所鼓吹的宗教理想也一再产生怀疑和动摇，甚至有时也承认苦难深重的人们在社会罪恶面前不可能与现实和解，感到难于把无神论“批驳”倒。按照基督教的教义，人生来就有罪，因此必须主动地去受苦，用以赎罪，这样才能取得未来的和谐与幸福。可是伊凡却列举了大量触目惊心的事实，证明了人类社会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存在，从而否定了宗教思想。他问道：“如果人人都必须受苦，以使用痛苦来赎买永久的和谐，那么请告诉我，这和孩子何干？完全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也必须受苦，他们为什么要用痛苦来换得和谐？”对于这个问题，无论是阿辽沙还是作家本人都无言以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本意要“批驳”读神论，但是作为伟大的艺术家又要忠于生活，结果是不仅没有“批驳”倒读神论，反而肯定了它。伊凡说：“如果用孩子的痛苦来补足那个为补偿真理所必不可少的痛苦的总和，那么我不愿意看见母亲拥抱那个叫狗崽上去撕碎她的儿子的迫害者！她不应

该宽恕他！如果要宽恕——那么，让她为自己而去宽恕，为做母亲的无限痛苦而去宽恕迫害者吧；可是，她却没有任何权利为被撕碎的孩子的痛苦而去宽恕迫害者，即使孩子为此而宽恕了迫害者，她也不应该宽恕他！”阿辽沙听了这番议论之后认为这是“反叛”，但是却不得不承认它的正确性，甚至进而忘记了自己的宗教信条，而主张把那个驱使狗去撕碎孩子的地主“枪毙”。

但是另一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表现伊凡的渎神论时却又竭力搜集他那个时代无神论者和革命者种种极端的观点，并且把这些观点跟资产阶级的道德沦丧掺合在一起，一股脑儿都集中在伊凡身上，企图借此“批驳”倒他的渎神论。伊凡的反宗教言论本来具有内在说服力，但由于作家把唯物主义思想与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混为一谈，这个人物就不过是个无政府主义者而已，他的反叛也是个人主义的。他否定人类的苦难，却不明白为什么要爱人。他在《大宗教法官稗史》中表现出蔑视群众的观点，认为群众害怕自由，随时都准备为一点点物质利益而出卖自由。在他看来，群众都是软弱无能的废物，随时随地都屈从于权势、欺骗和暴力。因此，中世纪时期，僧侣主义和宗教审判制度成了统治人们的惟一有效的形式；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国家也照样以欺骗和暴力为基础。那么人类寻求自由，最终的结果仍然不可避免地要屈服于强权。斯麦尔佳科夫是伊凡的二重人格，从性格气质、心理状态、信仰、政治见解等方面来说都是个彻头彻尾的奴才。他说：“在腐化堕落方面，欧洲人和我们俄国人是一样的。他们都是骗子，区别仅仅在于那里的人穿着漆皮鞋，而我们的混蛋则在贫穷中发臭，而且认为这还不错。”伊凡对阿辽沙说：“我想到欧洲去一趟，阿辽沙，我从这里就去；我也知道我只是到坟墓去，但却是到珍贵的坟墓去。在那里躺着的是一些珍贵的死人，每块石碑上都记载着那从前的、热烈的生命，那种对自己的业绩、自己的真理、自己的奋斗、自己的科学狂热的信仰，我预先就知道，我会匍匐在地，吻那些石碑，哭它们，而与此同时我在心里又深信这一切早已成为坟墓而非别的。”

欧洲、那些珍贵的死人、他们对自己的功绩、真理、斗争的信念等等，这一切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都是空想社会主义的象征。他认为社会主义思想是纯欧洲的产物，是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从欧洲移植到俄国土地上，强加给俄国的。欧洲是座坟场，埋葬着人类的理想。这些死者之所以珍贵，是因为他们曾经试图消除人世间的苦难。他们所以是死者，是因为他们的理想在欧洲没有实现，在俄国更不能实现。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说中还通过神学校学生拉基金的形象以及费鸠科维奇检查官的讲演嘲讽了革命民主主义者的空想社会主义。大宗教法官的唯物论和渎神论也影射着革命民主主义思想。他打着基督的旗号，嘴里说要把人类从压迫和奴役中解放出来，可是实际上干的却是背道而驰的勾当。他认为人生来是反叛者，不善于为自己取得自由和人世的幸福。“自由和人人有足够的面包，这是两件不能调和在一起的事”。他对基督说：“人创造出来，比你所想的要软弱和低贱……”他认为自由的理想不适合于人类，因此必须用暴力来驾驭他们。基督妨碍他对人类的暴力统治，所以他把基督赶走。

伊凡否定了上帝和上帝的世界，但却得出否定一切道德原则的虚无主义的和极端个人主义的结论。斯麦尔佳科夫把他的“理论”付诸实践，成了杀人犯。陀思妥耶夫斯基企图以此证明：不信仰上帝，必定走上犯罪的道路，在精神上陷入无法解脱的悲剧之中。伊凡企图借助于“卡拉玛卓夫式的卑鄙

的力量”来消除自己的精神矛盾，但是无济于事。在小说结尾，作家以他所特有的艺术力量描写了神经错乱的伊凡头脑中的梦魇。在这梦魇中，现实与虚幻纠缠在一起，跟《大宗教法官稗史》一章相呼应，魔鬼作为伊凡的二重人格，暴露了他灵魂的丑恶。

与伊凡的世界观相对立，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玛卓夫兄弟》中提出了一整套顺从与忍耐的反动宗教理论，其体现者就是阿辽沙和他的思想导师卓西玛长老。他们的救世药方不外乎基督教教义和抽象的善恶观念、宽恕、和解、忍受苦难等等。小说尾声中，阿辽沙站在伊留舍奇卡墓旁号召孩子们“为所有的人而受苦”。小说的这种反动思想无疑也影响到其他一些人物的命运。德米特里无辜被判为弑父凶手，但却意识到自己整个生活的罪恶，因此而驯服下来，准备以受苦来赎罪，洗涤自己的灵魂。格鲁申卡放弃了对侮辱她的人进行报复的想法，开始“新生”。卡杰琳娜·伊凡诺芙娜宽恕了德米特里，主动陪同他去服苦役。但是这些反动思想并没能抵消作品的巨大艺术力量。《卡拉玛卓夫兄弟》以其独特的形式深刻暴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弱肉强食的本质，描写了尖锐的社会矛盾和思想冲突，表现了对受苦人深切的同情和对和谐美好生活的强烈向往，是一部少有的艺术杰作。

作家的艺术特色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位才气横溢的大艺术家。高尔基当年曾经严厉地批判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反动思想，但是却十分推崇他的艺术才华。他写道：“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两个最伟大的天才；他们以自己的天才的力量震撼了全世界，使整个欧洲惊愕地注视着俄罗斯，他们两人都足以与莎士比亚、但丁、塞万提斯、卢梭和歌德这些伟大人物并列。”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鲜明艺术特色和所取得的高度艺术成就，使他在世界文学的发展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 虚幻的现实主义 ”

陀思妥耶夫斯基通常被认为是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本人也时常用“现实主义”一词来说明自己的创作方法。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现实主义”是异常独特的，绝非十九世纪欧洲文学中所通行的那种现实主义，明显地有别于巴尔扎克、狄更斯，托尔斯泰等人的现实主义。他本人曾经一再强调这种区别，在给玛伊科夫的信中写道：“我对现实和现实主义的理解完全不同于我们那些现实主义作家和批评家。我的理想主义比他们的现实主义更现实。详尽地讲讲所有我们俄国人在近十年来精神发展中所感受的，——恐怕现实主义者们对此会立刻大叫起来，说这是幻想！可实际上这是真正的地地道道的现实主义！”他在给斯特拉霍夫的信中更明确地说：“我对现实（艺术中的）有自己特殊的看法。大多数人称之为超乎寻常的和虚幻的东西，对于我来说有时则构成最本质的现实。平常的现实以及对现实通行的看法，我认为还不是现实主义，而且甚至相反。”

由此可以看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现实主义”有着“自己特殊的看法”。第一，他认为“现实主义”不在于对现实生活形式的真实描绘，而在于反映生活的本质的真实；第二，他强调文学创作必须从现实生活中提炼出高度概括的哲学思想，表现作家本人在人类“精神发展中所感受的”；第三，他特别注意表现生活中那些“超乎寻常的”现象，“虚幻的东西”，追求所谓“理想主义”。因此，他常常称自己创作方法为“最高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虚幻的现实主义”。

陀思妥耶夫斯基早在四十年代，创作的初期，就在文学反映现实的基本原则问题上与别林斯基发生了分歧。这位批评家是俄国现实主义理论的奠基者，主张文学必须“如实地”、“像生活本来那样”反映生活，用生活自身的形式反映生活。他绝对不能容忍创作中的幻想，认为“幻想这东西，在我们今天，只能在疯人院中，而不是在文学中占有地位，应该过问的是医生，而不是诗人。”可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则不满足于这种现实主义，在创作中企图另辟新径，在《二重人格》、《女房东》等中篇小说中就开始了这种探索，用虚幻、怪诞的形式描写主人公的内心分裂。从六十年代中期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独特的创作方法完全形成。他往往采用夸张、怪诞、象征、幻想等形式反映生活中那些极端的、绝无仅有的、病态的、畸形的，乃至令人难以置信的现象，从而达到本质的真实。现实生活在他的笔下有如显微镜底下的苍蝇腿，经过放大，已经看不出本来的模样，但麇集在绒毛上的细菌却清晰可见。

《卡拉玛卓夫兄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创作经验的结晶，情节以一起弑父案件为基础。卡拉玛卓夫兄弟之间和父子之间的关系实为世上所少见。这种极端的、畸形的父子和兄弟关系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剥削阶级家庭关系的一种夸张的表现，形式是极不正常的，但本质则是正常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方法不能说是象征主义的，但是象征主义在他的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高尔基在给契诃夫的信中就曾指出过这一点，他说：“在强大的俄国文学中没有象征主义，这是多么奇怪，都不想去解释根本性的问题，精神的问题……我们惟有陀思妥耶夫斯基有勇气写出了《大宗教法官稗史》，不过如此而已！难道说我们在天性上都是现实主义者吗？”

显而易见，按照高尔基的意见，《卡拉玛卓夫兄弟》中的《大宗教法官稗史》是象征主义的，但实际上这部小说的整个第五卷，包括它的题目《赞成和反对》，都是象征主义的。这一卷是全书的思想高潮，各条思想线索皆来源于此。这又使整部小说具有象征主义的性质。全书都按照“赞成和反对”的原则结构而成。小说中人物的一切思想感情和行为举动皆体现着“赞成”与“反对”的冲突，进行着激烈的斗争。每个人物自身都具有二重性格和二重心理，而整个人物形象体系则分为温顺的和残暴的两类人物，相互对立，相互依存，形成一对对二重性的人物形象。

卡拉玛卓夫家族内在矛盾重重，分崩离析，父子、兄弟间冲突尖锐，体现着“赞成和反对”的原则，既彼此为敌，又被爱与憎紧密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整体。在作家看来，这个小小的家族象征着人类世界的复杂关系，是现实生活的缩影。陀思妥耶夫斯基以这个小小的家族为象征，概括出了整个人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普遍命运。

在这个“赞成和反对”的形象体系之中，阿辽沙和斯麦尔佳科夫处于两极，一个是温顺、和解、博爱的体现者，另一个是残暴、无耻和仇恨的化身。他们二人性格截然相反，但也有共同点，即他们两个都没有二重性，不受良心的谴责和折磨。阿辽沙为人清白，良心安宁；斯麦尔佳科夫则根本没有良心。与此同时，这两个人物又各自以其复杂的形式跟伊凡和德米特里发生着密切的关系，不仅在情节发展中，而且在思想和心理方面形成对立的统一。阿辽沙和斯麦尔佳科夫是伊凡的两个二重人格，分别体现着他的“善”和“恶”。阿辽沙幻想着人类的幸福，希望消除人类的苦难；伊凡尽管不能接受阿辽沙的驯服，但是却对他的幻想感到亲切，全身心地向往着博爱，天真地相信爱的力量。与此同时，伊凡又是个犬儒主义者和极端个人主义者，创造出“一切皆可任意妄为”的“理论”，成了斯麦尔佳科夫犯罪的唆使者。斯麦尔佳科夫实践了伊凡的“理论”，成为弑父凶手，但又伪造现场，嫁祸于德米特里。德米特里完全可能成为弑父凶手，但实际上却没有造成犯罪事实。然而他最后被判苦役二十年，接受了阿辽沙的思想，决心去受苦。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人的本质的理解反映了他的世界观的矛盾。他在作品中一方面把人物的二重性，他身上的“善”与“恶”的斗争表现为一定社会生活条件的结果，但另一方面他又把这种二重性表现为永恒的人性的体现，认为这种二重性不受环境的制约。在《卡拉玛卓夫兄弟》的《火热的心的自白》一章中，德米特里对阿辽沙忏悔说：每个人的血液里都有一条“色欲的虫子”在兴风作浪，使人动摇于上帝和魔鬼之间。情欲是万恶之源，使人犯罪，折磨自己，为害别人。这就决定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理想主义”的特点。他曾经幻想人类的“黄金时代”，在晚年写过一个叫作《可笑人的梦》

的短篇小说，其中说道：“我看到，并且知道，人们能够成为美好的和幸福的，不会丧失在世上生存的能力，我不愿意，而且也不能够相信恶是人们的正常状况。可是他们却都嘲笑我的这种信念。”作家的这种信念不仅被历史悲观主义者所嘲笑，而且他本人也不知道如何把这种信念付诸实现。他觉得，对于消除人身上的恶来说，社会力量无济于事，惟有依靠超越生活的道德力量才能把人身上的恶压制下去。因此，他在宗教，在摈弃人的一切自然要求的禁欲主义中找到了这种力量。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评论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时明确地表述了这种宗教乌托邦。他说：“显而易见，人类的恶隐藏之深，是用社会主义者所开的药方，靠着社会改革所无法消除的，人的心灵会依然如故。不正常的情况和罪恶来自人的自身，人的精神法则迄今模糊不清，神秘莫测，种学没有把它弄清，因此也就无法克服。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什么样的医生能把他治愈，甚至连最后的审判者也不可能，惟一存在的就是上帝，他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因此，为了除恶，他只好求助于上帝，鼓吹人人都应该为别人而受苦，压制情欲这个万恶之源。《罪与罚》中的索尼娅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青春，最后跟随忏悔了的，并且受到惩罚的拉斯柯里尼科夫去服苦役。《卡拉玛卓夫兄弟》中的德米特里尽管没有犯罪，但也欣然接受惩罚。卡杰琳娜·伊凡诺芙娜受了德米特里的侮辱，但是却放弃了报复的想法，主动陪他去受苦。而《白痴》的主人公梅什金公爵则是作家所设想的“正面的美好的人物”，更全面体现着他的“理想主义”。

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方法的另一个不同于现实主义的显著特点就是非常注重描写虚幻、梦境乃至梦魇等超现实的现象。他在《大宗教法官稗史》中通过阿辽沙和伊凡的对话对这一点做了解释。伊凡给阿辽沙讲述自己编的《稗史》，阿辽沙不明白其中的意思，问道：“这不简直就是一种不着边际的幻想吗？……要么就是一种完全不可能存在的胡言乱语？”伊凡笑着答道：“你就把这当作胡言乱语吧。既然你已经被当代的现实主义养成了不良的习惯，不能消受一点点虚幻的东西，你愿意把它看成是胡言乱语，那么就算它是吧。”实际上这里所表达的是作家本人对创作的看法。他认为人的病态心理、神经失常、精神错乱、梦幻、梦魇、歇斯底里等非正常的精神状态，恰恰是那不正常的社会生活的正常反映。在伊凡的梦魇中，小鬼对他解释说：“我可以对你解释一下。你听着！在睡梦中，尤其是在发梦魇的时候，由于肠胃失调，或其它什么原因，有时人会做很艺术的梦，看到复杂而真实的思想，看到一些事件，或者甚至看到一连串的事件，由统一的纠葛联为一个整体，其中会有意想不到的细节，从最高的精神表现直到胸衣的最后一颗纽扣，我敢向你起誓，这是列夫·托尔斯泰也写不出来的。”

“残酷的天才”

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同于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现实主义作家，他在自己的小说中竭力避免集中地、详尽而完整地描写故事发生的环境，而往往是在叙述故事过程中，采用“忙里偷闲”的办法，不断交待出典型细节。这些细节组成主人公活动的社会背景：污秽的城市小巷，黯淡的街灯，狂风暴雨，棺材般的斗室，肮脏的家具，污浊的空气等等。这种背景色彩阴暗而凄惨，饱蘸着作者对那些走投无路、颠沛无告、遭受凌辱和损害的穷人的隐痛。

《罪与罚》一开头简单地交待了时间是七月初的一个黄昏，地点是C拐角，K桥附近，人物是一个年轻人。接着，立即转入对人物行动的叙述，伴随着主人公所到之处，颇为节省笔墨地勾勒出一些细节，造成他活动的环境。拉斯柯里尼科夫走出他那棺材般的斗室，“径直往干草市场走去。还不到干草市场，在一家小铺子前面的马路上站着一个黑头发的年轻的街头乐师，他正在演奏一支十分动听的情歌，替他面前的一个姑娘伴奏，这个姑娘站在人行道上，有十五六岁的样子，打扮得像个小姐，穿着一条钟式裙，肩上披着一件斗篷，手上戴着手套，头戴一顶麦秸帽，上面插着一根火红色的羽毛；这些东西都破旧了。她用街头卖唱的、颤动的但却相当悦耳和嘹亮的嗓音唱出那首情歌，等待着铺子里的人丢给她两个戈比。”在一所大房子里，“开设着小酒馆和别的饮食店。从这些酒馆和饮食店里不时跑出来穿得像去‘走亲戚’的女人——她们都不包头巾，只穿着连衣裙。在人行道上，有两三个地方，主要是在一楼门口，都成群结队地攒集着这样的女人。走进一楼，只要再下两级石阶就可以进各种娱乐场所去玩，其中有一个娱乐场，这时有一阵阵敲击声和吵闹声传到街上。吉他叮叮咚咚地弹奏着，人们在唱歌，一片欢乐的气氛……有个喝得烂醉的人横躺在街上。”街头歌女、醉汉、妓女、酒馆、娱乐场……这些街头即景构成了资本主义大城市贫民窟里的风俗画。这些娱乐场不仅不给人以快感和享受，而且这里的一切都违反人的正常的官能感受。小酒馆里肮脏气闷，气味难闻，醉酒的叫喊声不绝于耳，刺激着人的神经。“一张小桌上摆着一只铁盘子，盘子里盛着吃剩的叫入难以咽下的马铃薯煎牛排”。“柜台上摆着小黄瓜、黑面包干和鱼块，这些东西都有一股难闻的气味”。“大厅里歌声荡漾，黑管吹出悠扬的曲调。传来一阵妇女的尖叫声。”“在一阵阵狂笑和尖叫声中，在调子雄壮、声音尖细的假嗓伴唱下，还有吉他伴奏着，用鞋跟打着拍子，在疯狂地跳舞。”这里的一切都是不正常的，漫画式的，被歪曲了的，变了形的。斯维德里加伊洛夫自杀前的一天夜里，在游艺“花园”里鬼混，这花园仅仅种植着一棵“三年的细小的枞树和一丛灌木”；这里的人也都是畸形的，透过喜剧性的外表暴露出悲剧来。“一个喝得醉醺醺、鼻子通红，但不知为什么神气沮丧，像个小丑的来自慕尼黑的德国人在表演，给顾客助兴”。斯德里加伊洛夫跟两个“录事”在一起，“这两个人的鼻子都是歪的，一个向右歪，另一个向左歪”。娱乐场里的“小姐”“眼睛差不多都是被打得发青”，一个“麻脸女郎，约摸二十岁，脸上全是青一块紫一块的，上唇发肿”。

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本意并不在于描写这些客观现象；他总是一来就抓住人物的心灵，发掘着深深地埋藏在底下的思想和感情。《罪与罚》中，种种客观现象几乎全都是通过主人公拉斯柯里尼科夫的眼睛描绘出来的，因此既真实具体，生动可感，又具有浓厚的感情色彩，揭示着人物的内心感受。

放高利贷的老太婆那“尖利、凶狠的目光”，抹着油的头发，“像鸡腿似的”脖子；小酒店里令人难以下咽的“黄瓜和黑面包干”；马尔美拉道夫的脏衣服，脸上的“鬃毛”，龌龊的手，黑色的指甲……这一切在拉斯柯里尼科夫的心里引起强烈的反感。他看到干草市场上那成群结队的妓女，陷入痛苦的沉思：人的生命是多么不值钱，多么没有意义。为了生存，人却又须要付出怎样的代价，而换来的则是耻辱和恐怖。拉斯柯里尼科夫心里不禁想道：一个人，“如果他必须在高高的峭壁顶上，并且在一块只容两脚站立的弹丸之地上过活，而周围是深渊，一片汪洋，永远漆黑一团，永远孤立无援，永远是狂风暴雨；——他愿意在这块一俄尺宽的地方站一辈子，站一千年，永远站着，——即使这样活着也比马上死好！只要活着，活着，活着！不管怎样活，只要能活着！……这话一点儿不错！天哪，这话一点儿不错！人是卑鄙的！因此管他们叫作卑鄙的东西的那个人也是卑鄙的。”

拉斯柯里尼科夫从马尔美拉道夫嘴里得知索尼娅被生活所逼沦落为娼，他第一次到马尔美拉道夫家去，那种贫困凄惨的景象使他痛苦万分。他离去的时候自言自语地说：“可怜的索尼娅！但是他们倒也有办法，找到一个丰富的矿井！他们可以取之不尽，享受其成！他们都习惯了。他们开头还哭泣，可是后来就习惯了。人是卑鄙的东西，什么都会习惯的！”人活在世上，脚下仅有弹丸之地，为了生存而变得卑鄙，不得不接受屈辱和损害。索尼娅为了别人而牺牲了自己，她的命运是悲惨的。可是她为之牺牲的那些人命运也同样悲惨的。人类的命运永远是悲惨的。“世界存在一天，便永远会有索涅奇卡！”

拉斯柯里尼科夫在林荫路上遇见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女，只见她神志不清，醉得不省人事，疲惫不堪地倒在长椅上。连衣裙上扣子差不多全没扣上，背后靠腰的地方被撕破，一条子布挂下来，飘荡着。显然有人灌醉了她，把她诱骗之后推出门外。可是这时，也仍然还有一个脸色红润的、衣着讲究的先生站在不远的地方，盯着她，企图打她的主意。这个少女的形象是广大底层妇女普遍命运的象征。拉斯柯里尼科夫见到她那情景，想道：“一个可怜的姑娘！她醒来后会痛哭一场的，以后母亲会知道……开头打她耳光，然后拿鞭子抽她，痛苦，没脸见人……说不定还会把她撵出家门……不久就会进医院（那些瞒着她们正派的母亲而暗地里干着不正当勾当的姑娘们总是这样下场的），后来……后来又进医院……伏特加……酒店……再进医院……两三年后就残废了，她只活了十八岁或十九岁……难道我没有见过这样的姑娘吗？她们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呢？”

拉斯柯里尼科夫思虑着人类的悲惨命运，有如精神病患者一样不断发出痛苦的绝叫。作家也跟主人公一起激动不安，对被侮辱与被损害者表现出切肤之痛。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常被称为“残酷的天才”；鲁迅称他为“人的灵魂的伟大审问者”，他写道：“显示灵魂的深者，每要被人看作心理学家；尤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的作者。他写人物，几乎无须描写外貌，只要以语气，声音，就不独将他们的思想和感情，便是面目和身体也都表示着。又因为显示着灵魂的深，所以一读那作品，便令人发生精神的变化。”“凡是人的灵魂的伟大审问者，同时也一定是伟大的犯人。审问者在堂上举劾着他的恶，犯人在阶下陈述他自己的善；审问者在灵魂中揭发污秽，犯人在所揭发的污秽中阐明那埋藏的光耀。这样，就显示出灵魂的深。”

拉斯柯里尼科夫苦苦地思索着穷人遭受苦难的原因。马尔美拉多夫说：

“一个穷苦然而清白的少女依靠诚实的劳动能挣很多钱吗？……如果她安分守己，没有特殊的本领，即便双手一刻不停地干活，一天也挣不到十五戈比。”金钱，不是什么成千上万的巨款，而是三分五角的小钱，在这些穷人的生活中就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支配着他们的整个命运。他们须要用自己的肉体、灵魂、尊严去换取。拉祖米兴艰苦地从事翻译，拿到六卢布稿费，才能勉强度日；拉斯柯里尼科夫悄悄放在卡杰琳娜·伊凡诺芙娜家窗台上的那把铜钱，可以使几个孩子暂且得以果腹充饥；索尼娅交给继母的三十卢布，是她出卖自己肉体换来的；卢仁偷偷塞进索尼娅衣袋里的一百卢布险些把这个无辜的姑娘送进监牢；卡杰琳娜·伊凡诺芙娜为了乞讨几个小钱，带着孩子在街头唱歌跳舞，跌倒在地，咯血而死；拉斯柯里尼科夫把父亲的遗物——一块怀表送到放高利贷的老太婆那里抵押，扣掉利息，拿到手的仅仅有一卢布十五戈比；他收到的三十卢布汇款是母亲和妹妹茹苦含辛积攒起来的血汗钱。这些穷人都是金钱的牺牲品，正是由于缺少得以糊口的金钱，他们才没落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真实地表现了沉沦在底层的人们惊心动魄的悲剧，使人在精神上经受着难以忍受的折磨和痛苦，令人战栗不已。这样的作家自然可以说是“残酷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被迫害者在追求着出路，但始终迷失方向，最后在悲苦的重压下屈服，抱着疯狂的自虐心理投向宗教……作家在表现他的人物思想斗争的过程时更加“残酷无情”，把他送到绝望的道路。拉斯柯里尼科夫看清了穷人贫困的原因，为了取得几千卢布去解除穷人的倒悬之疾，决定铤而走险，去杀死放高利贷的老太婆。陀思妥耶夫斯基细腻地表现了主人公如何在心里酝酿凶杀作案的想法。有时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都在促使这一想法逐渐成熟，尽管他本人未必明确地意识到这一点。拉斯柯里尼科夫在作案前进行了精心的考虑和周密的设想。但是生活是复杂的，必定会出现许多难以预料的情况。拉斯柯里尼科夫本来只须要杀死放高利贷的老太婆一人，因此特意选择丽扎维塔不在家的时刻前来作案。可是丽扎维塔却突然闯进屋来，拉斯柯里尼科夫不得不把她杀死。作案以后，拉斯柯里尼科夫开始了激烈的思想斗争，疑神疑鬼，觉得别人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在暗示着他的犯罪。他把自己跟别人相比较，权衡着自己是否正确，可是他越来越感到自己“与人类脱节”的痛苦。甚至最亲近的人，母亲和妹妹，他都觉得与自己十分疏远，格格不入。他企图为自己辩解，给自己寻找借口，使自己的灵魂平静下来，可是无济于事。拉斯柯里尼科夫超越了人类共同的道德准则，因而斩断了自己与全人类的联系。他杀死了他所憎恨的老太婆，但实际上是杀死了“自己”，使自己的灵魂完全崩溃。这样，作家就把读者引进了主人公的心灵世界，用他的眼光观察一切，体验他的感受，与他一起思考，经受着痛苦的折磨，心情无比激动。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心理分析的鲜明特点。

独特的社会哲理小说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就其体裁来说属于一种独特的社会哲理小说。《罪与罚》、《白痴》、《卡拉玛卓夫兄弟》等优秀作品，不仅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的胜利所引起的尖锐社会矛盾，而且也反映了这个时代激烈的思想冲突。作家把这些矛盾和冲突提到哲学的高度加以解释和进行艺术描写，使作品具有极大的思想容量。高度概括的社会哲学问题，包括作家反对“虚无主义”和宣扬基督顺从与忍耐的反动思想倾向在内，构成了小说的基础，与情节融为一体，决定了作品中人物形象体系和情节发展的路数。

在《罪与罚》中，作者所提出的社会哲学问题首先体现在主人公拉斯柯里尼科夫的“理论”之中，而与他的“理论”相对立的是索尼娅的道德面貌和行为准则。拉斯柯里尼科夫的“理论”又与这个人物的整个形象浑然一体。也就是说他的行为既出自于他的生活境遇和性格气质，又符合他的“理论”主张。拉斯柯里尼科夫的形象及其“理论”所反映的既是周围客观现实的悲剧，又是他主观思想歧途的悲剧。他的反叛是个人主义的和无政府主义的，充满无法解决的矛盾，因此必然失败。这种反叛及其“理论”依据反映了资本主义弱肉强食的法则和资产阶级极端利己主义的人生观。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表现了主人公反叛的失败及其“理论”的破产，就是批判了资产阶级的法则和人生哲学。

但是另一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又企图把拉斯柯里尼科夫的“理论”与革命民主派的所谓“虚无主义”联系起来，把他的犯罪与革命暴力混为一谈，从而否定一切社会反抗，鼓吹人应该靠着心灵和宗教信仰而生。索尼娅的形象体现着作者关于宽恕和解、逆来顺受的理想，她终于用基督的爱拯救了拉斯柯里尼科夫，使他的灵魂获得新生。但是《罪与罚》中所描绘出来的实际生活形象，比这种反动的宗教情绪和反“虚无主义”倾向更有艺术感染力，体现着作品的主要思想价值。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安排故事情节的大师，他的长篇小说情节曲折离奇，变幻莫测，紧张集中，波澜起伏，扣人心弦，引人入胜，因此书中虽然经常插入大段大段的哲学和宗教议论，但并不使人觉得枯燥沉闷，而使人一读就被吸引，不终卷就不释手。《罪与罚》的中心情节紧紧围绕着主人公犯罪以及犯罪以后的自我斗争而展开。小说没有按时间顺序介绍主人公犯罪前的生活史以及他犯罪动机的形成过程，一开始就进入情节，简洁地描绘了主人公犯罪前两天发生的几件事，接着马上把他带到犯罪的现场。这样，犯罪就成了全书情节的开端，而情节的结局则是主人公投案自首。尾声简要地介绍了他在苦没地的生活和精神上的变化。犯罪以后何去何从的问题，不仅关系到他本人今后的命运，而且也关系到他所思考的重大“理论”问题如何解决，因此犯罪以后的内心斗争，他在精神上所受到的“惩罚”，则是全书的重点，占有大部分篇幅，体现着情节的展开和发展的高潮。这样，“惩罚”就不单单是一系列外在事件发展的结果，而是主人公内心斗争的逻辑必然。

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是安排结构的大师，他的长篇小说规模宏伟，线索复杂，头绪繁多，但是布局严谨，结构缜密。《罪与罚》包括数条情节线索，但作为全书的基础的社会哲学问题把这些线索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这些线索彼此之间内在联系紧密，但又各有各的使命，分别体现着拉斯柯里尼科夫的“理论”的某个方面或者不同的解决途径。马尔美拉道夫一家不幸，反

映了人类的苦难，是拉斯柯里尼科夫痛苦思索的对象，使他觉得人生在世上只处于“一块只容两脚站立的弹丸之地”，这是他的整套“理论”的基本出发点和现实依据。斯维德里加伊洛夫的情节表明，一个随意超越一切道德约束的人，并不是什么杰出的“超人”，而是个披着人皮的禽兽，是不配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这从一个侧面否定了拉斯柯里尼科夫的“理论”。与拉斯柯里尼科夫相对立的是索尼娅的线索，体现着他的“理论”问题的正面解决——对人类的爱，为人类而受苦，勇于自我牺牲。小说的中心情节是拉斯柯里尼科夫的故事，直接体现着他的“超人”哲学及其破产的过程。而卢仁的情节则是主要情节的补充，从日常生活方面间接地体现了这种“理论”，表明拉斯柯里尼科夫所向往的“超人”与那些为非作歹的恶徒，与那些在通行的道德范围之内不断犯罪的统治阶级代表人物毫无区别。卑鄙无耻之徒卢仁是个资产阶级生意人，在日常生活中实践了拉斯柯里尼科夫所鼓吹的“有权犯罪”的思想。因此可以说，《罪与罚》讲的不只是一项犯罪，而是若干起犯罪及其所受到的惩罚。拉斯柯里尼科夫企图通过流血的途径而成为人类命运的主宰者；斯维德里加伊洛夫的禽兽行为毁了许多人的生命，他最后不得不判处自己死刑；索尼娅是个卖淫妇，也在犯罪，但她是在作自我牺牲，如果说她也有罪，那么她仅仅是对自己犯了罪，因此不该受到惩罚；卢仁不断犯罪，但他从不越过资产阶级法律所容许的范围，因此受不到惩罚。拉斯柯里尼科夫与警察机关的周旋，不构成独立的情节线索，而跟他的自我斗争融为一体。警察当局对他越是注意，他的斗争就越加激烈。他最后完全露出马脚，因而陷入绝境，于是到警察局去投案自首。

陀思妥耶夫斯基由于被贫困所逼，写作匆忙，因此往往来不及细致地推敲，文字有些芜杂，描写有时也不免粗糙，缺少精雕细刻。但是这些缺点和不足不仅是理解的，而且丝毫遮盖不住他的艺术光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遗产极其丰富而且珍贵，值得我们认真地学习。

